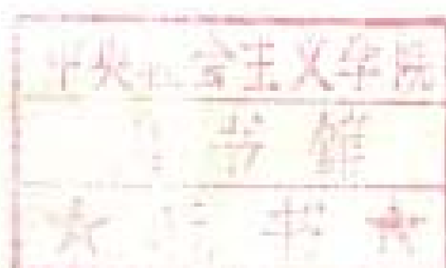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动组织

〔法〕路易·勃朗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D091.6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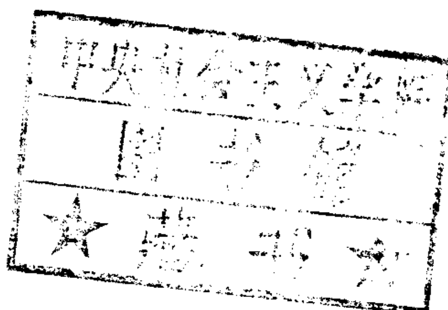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59563

劳 动 组 织

〔法〕路易·勃朗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劳动组织

〔法〕路易·勃朗著　何　钦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59

196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50千
印数 7,000册　　印张 7 1/16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0.91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 年 1 月

中譯本序言

路易·勃朗(1811—1882)是法国历史学家和小資产阶級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馬德里，当时他的父亲奉拿破仑的命令，正以財政督察官身分出使西班牙。勃朗的家庭可以說是世代相传的保皇党人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保皇党分子，是革命的死敌。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他的祖父被革命法庭处死，父亲逃亡。勃朗的童年是在他母亲的家乡科西嘉度过的。随着拿破仑政权的倒台、西班牙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父亲官运的告終，勃朗的一家曾一度过着穷困的生活。只是在复辟以后，因为得到路易十八发給的撫恤金，勃朗才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先就学于罗得斯大学，后来継续在巴黎求学。为了解决一部分学习和生活費用，他利用課余时間从事抄写、私人教师和家庭教师等工作。

1838年，勃朗創办了自己的报紙«政治、社会和文学进步評論»。在这以前，他已经給巴黎的民主刊物如«良知»杂志等撰稿。1839年，勃朗在自己的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劳动組织»，次年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屡次再版，并譯成其他各国文字。这本书在工人群众中銷行甚广，給勃朗带来很大的声望，但同时却引起資产阶級报刊的攻击。从1843年起，勃朗成了小資产阶級的民主刊物——«改革报»編輯部的成員，并先后写了«一八三〇——一八四〇年十年革命史»和«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在这期間，勃朗在工人阶級中所以聞名，是由于他与其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主张

政治斗爭和爭取民主国家制度的斗爭，提出国家帮助工人并分配工人以生产手段的要求。勃朗闡明自己的立場时写道："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1]二月革命发生时，已经获得政治資本的勃朗，一方面以工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身分自居，另一方面却向資产阶級諂媚，他的这种表里不一的行径，使他成为最合乎資产阶級要求的、以工人代表身分出現的、参加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参加临时政府后，勃朗将无产阶級的解放事业完全寄托于临时政府，对資产阶級采取无原則的妥协，竭力阻止无产阶級的公开发动，把政治斗爭任务置諸脑后。这是勃朗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轉变。列宁写道："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在1848年革命中是臭名远揚的，因为他从阶級斗爭的立場轉到了小資产阶級空想的立場，用'社会主义'詞句裝飾起来，而实际上只是帮助資产阶級加强对无产阶級的影响。"[2]

为了欺騙工人群众，临时政府組织了研究"工人問題"的委員会，設在卢森堡宮，由路易·勃朗和阿里貝尔两人担任主席。馬克思对于这件事曾有評論，他写道："这样，工人阶級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所在的場所，而临时政府的資产阶級部分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紐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財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銀行和交易所近旁，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里貝尔所負的任务就是要发現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級有事可做。

① 本书第13頁。

② 列宁：«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頁。

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們既沒有任何经費預算，也沒有任何执行权力。他們必須用自己的額骨去撞碎資产阶級社会的石柱。"[①] 在卢森堡委員会里，勃朗实际上在以劳資糾紛仲裁人的身分孜孜不倦地呼吁工人稳健和忍耐，跟資产阶級进行合作。尽管勃朗对資产阶級妥协让步，但他并沒有取得它們对他的信任。資产阶級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之后，就把形式上参加临时政府的勃朗一脚踢开了。同年5月，重新組成的資产阶級政府——执行委員会，不仅沒有让他参加，而且还指控他参加六月起义（实际上他并未参加），向他追究起义責任。勃朗不得不离开法国，迁居英国。在英国，他写了一系列的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一八四八年革命史》。在該书中，他不仅沒有从迫害中吸取经验教訓，相反，仍然为他的妥协策略辯护，继续并发展其过去的錯誤。1870年他回到法国，翌年，他被选为国民議会議員。3月18日，巴黎公社誕生时，他不仅沒有参加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級政权的工作，而且和凡尔賽分子沆瀣一气，誣蔑公社为暴动。他和共和派分子兰克、烏利斯·巴兰及"社会主义者"托伦在一起，进行了狂妄的活动，力图以"調和"作幌子解除公社的武装，搞垮公社。当"調和"活动失敗时，他逃往凡尔賽。这样，他便由隐蔽而轉向公开反对公社，因而他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一扫而光。他死于1882年，法国資产阶級政府曾予以国葬。

勃朗写作《劳动組织》，正是在法国工业高涨的年代。根据統計，从1830至1848年，法国工商业中的投資增加百分之五十，蒸汽

① 馬克思：《一八四八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123—124頁。

发动机的数目增加七倍，煤的开采量增加两倍。随着資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資本主义竞爭进一步尖銳化，資本集中过程加速，中小資产阶級大批破产，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工人們每天工作十三至十五小时，然而所得的工資却不能維持他們本人和家庭的最低生活，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也送进工厂做工。法国資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这一切悲慘的后果給了勃朗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中，勃朗从小資产阶級立場出发，严厉地譴責了資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貧困。他写道："誰都知道，貧困把教育局限到可耻的地步，因而使人民的智慧埋沒在黑暗里。貧困经常使人們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貧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貧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貧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們內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1] 他认为，貧困还使人們失去眞正的自由和权利。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所謂自由，也仅仅是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手段的人，即对于拥有土地和金錢的人說的。对于这些人来說，"自由"确实存在。但是，对于那些既沒有土地、金錢，又沒有文化的而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說，則毫无自由可言。这些人只有出卖自己劳动力、妻子和孩子的自由，只有忍飢挨餓、失业和貧困的自由。所謂权利，只不过是用来欺騙劳动人民、掩飾野蛮的資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詞藻。

勃朗在本书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論证了竞爭的危害性。他在批

---

① 本书第5頁。

評竞爭时写道:"对于人民来說，竞爭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1]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由于无产者失去一切生产資料，他們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所以对于他們說来，竞爭首先就是拍卖劳动力的竞爭。勃朗指出，在这种竞爭中，即使那个得胜的工人（即获得工作的工人），他的胜利也仅是暂时的。这种竞爭还会进一步加强，其結果必然引起工資的普遍下降，工人生活的进一步貧困化。因此，勃朗得出結論說，竞爭是劳动群众貧困的根源。

但是，勃朗认为，竞爭不仅对于劳动者有害，而且对資产阶級也是有害的。关于这一点，他写道："对于資产阶級来說，竞爭是不断起着使人貧困和破产作用的原因。"[2] 在尔虞我詐、弱肉强食的資本主义社会里，資本家为了排挤和压倒自己的对手，不惜一切地采用"廉价出售"产品的手段，进行竞爭。而"廉价出售"对于那些无錢购买新式的昂貴机器的中小制造商来說，"就是宣告他們死刑的裁决"[3]。所以，勃朗认为，这种竞爭手段只"是为了几个工业寡头的利益而毁灭資产阶級的方法"[4]；"廉价出售"只形成暂时的和虛假的好处。勃朗指出："当斗爭还在进行时，'廉价出售'是被維持着的；而当最富有的人战胜他所有的敌手时，价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竞爭导致垄断……'廉价出售'导致价格的暴涨。这样，在生产者中間曾是战爭武器的东西，迟早会成为消費者們貧困的一个原因。"[5]

---

① 本书第24頁。

② 同上。

③ 本书第61頁。

④ 本书第62頁。

⑤ 同上。

在本书中，勃朗还精辟地論证了資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犯罪的原因，这是他的这部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认为竞爭所造成的貧困是引起犯罪的根源。据他看来，犯罪人数的增加和資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他用統計材料論证了这一点，說明法国四十年代的犯罪人数比三十年代的犯罪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从地区来說，城市的犯罪人数比农村的犯罪人数多，工业区的犯罪人数比农业区的犯罪人数多。

此外，他还批判了使用童工、女工的制度；批判了貧困所引起的嬰儿死亡率高的現象，等等。

为了消灭貧困，消灭竞爭，建立沒有剝削的理想社会，勃朗提出了改革社会的方案。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組织”①，即社团性质的社会工場。根据这个方案，資产阶級政府可以发行公債，用公債的收入先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門中創办这类工場。起初，由于資金的限制，建場数字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并且只能在征集的資金范围內，招募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鉴于政府是社会工場的創办人，所以工場的規章制度应該由政府制訂，并经全国代表大会討論和表决而具有法律效力。在社会工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工場的各級管理人員，一年以后，由于工場成員彼此有所了解，而且“他們都关心社团的成功”，所以工場管理人員将由工場的成員选举产生，商量如何分配盈利和扩大自己企业的生产。为了让人們相信，这种制度不会为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門，勃朗声明說，这

① 本书第47頁。

不等于政府干預工場的经济权力，政府的权力仅以上面所說的为限。以后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监督各工場执行規章制度和所有同类生产中心之間的关系。

工場的利潤分做三份：第一份按工場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用于对老、病、残废者的撫恤以及对于其他蒙受損失的工場的支援；第三份用于为扩大生产而购置新的生产資料。

随着工場生产的发展，資金的积累，原有的工場将加以扩建，同时并建立新的社会工場，并招收新的工人。在那些大規模经营的社团中，可以招收各种不同职业的工人，生产各种不同的产品，并在围绕一个大的工业而組织起来的各工业部門間形成一个整体的联合企业。在工場內部，每个成員的工資完全平等，各人有权随意处理自己的工資。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从劳动社团中将会产生一些自願参加的消費社团。

社会工場可以邀請資本家参加，并从預算中支付給他們投資的利息；但是他們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即必須参加劳动才能获得工資。

当社会工場在各主要工业部門普遍建立，資金相当雄厚时，勃朗认为，社会工場应該通过竞爭和私人工业作斗爭，利用自己生产的廉价物品和社会工場这种大型企业所具备的优越条件，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和平地而不是暴力地兼并私人工业，而最后消灭它們，使社团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从而消灭竞爭和貧困。

在建立和扩大社会工場的过程中，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将象保护私人資本一样，保护着社团原則不受侵犯。为了不引起資本家的不安，勃朗安慰他們說，社会工場对私人工业的竞

爭，对資本家将不会是致命的，因为国家将竭力减轻竞爭的后果，使社会工場的产品价格不降到最低的水平。

在农业方面，勃朗提出取消旁系继承权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将继承权的財产宣布为公社財产，以便使公社拥有一片不得轉让的庄地。因为这种庄地不断得到扩大，所以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发生强夺的情况下导致規模庞大的农业革命。公社将大規模地经营土地，并且按照管理工业的法令进行。

勃朗认为，这样，在实行上述改革的基础上，就可以建立一个沒有貧困，沒有竞爭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既不存在剝削和压迫，也不存在其他一切非正义的行为。社会成員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将是一致的，因为每个成員只有通过公共利益才能获得个人利益的滿足。由于每个成員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所以大家将关心公共物质財富的增加，使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新的机器的发明和采用将不再成为排挤工人的工具，不再成为富人之間竞爭的武器，而成为减轻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增加社会物质財富的手段。同时，由于人們摆脫了物质生活的貧困，就可以学习文化，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智力。

綜合上述，勃朗的两个重要論点可以大致归結如下：1)勃朗对資本主义社会的貧困、竞爭和犯罪等現象进行了批判，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說批判得非常具体，非常尖銳，包含了一部分眞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这种批判对于揭露資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提高无产阶級的思想觉悟，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的。2)与圣西門、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勃朗在批判資本主义制度时，側重于批判資本主义竞爭以及竞爭所带来的危害。这一

点对于勃朗說来最为突出，也是他的貢献所在。他指出的竞爭导致垄断、竞爭使社会两极分化、竞爭是資本主义社会崩潰的因素等思想，确是可貴的預見。这些預見为后来七十年代的社会发展所证明。

但是，同时应該看到，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根本性問題，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錯誤思想和观点。

首先，应該指出的是他对于資本主义批判的不彻底性。由于勃朗本身所处的阶級地位以及缺乏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他对于資本主义的批判只能限于表面的現象，而不能找到問題的本质。他在批判資本主义社会的貧困时，沒有能够找出产生貧困的眞正原因，而只把貧困归咎于資本主义竞爭。勃朗对于竞爭深恶痛絕，认为竞爭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只要消灭竞爭就可以消灭包括貧困在內的一切社会灾难。勃朗沒有进一步探討竞爭的根源，而只是簡单地把竞爭看成是一部分資本家为压倒另一部分資本家所采取的手段。勃朗批判資本主义的这种不彻底性，是和他的小資产阶級的阶級本性密切联系着的。当时法国資本主义迅速发展，自由竞爭剧烈，广大小資产阶級紛紛破产，淪为无产者或半无产者。勃朗对于小資产阶級的这种境遇甚为憤慨。因此他不惜采用最辛辣的詞藻批判竞爭、譴責竞爭，力图挽救小資产阶級的厄运。

在勃朗的空想理論中，表現得頗为突出的是阶級調和和妥协的思想。他在說明劳动群众由于貧困而充滿着痛苦的同时，又說什么富人因为生活过分奢侈也充滿着苦恼；他在論证竞爭是造成

无产阶級和其他劳动群众貧困的根源的同时，又說什么竞爭也是使資产阶級貧穷和破产的原因；他在談到压迫对被压迫者不利的同时，又說什么压迫对压迫者也不利，等等。因此，勃朗在批判資本主义社会时，不是揭露这个社会的資产阶級利益和无产阶級利益的根本对立、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从而启发和提高工人阶級的阶級意识，而是竭力证明資本主义制度和全体社会成員的矛盾，抹煞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勃朗从这种調和的立場出发，要求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反对竞爭，消灭貧困，建立对社会全体成員有利的、以博爱原則为基础的社会。这样，勃朗实际上否认了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阶級矛盾的存在，否认了阶級斗爭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而公开主张和宣揚阶級調和。关于这一点，列宁曾经指出："小資产阶級的路易·勃朗之流的任务是：抹杀阶級利益的差别，劝說資产阶級中的某些阶层（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議員）同工人成立'协議'，劝說工人同資本家、农民同地主成立'协議'。"①

由于勃朗故意抹杀資本主义社会的阶級矛盾，因而他也就不可能对資产阶級国家的阶級实质作出正确的判断。虽然他明了国家是依靠議院、法院和軍队执行权力的，但是他却不承认国家带有阶級性，是一个阶級压迫另一个阶級的工具。他认为"国家是穷人的銀行"②，政府的任务是給无产者提供劳动工具和购买劳动工具所必須的資金。而国家的領导者应該是由选举产生而主持公道的

① «伊·格·策烈铁里和阶級斗爭»，«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頁。

② 本书第14頁。

好心腸人。

勃朗的这些錯誤思想在他的社会工場方案里得到充分反映。根据这个方案，第一，勃朗象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是把实現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級，組织他們，发动他們，使他們成为革命的动力，而是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資产阶級政府，乞求它发慈悲心，实現他的社会工場方案；第二，勃朗的所謂革命并不是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推翻資产阶級的統治，打碎資产阶級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級专政；在经济上剝夺資产阶級的私有財产，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財富，从而消灭資本主义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并进而逐步消灭資产阶級的思想及其影响，树立无产阶級的思想意识。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小資产阶級的改良，即在不触犯資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实行一些有利于小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改革。勃朗写道："……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給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总之，要給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第三，勃朗想建立的不是无产阶級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他所謂的社会工場。这种工場实际上就是小資产阶級梦想的经过改良的資本主义社会。他幻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既可以让資本和資本家继续存在，又可以使工人和小資产阶級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既可以让資本家通过預算得到他应得的利潤，又可以使工人不受到剝削，仿佛可以达到狼旣吃飽，羊也保全，两全其美的境地。

勃朗的这些错誤，就在于他根本不懂得，要消灭剝削和压迫，要使无产阶級和其他劳动群众摆脫貧困和愚昧的处境，得到眞正

的解放，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消灭資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針对这一点，列宁写道："小資产者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善意的、空洞的大話，实际上却束手无策地跟着資产阶級跑，口头上对无产阶級表示某些'同情'，实际上仍然依靠資产阶級，不能够或者不願了解，只有粉碎資本主义的枷鎖，才能使人类摆脫帝国主义。"[1] 因此，勃朗的社团方案和傅立叶的法郎吉、欧文的平行四边形一样，在資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但永远不能实現，而且反而会使工人阶級对資产阶級及其政府产生幻想，模糊阶級意识，削弱斗爭意志，給无产阶級革命事业带来危害。1848年二月革命的事实证明，即使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組织起来的国立工場，也沒有給工人群众带来任何好处。临时政府却反而利用这种工場分裂了工人阶級的队伍，制造了农民和小資产阶級对工人阶級和社会主义的仇視，致使无产阶級在六月起义时，陷于孤立无援，起义遭到失敗。

勃朗的这本书是小資产阶級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之一。今天我們应該用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讀它：对其中空想的部分要給予严格批判；对其揭露、批判資本主义的部分，则应視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可貴思想材料。

陈 森

1962年11月

---

① 《路易·勃朗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頁。

目　录

序言 …… 2
第一篇 …… 21
Ⅰ …… 21
Ⅱ 对于人民来説，竞爭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 25
Ⅲ 竞爭是資产阶級崩潰的原因之一 …… 61
Ⅳ 被英国的例子所譴責了的竞爭 …… 67
Ⅴ 竞爭必然导致法英两国間的一場殊死战 …… 75
結論 按照我們的意見，人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組织劳动 …… 79
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 90
第二篇 論著作权 …… 160
Ⅰ 禍害的本质是什么？ …… 160
Ⅱ 人們所提出的荒謬无效的补救办法 …… 169
Ⅲ 按照我們的看法，什么是补救禍害的方法 …… 186
附录 从現在起就可以試办的事項 …… 196
規約 …… 199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的来信和章程草案 …… 202
人名对照表 …… 209

序　言

1847 年 7 月

如果人类需要减轻的仅是一些例外的和个别的痛苦，那么举办慈善事业也許就可以解决問題了。但是，人們的痛苦有着旣普遍而又深刻的原因；在我們中間，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为衣、食、住而感到苦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在这种被人夸耀的文明的怀抱中，人类的半数会陷入这种悲慘的境地和长期的痛苦中呢？

問題是深刻的，它是严重的。它曾引起一些叛乱使遍地流血而沒有使世界得到解放。它曾絞尽了世世代代的思想家的脑汁。它曾耗尽了神圣而伟大的牺牲救世精神。两千年来，多少民族跪在十字架面前，把甘心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当作人类的救世主来崇拜。然而，还是有这样多的奴隶！怎么在精神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痲疯病患者！怎么在可以看到的和感觉得到的世界中还有这样多的不幸者！怎么还有这样盛行的不义行为！怎么还有这样多的胡作非为的暴徒，逍遙法外而沒有受到应得的懲罰！救世主已经来临，可是人們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呢？

不过，不要灰心，因为进步的規律是显明的。如果时間是属于邪恶的話，那么它更多地是属于那打击和摧毁邪恶的、人类良心上

的反抗行为，这种反抗行为的形式虽有变化，其原則却永远不变，它是广大无边的、普遍的、不屈不挠的、战无不胜的。

因此，不应該让問題的严重性把我們吓倒，而是要以战战兢兢和小心謹慎的态度来对待它。一个人去解决这个問題是办不到的；只有大家把力量結合起来，才能加以解决。对作出貢献的人一一加以評定，在整个进步事业中，究竟誰是最优秀的工作者呢？然而，事业在向前迈进，人类的事业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方式在完成着，而每一个研究这个問題的人，即使做錯了，也都是为了完成眞理的事业而工作。

所以，使自己的智慧注意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把科学給予博爱成为火炬，旣运用思考又运用感觉，把精神上的警惕和灵魂的力量結合在同一的、仁爱的努力中，使自己对于各民族的前途和上帝的正义具有足够坚强的信念，以便和邪恶的持久性和它那种永存性的幌子进行斗爭……难道还有比这样使用时間和精力更有价值的嗎？

劳动組织：这几个字我們已經有四五年沒有听到了；然而今天却又响遍了全法国。勒德律-洛兰先生①在报导眞实情况而又敢于說話的《改革日报》上曾经說过："让我們对于劳动者的命运作一次調查吧！"只此一句，就足以使我們病态的社会大为震动。这就是我們找到的研究的主题。今后将不会有和这个問題同样广泛的

①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勒德律-洛兰(1807—1874)，法国小資产阶級政治家。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随着无产阶級积极性的发展，他靠近了資产阶級的反动势力，积极地参加了鎭压巴黎无产阶級的1848年六月起义。——譯者注

主題，而以前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必要的主題。

与进步为敌的人們或那些怀着怯懦心情而爱好进步的人們，是拿什么来反对我們的呢？他們說，要是在人民还沒有掌握主权以前去和人民大談他們的貧困，也許是冒失而危险的事；他們說，如果給人們以一种唯物的和庸俗的动机来代替那些所謂人类尊严、名誉、光荣、勇于为善的自豪、祖国等伟大的动机，那就会把人民局限在自私自利的追求中。

这样，让人們知道穷人遭受痛苦和遭受多少痛苦，知道不仅穷人自己受苦，而且他那些注定要去从事一种过早的和致人于死的劳动的孩子也在受苦，他那生育过多而得不到安慰的妻子也在受苦，他那年老的躺在慈善机关的破床上气息奄奄的父亲也在受苦，这时，是否就会使穷人不傾向于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呢？同样，飢餓而憤怒的里昂工人的口号是：不是在劳动中生存，就是在斗爭中死亡，难道在他們这种令人贊叹而悲痛的口号中带有唯物主义的标志嗎！不，不。生存和劳动这两个最高尚的詞，联系着人类的整个命运。因此，如果人們要求通过劳动使生存权利得到規定和保证，那么人們这样作，要比和在暴力和危险的压迫下的千百万不幸的人进行爭吵更好些：这样，人們能最全面地和最深刻地理解人生的目的；人們在他的工作中感謝造物主。无論在哪里，如果依靠劳动而获得的生活保障不能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获得，那么，那里就存在着不正义。但是，如果有人挺身而出，同"不正义"斗爭，即使全世界受着"不正义"迫害的只有他一个人，他所作的也不会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就体現着一切痛苦、一切原則，而且在他的身上就代表着人类。

为了消灭貧困，劳动組织虽然并不指責唯物主义者的偏見，却以体会得最深刻的唯心論为依据。誰都知道，貧困把教育局限到可恥的地步，因而使人們的智慧埋沒在黑暗里。貧困经常使人們牺牲个人的尊严，而且几乎总是由貧困来决定这种牺牲。貧困使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降到从属的地位，因此，貧困就在人类的道德中隐藏着一种新的痛苦，并且把人們內心所具有的慷慨心情变为怨恨。如果說貧困产生痛苦，那么貧困同时也产生罪行。如果說貧困使人进入收容所，那么貧困同时也把人带到监獄里去。它造成了許多奴隶；它也造成了大多数的窃賊、杀人犯和卖淫妇。

因此，我們希望把劳动組织起来，好实現消灭貧困的目的。消灭貧困，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物质上的痛苦，而且尤其是为了使每一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尊重，为了不再使过分的痛苦堵塞人們思想上的崇高的志趣和享有正当的自豪感，为了使一切人在教育方面和智慧的泉源里各得其所，为了不再有人受生活轉輪的威胁，遭受奴役，为了不再使儿童成为他的家庭的工資补助收入，为了不再有作母亲的由于无法生活而墮胎，为了不再有年轻的姑娘为获得面包而被迫“出卖爱情的美名”：我們渴望把劳动組织起来，为了使人民的灵魂——你明白了嗎？我說的是人民的灵魂——不致因事态的残酷而受到抑压和糟蹋。

为什么把上帝願意在人身上成为絕对不可分离的东西强行分开呢？因为，人生虽然在它的表象上是双重性的，但是，本质上毕竟还是一个。对于我們生命中的两种表象之一加以損害时，就不可能不伤害另外一种。我們的肉体受到打击的时候，我們的灵魂不是也在呻吟嗎？当一个乞丐向我伸手求乞时，我就看出他那原有

道德的被迫堕落，而当一个奴隶跪在我的脚边发抖时，我也从他的动作中发现他內心的屈辱。

那么，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在它每一种方式上都受到尊敬呢？难道人类不是由灵魂和肉体的神秘結合才形成的嗎？

固然，基督教义曾经詛咒我們的肉体，但这种詛咒仅仅是一种对于异教徒那种粗野的风俗的必要的反应。在异教中，暴力胜过智慧，感官胜过精神，这种胜利曾经是长期而野蛮的。基督教义并沒有恢复暴力和智慧之間、感官和精神之間的平衡，它使那种斗爭继续下去而使智慧战胜暴力，精神战胜感官。这样，它在和原罪、天使的犯罪、天堂和地獄等教义一起，采取了“善”与“恶”的两个原理相互斗爭的古代学說之后，把恶的根源放在“物质”之中。但是，是不是应該把基督教义所含有的相对性的、过渡性的东西和它所有的神圣性的和永恒性的东西混为一談呢？是不是应該大声疾呼說：痛苦是永远神圣的呢？

痛苦在使徒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为了传布新的教义，心甘情願去忍受极难忍受的穷困和无可名言的劳累；痛苦在殉教者身上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热情的、不可征服的士兵；而痛苦在遁世者身上就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忘記为人类服务而去自动充軍发配，来抒发他那滿足自私自利的呻吟；痛苦在教会的修士身上也不是神圣的，因为他只是热衷于用一种无用的慢性自杀来摧残自己的身体——上帝的不可侵犯的作品！

誰不知道濫用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了多少禍害呢！不論是在天主教的唯灵主义中，或是在异教徒的唯物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一种根深柢固的压迫根源。利用精神的名义施行残暴，正像为了肉体

的利益而施行残暴一样；古代那些暴力神道的祭台上所流的鲜血并不比以后在宗教法庭的劊子手手下流的鲜血更多。异教徒神化了驕奢淫逸而以过度的欢乐来使肉体退化，天主教則极力推崇修行——用过度的痛苦来摧残肉体。异教徒摧残人們的灵魂，以至使人成为奴隶，天主教轻視人类的物质方面，甚至容忍穷人的存在。

但是，如果有人把构成人的两个因素取消一个，这是和事物本质背道而馳的，也是决不可能的。因此，在这方面从来就未曾有过一种絕对的理論。在古代神話中，維納斯并沒有排斥米涅瓦[①]。天主教会諄諄囑咐人們要克制自己的肉体，同时，它又施展它在世俗的权力，利用冠冕堂皇的仪式，利用塑有降生在馬槽里的神的威严形象的巍峨壮丽的大教堂，最后，还利用圣殿上的音乐和馨香来通过感官向人說教。

的确，人們如果为了精神生活而完全牺牲肉体生活，就必然会損害人类的天性。按照进步的理論来讲，如果承认人类永远应当是“灵魂与肉体”之間的某种奇异和可怕的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和理性相违背的。这一斗争之所以一直保持到現在，是因为社会还沒有找到适合它們的道路。可是，一切虛伪的文明所产生的不幸后果是：它在分配劳动和享乐方面所采用的方法极不公允，因而既妨碍着压迫者也妨碍着被压迫者和諧地运用不論是精神上的或肉体上的机能：在压迫者方面，由于給与他們濫用这些机能的便利，而在被压迫者方面，則由于損害他們这些机能的使用。目前应該弄清楚，我

① 維納斯为美和爱的女神，米涅瓦为智慧、学問、战爭等的女神。——譯者注

們是否可以相信像这样的不調和的情况終有一天会告結束。为什么在人們身上，协調不能代替对立呢？既然协調是万物的法則，它为什么不能成为个人生活的法則呢？如果我們希望解决这个問題，那就不要把它割裂开来。进步的公式具有双重性：通过一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們之間兄弟般的团結，使一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进行改善！这是包括在我們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帜上所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豪迈的标語中的。

这是何等奇怪而可悲的协調局面！在我們的时代里，特权阶級沉溺在肉欲的享乐里；在奢侈豪华方面，他們达到了空前的高峰，他們除了享乐沒有別的宗教；他們把感官的范围扩大到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們认为，怎样使用生命并无意义，而人生的享乐才是一切……当我們为穷人要求确保得到工作、每天的食粮、住所、衣服、爱的权利和希望时，他們却从这幸福的世界內部，从他們玩味着他們自己的哲学的金碧輝煌的寝室深处，要求我們不要为追求实利的唯物主义而呼吁。

有人口头上承认有必要解决社会問題，实际上却认为应該推迟着手研究，认为等到政治革命成功时总来得及处理这些問題，对于这种人，我們是不能理解的。怎么！我們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去了解如何利用这个政权！怎么！还沒有确定所要达到的目标，就应該行动！

假如有人认为革命是一时的冲动，那就大錯特錯了。只有預先定好了确切目标的革命，才不致中途流产。

請看1789年的資产阶級革命吧！当革命爆发时，人人都应該能够訂出它的纲領。这一次活生生地从百科全书、即从十八世紀思

想的伟大实验室里产生出来的革命，在1889[①]年，只須在实际上去占領精神方面早已征服了的陣地。这是非常眞实的，所以当时的第三等級[②]竟然觉得可以不用立法者也沒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人們到处喊着："給予确定的委任！"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每个人的思想中，革命的目的已经完全确定了。人們知道应該作什么；知道是为了什么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去作。让我們翻开这一时代著名的文献吧：整个的革命都記載在这里边了；1791年的宪法，只不过是这些文献的一个忠实的摘要。同时1789年的革命是何等坚强地建立起来的，它在社会中扎的根又何等地深入！国民議会[③]的风暴徒然掠过这次革命；帝国[④]徒然以占領到的很多城市和在战場上获得的很多次胜利来使这个革命失色；复辟利用对人們起最重大作用的一切政治迷信和宗教迷信来与这次革命竞胜也是枉費心机；这次革命在国民議会、帝国和复辟的混合废墟上又重新出現了。1830年的革命是属于这条鎖鏈的，而1789年则是这条鎖鏈的头一个环节。資产阶級的統治是在1789年开始的；1830年則是它的继续。

相反地，請您看一看1793年的革命吧！它持续了多久呢？它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呢？可是負責使它取得胜利的那些人曾使用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胆量和天才啊！从革命高潮到恐怖时期，該

---

① 这里原书上的年代可能有錯誤，不是1889年，而是1789年。——譯者注

② 这是指1789年5月5日开幕的法国三級会議中的那些平民阶級的代表而說的。——譯者注

③ 是1792年9月成立的法国革命的最高政权机构。——譯者注

④ 法国于1804年3月18日实行的第十二年宪法宣布法国是帝国，推举拿破侖为法国皇帝。——譯者注

有多么巨大的努力、多么令人可惊的活动、多少精力投到这次行动中去啊！为了服务于新的学說，曾使用了多少旧的工具，从将軍的宝劍到行刑員的鍘刀；但是，这次革命的纲領是国民議会的成員以問答方式所制定的，这次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事先早已确定了的。罗伯斯庇尔① 和圣-茹斯特② 的任何一种大胆提出来的学說事先在国內都沒有充分地酝酿过。让-雅克·卢梭③ 虽曾发表了他的《社会契約論》；但是，这个伟人的呼声大半消失在被資产阶級政論家們所充塞的十八世紀的喧噪嚣声之中。所以就必須創造一个嶄新的世界，必須在几天內就創造出来；必須在空前高涨的反抗和憤怒的情况下創造出来。必須仓猝应付并向热情去求得信念还不能提供的支持。必須使以往的工作所未能說服的那些人惊奇、振奋、陶醉和馴服。由此就产生了无数的困难，造成了可怕的和血腥的錯誤，而兄弟般的联系则突然被劊子手所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斗爭，这些斗爭使人头相继地落在同一个不幸的断头台盘里，丹敦④ 的头继韦尼奥⑤ 的头而落入，罗伯斯庇尔的头落在丹敦的头上。

---

① 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十八世紀末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专政（1793年6月—1794年7月）的革命政府首脑，后被判处死刑。——譯者注

② 路易·安都昂·圣-茹斯特(1767—1794)，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卓越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領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和拥护者。——譯者注

③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社会契約論》的作者，他的思想对于法国的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譯者注

④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十八世紀末叶法国資产阶級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也是雅各宾党党魁之一，他和一部分丹敦分子于1794年4月5日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譯者注

⑤ 比埃尔-維克多里恩·韦尼奥（1753—1793），法国政治家。他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死于断头台上。——譯者注

让我們記住这个充满着教訓的时代吧；我們永远不可忽視“方法”和“目的”；我們不但不該避免对各种社会学說的討論，而且要尽可能引起我們所有的爭論，以便我們一旦有了力量，不至于张皇失措，而知道如何来領导这个力量。

但是，人們会說出很多的錯誤思想，会宣揚很多的幻想；这有什么可以說的呢？难道人們可以一下子就得到眞理嗎？当他們沉浸在黑暗中时，为了到达光明之境，他們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前进，难道因而就应該禁止他們去寻求光明嗎？你們准知道人类在你們所說的那些幻想中不会得到任何益处嗎？你們准知道今天的幻想十年后不会成为眞理嗎？你們准知道为了十年后实現那个眞理，今天就不必来尝試这种幻想嗎？无論哪种学說，政治学說也好，宗教学說或社会学說也好，在它初产生的时候，总是反对者多于拥护者的，正如，只有在牺牲了很多人以后才能征募到几个勇士那样。所有那些有力地支配过人們的思想，在沒有被认为是明智的以前，不是都被认为是狂妄的嗎？

一个新的世界是誰发現的？
一个到处受人嘲笑的瘋子。
在浸溼了他的鮮血的十字架上，
一个死去的瘋子却給我們留下了一位眞神。

我們不要盲目地接受那些輕浮的思想家的意見，把它們当作那么多的預言来对待；我們要慢慢地、謹愼地、甚至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去寻求眞理，沒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但是我們为什么要把大胆的思想家摒弃在大門之外呢？一支在陌生地区进軍的軍队，需

要有偵察的先头部队，尽管他們中間有些人会迷失道路，但仍然是需要他們的。啊！大胆的思想在今天并不很多，人們大可不必把生动的智慧冻結起来，使勇气遭受挫折。

那么你們担心些什么呢？担心人們把关于无产阶級的地位以及关于改善这种地位的方法的一些錯誤观念灌輸給別人嗎？如果这些观念是錯誤的，那么經过討論，錯誤就会消失，像风吹走搀杂在谷粒中的草屑一样。

你們还担心些什么呢？担心某些大胆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会扰乱人心，妨害政治改革的成功嗎？但首先要問，难道普选問題和人民的眞正主权問題，在法国不使任何人害怕嗎？不以有力的論证指出这种恐惧心理的幼稚和毫无根据，还想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呢？啊！在各党派中最使人害怕的并不是人們所說的东西，而是人們所不說和不肯說出的东西。未知的事物？这就是使人，尤其是使懦弱的人感到害怕的。假使民主党采取科学方法把迷失方向的工业从可怕的混乱中拯救出来，难道会有人控告他們推行工业暴动嗎？当民主党证明資本的不断集中有可能使資产阶級受到工人阶級所忍受的同样的压迫时，是否有人会以資产阶級的那种盲目的反感来反对民主党呢？

让我們再补充說明，为了使政治改革运动在人民中間获得許多拥护者，那就必須向人民指出改善他們的精神生活或物质生活条件和变更政权之間的关系。在各个时代里，这就是人民的眞正的朋友或是那些替人民复仇的人所曾做过的事情。这就是从前在罗馬的那些人所曾做过的事情，这些人看到被残酷地迫害的可怜的債务人而动了恻隐之心，他們就把大多数人带到阿温庭山上

去。①不朽的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②就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是对罗馬貴族的掠夺的有力揭发者，他对着那些面色蒼白的世界的征服者喊道："人們称你們是全世界的主人，可是你們却沒有一块可以用来枕头的石块。"漁夫馬薩尼埃洛③在1647年也这样做了，他在因西班牙总督的穷奢极欲而陷于飢餓的那坡利城中喊道："拒絕交納盐稅！"最后，在五十年前，一些狂热的哲学家——勇敢的思想战士——也这样做过，他們只是因为出生过早而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誰想来領导人民，人民就有权詢問他要把他們引导到何处去。过去已经发生得太多的是，人民只为几句話而騷动，在黑暗中进行战斗，在受人嘲笑的忠誠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并轻率地流出热血为野心家鋪平道路，这些野心家头一天晚上还是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二天就变成压迫者了！

但是，倘若需要从事社会改革，也就少不了要推动政治改革。因为，假如社会改革是目的，那么政治改革就是手段。单純发現通过运用社团的原則以及按照理智、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法則来組织劳动的科学方法，那是不够的；还应該准备怎样实現所采用的原則，并通过研究使方法丰富多彩。要知道，政权就是組织起来的力量。政权依靠議院、法院、軍队；也就是說，依靠法律、裁判和刺刀的三重权力。不夺取政权作为工具，那就会遭受它的阻碍。

① 古罗馬所在的七大丘陵之一。古罗馬平民与貴族坚持斗爭时，曾退守該地。——譯者注

② 蒂伯里尤斯·格拉古斯（紀元前163—133），古罗馬的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③ 馬薩尼埃洛（1623—1647），意大利漁夫，1647年那坡利人民起义的領袖，主要反对西班牙統治。他被起义者拥为那坡利的执政者，組织了人民軍。后来被西班牙总督所派遣的凶手刺死。——譯者注

况且，解放无产阶級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工作，它牵涉很多問題；它打破許多习慣；它不在实际上而在表面上反对很多利益，因此，如果认为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努力和孤立的尝試获得成功，那是妄想。它必須运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无产阶級为了解放自己，所缺少的就是劳动工具。政府的任务就是給他們提供劳动工具。如果要按照我們的想法来給国家下个定义，我們的回答是：国家是穷人的銀行。

現在，难道我們的思想眞像德·拉馬尔丁① 先生在最近的宣言中敢于肯定的那样，“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取得工业和劳动的所有权和主权；就是取締公民之間的一切占有、出售、购买、消費的自由活动；就是去武断地制造或分配产品；就是規定最高限价；就是規定工資；就是在一切方面把工业和財产所有者的国家来代替被剝夺了財产的公民”嗎？

我們从来也沒有提倡过这类事情！如果德·拉馬尔丁先生是針对我們而駁斥的，那么他可能沒有賞光閱讀过我們所写的东西。如同下面大家会看到的那样，我們向国家——当国家是以民主方式組织起来的时候——要求建立社会工場，这些工場将逐漸地而不是突然地代替私人工場；我們要求社会工場由实現社团原則并具有法律形式和强制力的章程来加以管理。但是，社会工場一旦建立起来并开始活动时，它本身就足以給自己解决問題，并只从属于它自己的原則了。社团的工人，在第一年后，可以自由地选举自己的管理人員和領导；他們彼此商量如何分配盈利；他們专

① 阿尔芳斯·德·拉馬尔丁（1790—1869），法国詩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譯者注

心致力于扩大已经开办的企业……試問人們从什么地方看得出这种制度会給独裁和暴政大开方便之門呢？国家創办社会工場，給它制定条例，监督条例的执行，凡此种种都是以大家的名义为大家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国家的任务也就以此为限。难道这样的任务能够算是暴政嗎？今天，当政府因盗贼侵入一所房屋而加以逮捕时，能因此就譴責政府是实行暴政嗎？难道能譴責政府侵犯了个人生活的范围，干涉了家庭內部的事情嗎？好吧！在我們所主张的制度中，国家对社会工場所做的不过就是它今天对全社会所做的事情。它維护社会工場的規章不受侵犯，正如它今天維护法律不受侵犯一样。国家是社团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它不能随意并吞加入社团的工人的股份，正像它今天是私有制原則的最高保护者，并不沒收財产所有人的股份一样。

但是，从首倡精神来說，我們岂不是让国家干預了社会的经济改革嗎？我們的公开目的不就是为了消除竞爭，把工业从放任主义和不干涉主义下解放出来嗎？这是毫无疑問的；我們不但不避諱，我們还高声宣布这个观点。为什么？因为我們渴望自由。

是的，自由！这就是我們应該爭取的东西；但必須是眞正的自由，所有的人都能享受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沒有它不朽的姐妹——平等和博爱的地方，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如果我們問，为什么野蛮情况下的自由被认为是假的和遭到破坏了的自由，那么，任何一个孩子都会以应有的回答来答复我們。野蛮情况下的自由事实上只是一种无情的压迫，因为它是同力量的不平等混在一起的，因为它使弱者成为强者的牺牲品，使虛弱的人成为敏捷的人的战利品。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中，我們

所看到的是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不平等，而不是体力上的不平等；是資本与資本的斗爭而不是肉搏；是特有的优势的滥用，而不是体力上的优势的滥用；是无知的人而不是軟弱的人，是穷人而不是虚弱的人。所以，哪里还有自由呢？

对于那些拥有享受自由和扩大自由的手段的人来說，对于那些拥有土地、金錢、信貸和因为受过智力的訓练而足智多謀的人来說，自由肯定是存在的，甚至是容易滥用自由的；但是，对于那个旣沒有土地、金錢、信貸又沒有文化的人数众多而又令人注意的阶級，也就是說，对于那些毫无办法可以自給、毫无办法可以发展个人特长的人来說，难道也是这样的嗎？当社会是这样分成两部分，一方面拥有巨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极端无能为力的时候，人們就在社会中間展开了竞爭，这就是富人与穷人、狡猾的投机者与天眞的劳动者、手头寬裕的銀行家的主顾与受着高利貸者的压迫的奴隶、从头到脚全副武装的大力士与手无寸铁的战士、行动灵活的人与四肢癱瘓的人进行交鋒的竞爭！这种强者和弱者的乱糟糟的持久的冲突，这种从事压迫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形的事实上的暴政，在残酷程度上是那些明显的、可以捉摸的、以表面上仁慈的面目出現的暴政所永远赶不上的。……这就是人們竟敢把它叫做自由的东西！

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由于飢餓逼人，不得不走出学校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出卖給附近的紡织厂，以便使父亲的收入多加几文錢：試問这样的孩子在知识方面还有受到培育的自由嗎？

如果討論劳动条件的辯論继续下去，工人就得餓死，試問他还有討論劳动条件的自由嗎？

处在竞爭的这种混乱状态中，工人不得不眼看到支配着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远見和智慧，而是竞爭所自然而然地孕育出来的每一种混乱局面：未来的破产、訂貨的取消、发明的机器、工厂的倒閉、工业恐慌和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还有什么机会可以避开厄运嗎？

失业的按日計工的工人既然沒有住所，他还有不睡在街头的自由嗎？

刚刚失掉工作的穷人家的女儿，只有在卖淫和挨餓之間选择自己的出路，試問她还有保持貞操和純洁的自由嗎？

有人說过，在我們今天，再沒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这是眞实的，并且这就足以去譴責这句名言所說明的社会秩序了。因为一切关于正义和人道的概念都是顚倒了的，在这里，越不需要財富的人越容易发財，越貧困的人就越难避免穷困。你是由于出生的偶然性而注定毫无所有的嗎？那你就得劳动、受苦、死去。穷人是借不到債的，而且放任主义的学說使穷人注定是要被人遺弃的。你是生在富豪之家的嗎？那你就可以过好日子，可以过寻欢作乐的生活，可以睡大觉：你的錢在替你掙錢。再沒有比成功更大的成就了！

但是穷人不是有权利改善他的地位嗎？如果他沒有权力，那又該怎么样呢？有要求被治好的权利，对于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人来說，有什么用呢？

抽象地設想的权利是1789年以来对受欺人民的一种幻景。权利成为抽象的和不发生作用的保障，这种保障代替了应該給予人民的那种发生作用的保障。在宪章中冠冕堂皇地和空泛地在法令

里宣布了的权利，只是用来掩飾采用个人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非正义的东西以及把穷人抛弃不顾这一事实所具有的一切野蛮性。就是因为人們用权利这个詞来界說自由，所以就把飢餓的奴隶、寒冷的奴隶、愚昧无知的奴隶和生活无保障的奴隶叫做自由人。所以让我們斬釘截铁地說：自由不仅是所賦予的权利，而且包含在賦与人們在正义的統轄和法律的保护之下去运用并发展个人才能的权力中。

人們应該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区别。这个区别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的后果是巨大的。因为，只要承认，为了使人眞正自由，必須給他运用和发展个人才能的权力，其結果是社会自然就应当使它的每一个成員都受到教育，因为沒有教育，人类的智慧就不能发展；同时社会也应該使它的每一个成員都得到劳动工具，因为沒有工具，人类的活动就不能充分发揮。但是，如果社会不通过国家来給它的每一个成員以适当的教育和必要的劳动工具，那么要通过誰的手来給呢？所以我們是以自由的名义并为了自由的好处才要求恢复法权的原則的。我們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我們还无聊地生活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在这种制度下还有一些弱者需要社会的力量来保护他們。我們願意有一个干預工业的政府，因为除了把貸款借給富人以外，应該有一个借錢給穷人的社会銀行家。一句話，我們所以求助于权力的观念，那是因为有前途的自由应該成为一个事实。

此外，大家千万不要弄错：政府干預的必要性是相对的；这种必要性完全是从过去的暴政使人民所处的那种軟弱、貧困、无知的状态而来的。倘若有一天我們內心的最美好的希望沒有落空，那

么不再需要强有力的和积极的政府的那一天就会到来，因为那时社会上再沒有低級的和弱小的阶級了。在那个时候以前，建立一种监护的权力机关还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的培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壮大起来。

啊，富人們！如果有人煽动你們起来反对那些为了平靜地、和平地解决社会問題而彻夜焦思的人們，那是人家在欺騙你們。是的，穷人們的这个神圣事业就是你們的事业。一种以天意为根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通过恐惧把你們和他們的貧穷連結起来，并且通过你們本身的利益，把你們和穷人們未来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只有他們的解放才能給你們打开你們至今还不知道的安享欢乐的宝庫；而博爱的精神力量又如此巨大，以至他們痛苦的减少就必然会增加你們的快乐。有人对你們說："当心啊，当心无产者起来进行反对有产者的战争！"啊！倘若这种邪恶的战争确实是可怕的，天呀！那么对于孕育这种战争的社会秩序又应当怎样設想呢？可怜的詭辯家們！他們并沒有发現，他們所結結巴巴地辯护的制度，既然有它値得他們担心的缺点，将是一去而不复返的！否則該是怎样呢！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将蒙受那样过分的痛苦，心里蘊藏着这么大的仇恨，而且，在社会的深处，存在着一种这样强烈的反抗情緒，以致一說出博爱——基督所說的——这个詞，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冒失行为而成为某种新暴动的信号！不：放心吧。只有在不准許言論自由的地方才需要害怕暴力。沒有比通过討論更能保障秩序了。感謝上天，今天人民了解到，即使憤怒有时可以懲罰罪恶，它却不会产生好事的；人民也了解到，盲目而粗暴的急躁只能导致破坏的废墟，而正义和博爱的思想种子則将被掩沒在

这些废墟之下。問題不在于使财富更换主人，而是在于使它丰富，成为普遍所有。問題是要毫无例外地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

第 一 篇

I

路易十一在沒有几天好活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无限的恐怖。他的侍臣們在他面前再也不敢說出可怕而又不可避免的“死”这个字了。至于他本人，似乎只要不提到死亡的临近就能够逃避死亡似的，他可怜地强行使他那黯然无光的眼神中閃耀出假装欢乐的亮光来。他設法隐藏他那憔悴的臉色。他走路时尽量不东搖西晃。他向他的御医說：“喂，你看，眞的！我的身体从来沒有这样好！”

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它感觉到死亡，却否认自己的沒落。由于它被那些关于它的財富的謊言和行将消失的外表强大的夸耀所蒙蔽，它就幼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而且即使陷入了极度困难，它还在自我夸耀！近代文明社会的那些特权人物好像这个斯巴达的儿童那样，他把狐狸藏在袍子下面，当狐狸咬他的肚腸时，他还在嘻笑①。这些特权人物也装出一副笑臉，强作欢乐。但是內心怔忡不安，焦慮不定。他們的狂欢节日籠罩着革命的阴影。

貧困虽然只是在远离他們居住的地方打了几下轻微的和不喧鬧的警钟，穷人虽然在他們寻欢的場所躲开；可是他們对于自己所

①希腊的传說，有一个斯巴达男孩偷了一只狐狸，教师来了，他把狐狸藏在衣服里。狐狸咬嚙他，他坚坐不动，終被咬死。——譯者注

怀疑的或所猜测的东西感到煩恼。如果人民毫无举动，他們就苦恼地担心那个随后将要来到的时刻。当叛乱的消息消沉时，他們就竪起耳朵傾听阴謀的消息。

我要問，誰眞正关心想保持像現今所存在的社会秩序呢？誰也不想。是的，誰也不想。就我来說，我自己相信有缺点的文明所造成的那些痛苦，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遍及整个社会。試深入了解富人的生活，它是充滿着苦恼的。这是为什么呢？是他沒有健康的身体、沒有青春、沒有諂媚奉承他的人嗎？是他不相信他自己有朋友嗎？但是他乐极生悲，这就是他的痛苦；他已穷奢极欲，这就是他的不幸。在丰衣足食中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富人的貧乏，沒有希望的貧乏！在那些我們把他們叫做幸福的人当中，該有多少人是由于需要刺激而进行决斗的啊！該有多少人不辞疲劳、冒着打猎的危险来逃避他們閑居无事的苦楚啊！有多少人的感觉已成病态，慢慢地在一些神秘的創伤中死去，而在一般的疾病情况之下，就在表面的幸福怀抱中，也会逐漸地折磨不起啊！除了那些把生命当作苦果而把它抛弃了的人們以外，这里是一些把生命当作干瘪了的桔子而把它扔掉的人們：哪一种社会的紊乱能不暴露这种广大的精神上的錯乱啊！生活享受的不平等所造成的这种以痛苦的平等为結局的情况，給与自私、驕傲和一切残暴多么严厉的教訓啊！

其次，每有一个因飢餓而面色蒼白的穷人，就有一个因恐惧而吓得面色蒼白的富人。瓦尔都小姐向拯救了她的一位老乞丐說：“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打算对我們的恩人作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将使您的晚年不再感到经济拮据。在还沒有这样办以

前，請您接受这点小东西吧！”乞丐回答說：“您这样作，是叫我不知在哪一天夜里，我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去的时候，遭到搶劫和杀害，要不然就是使我为此而担心害怕，这也不見得好些！唉！要是人家看見我兌换一张鈔票，以后誰还那么胡塗，肯向我施舍呢？”

令人惊叹的对話！瓦尔特·史谷脫①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位小說家了：这是一位哲学家，这是一位政論家。我們知道有一个比瞎子更为不幸的人，这个瞎子在那里向人乞錢，听到他求乞得到的小錢在他的小狗面前的鉢中发出响声，而更不幸的就是一位有势力的国王，他因为自己儿子的年俸遭到駁回而咳声叹气。

但是在哲学概念方面是眞实的东西，难道在经济概念方面就不眞实嗎？啊！感謝上帝，对于社会来說，既沒有部分的进步，也沒有部分的墮落。整个社会上升，或者整个社会衰落。正义的法則被人們了解得更好些，岂不就会使各个阶层都因此而得到利益嗎？正义的观念在人們脑中变得模糊不清，岂不是每个阶层都会因此而感到痛苦嗎？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有一个阶級受压迫，这就好像一个腿部受了伤的人，受伤的腿必将妨碍那只健康的腿的一切动作。这样，尽管这一說法显得有些奇怪，但是如果消灭压迫，則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如果維持压迫，則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方同样不利。人們願意得到一个更明显的证明嗎？資产阶級在无限制的竞爭——残暴的根源——上建立了他們

① 瓦尔特·史谷脫(1771—1832)，英国杰出的小說家和詩人。生于苏格兰。他的长篇小說眞实地描写了过去时代的历史事件、日常生活和习俗。他的著作对欧洲历史长篇小說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譯者注

的統治。好吧！我們今天見到資产阶級正因为这种无限制的竞爭而灭亡。你也許要說，我有两百万法郎，我的对手只有一百万，在工业的竞爭場上，我用降低物价的武器，稳稳地可以使他破产。好一个卑劣而愚笨的人！难道你不明白明天就要有某个冷酷无情的罗特希尔德[1]用你自己的武器武装起来来对付你，使你破产嗎？試問你将有什么顏面埋怨他呢？在这种每天进行着斗爭的可詛咒的制度中，中等工业已經并吞了小工业。“皮洛士[2]式的胜利”！因为这次也輪到中等工业被大工业所并吞，而大工业本身由于被迫要到世界的尽头去追逐那陌生的消費者，不久就将成为一种冒险的賭博，这种賭博和其他的一切冒险的賭博一样，对于一些人結果是詐欺，而对于另外的一些人則将是自杀。暴虐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还是盲目的。沒有心腸的地方不会有智慧。

所以我們证明：

1.对于人民来說，竞爭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2.对于資产阶級来說，竞爭是不断起着使人貧困和破产作用的原因。

这种证明一經成立，就将淸楚地得出这样結論，就是一切利益都是互相有連帶关系的，并且，社会的一次改革将无例外地成为全体社会成員的一种得救的方法。

---

① 麦耶·安塞尔姆·罗特希尔德(1743—1812)，德籍犹太銀行家，他是財政寡头族系，罗特希尔德家族的始祖。这个家族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控制了許多工业企业、铁路、保險公司。——譯者注

② 皮洛士(紀元前319—272年)，伊比魯斯国王。反对罗馬……在阿斯居陆姆的战役中他虽然获胜，但損失极重，耗尽了全部力量。“皮洛士式的胜利”被用来說明得不偿失。——譯者注

Ⅱ 对于人民来説，竞爭是一种毁灭性的制度

穷人是社会的成員呢，还是社会的敌人？請答复吧！

他发現在他周围所有的土地都被人占据了。

他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播种土地嗎？不能，因为优先占有权已变成所有权了。

他能摘取人行道上由上帝的手使它們成熟的果实嗎？不能，因为果实和土地一样，也被人所占有了。

他能够打猎或捕魚嗎？不能，因为这已成为須经政府批准的一种权利了。

他能够从田地里的水源中汲水嗎？不能，因为田地的所有人根据附带权利就是水源的所有人。

当他由于飢渴而奄奄一息时，能够伸手向他的同类乞怜嗎？不能，因为有禁止行乞的法令。

当他累得筋疲力尽而沒有地方休息时，他能够睡在街道上嗎？不能，因为有取締流浪者的法令。

他能够逃出这个使他到处碰壁、使他无法生存的祖国，远离他生身之地而到异乡去謀生嗎？不能，因为只能在某些条件下才能准許迁移，而这些条件是他所不可能具备的。

那么，这个不幸的人該怎么办呢？他将对你說："我有胳膊，我有智慧，我有力量，我还有青春；你可以把这一切都拿去，作为交

換，請你給我一点面包吧!”这就是今天无产者所作的和所說的。但是甚至在这里你还可以向穷人回答說:“我沒有工作給你做。”那么，你要他去作什么呢?

这种情况的后果极其簡单。你得保证穷人得到工作。对于正义来說，你作得还是不多，而且，离博爱精神还很远；但是，至少，你不是就可以防止可怕的危险并阻止叛乱了嗎？人們对这件事情有沒有好好地想过呢？一个要求为社会服务而生活下去的人，在被迫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攻击这个社会时，从表面看来是犯着侵犯的行为，但实际上是处于正当防卫的地位，而对他打击的社会，并不是对他进行审判而只是在暗杀他。

因此，問題是这样：竞爭是不是一种保证穷人得到工作的方法呢？但是把問題这样提出来，就等于把它解决了。对于劳动者来說，竞爭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拍卖劳动。一个企业主需要雇用一个工人：前来的則有三个——你的劳动要多少錢？——三个法郎：因为我有一个妻子和許多孩子。——好。你呢？——两个半法郎：因为我沒有孩子，我只有一个妻子。——好极了。你呢？——我只要两个法郎就够了：因为我是独身汉。——那么我就优先雇用你吧。这就完了，交易已经讲妥了。然而那两个被排挤的无产者将有什么遭遇呢？他們只好让自己餓死，人們只能希望他們这样。但是，如果他們去偷东西呢？那你一点也不用害怕，因为我們有警察。如果他們进行謀杀呢？那么我們有劊子手。至于說到三个人中最幸运的那一个，他的胜利也仅是暂时的。如果来了第四个劳动者，强壮得足以每两天中可以挨餓一天，跌价就要跌到无可再跌的地步，于是就造成新的流浪者，或許又給监獄制造一个新

犯人！

人們是不是将要說，这些慘痛的結果說得过分夸大了，并且无論在何种情况之下，只有当工作的职位不够分配給要求得到工作的人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上述那些慘痛的結果呢？我也要問一下，是不是竞爭本身恰巧具有一种因素，可以防止这种害人的不平衡呢？如果某种工业劳动力不足，那么誰又能向我保证，在这个由于世界性的竞爭而产生的巨大混乱中，其他某种工业不发生容納不下劳动力的情况呢？可是，在三千四百万人中，只要有二十个人被迫去靠偷盗为生，这就足以对这竞爭的原理作出譴責了。

可是，还有誰会这样盲目，甚至一点也看不到，在无限制的竞爭的影响下，工資的不断下降已成为一种必然是普遍的事实，而絲毫沒有例外呢？是不是人口有它不能逾越的界限呢？我們是不是可以向被个人自私自利的偏見所掌握的工业說，向这个发生过很多沉船事件的大海似的工业說，"你不要太过分了"呢？人口不断地在增加：那么，你該命令穷人的母亲变成不能生育的，你也該詛咒那使她怀孕的上帝；因为你不这样作，对于战斗員来說，练兵場很快就将过于狹窄了。发明了一部机器，你該命令人們把它砸毁，你也該詛咒科学；因为，如果你不这样作，被新机器从工厂中逐出去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就要去敲邻近工厂的大門，并使他們的伙伴的工資降低。工資经常地下降，結果是淘汰了一定数目的工人，那就是无限制的竞爭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竞爭仅是工业上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却迫使无产者互相歼灭。

此外，为了使严格的思想家不致責备我們过事渲染起見，下面就是用数字表达出来的巴黎工人阶級的情况。

人們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一些妇女，每天所得不超过七十五生丁，而且在一年之內，仅有九个月有工作，这就是說，有三个月她們毫无所得，如果人們願意把她們的工資按全年平均計算，那么每天大約只有五十七生丁了①。

妇 女 劳 动 力

职业名称	每日工資		淡季	备注
	法郎	生丁	月数	
洗衣工	2	0	4	工作場所不卫生
綉鞋工	0	75	3	
裝釘工	1	50	3	
各种刺綉工	1	50	4—5	
金属打磨工	2	25	5	
磁器打磨工	1	75	5	
紙牌制作工	1	50	3	
紙板制作工	1	50	3	
制帽工	1	25	4	
蜡烛制造工	1	25	4—5	
织袜工	1	0	0	
塗色工	1	25	4—5	每日工作13小时
草帽編织工	2	0	6	
縫衣工	1	50	4	
縫被工	1	25	4	每日工作14小时
面紗裁切工	1	25	5	
木制品塗金工	1	50	5	
往书中插入图画的女工	1	25	5	
鈕扣制造工	1	25	4	
花匠	1	75	5	

① 下列資料是我們用极其愼重的态度搜集起来的，誰也不能責备这些資料有夸大之处，資料是由設在巴黎的830所工場的职工中的1,500多名男女工人那里获得的。当然：在每种行业中，我們都采取了所得到的数字的平均数。

窗飾繐子制作工	0	75	3	
縫制手套工	1	25	4	
上衣与褲子裁縫工	1	50	4	
为商店制作衬衣女工	1	0	0	
女用帽子装飾品制作工	2	0	4	
女用帽子制作工	1	50	4	
金銀线編织品制作工	1	50	4	
紡线工	1	0	3	
黃金鉆孔工	2	50	6	
縫靴工	1	50	4	
羽毛物制作工	1	50	4	
罗盘打磨工	2	0	4	
銀器和珊瑚打磨工	2	25	6	
紡线断头接线工	0	90	3	
旧衣修縫工	1	25	3	
熨衣工	2	0	3	工作場所不卫生
染色工	2	25	0	
挂面制作工	1	50	4	

男　劳　动　力

职　业　名　称	每日工資		淡　季	备　注
	法郎	生丁	月　数	
草帽制作工	4	0	7	
銀匠	3	0	3	
軍械制造工	4	0	4	
金叶工	3	50	3	
金首飾制作工	3	75	5	
屠夫（童工）	3	0	3	
面包制作工	3	75	3	
馬具工	2	25	3	
制造鈕扣工	2	75	3	
制帽工	3	50	5	
制腊肠工	1	0	4	供伙食
木工	4	50	4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制車工	3	0	5	
金屬雕刻工	3	50	4	
排字工	3	50	3	
糖果制造工	3	50	5	
制鞋工	2	75	3	
硝皮工	4	0	4	
制刀工	3	0	3	每日工作13小时
修屋工	4	50	4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木器鍍金工	3	0	3	每日工作16小时
金屬品鍍金工	3	75	4	工作場所因有水銀而带危險性
紫檀木細作工	3	0	3	
雕象印刷工	3	50	4	
罗盘制作工	4	0	4	
玳瑁眼鏡制作工	3	0	6	
雨伞制作工	3	0	4	
钢琴制造工	4	0	3	
白铁制造工	3	25	3	
鉛字铸造工	3	50	4	
炼銅工	4	25	3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炼铁工①	4	0	3	工作場所有危險性
打铁工	4	0	3	鎚工每日工資为2法郎50生丁
鞭炉工	4	0	6	
手套制作工	3	50	0	
钟表工	4	0	4	
鉛字印刷工	4	0	4	
布匹印花工	4	25	4	
石刻印刷工	3	25	4	
画片印刷工	3	50	4—5	
雕刻銅版印刷工	4	0	4	每星期有1法郎25生丁的供应品
乐譜印刷工	3	25	4	
灯类制造工	3	0	4	
箱类制造工	3	0	4	

① 每一个工人配合4名苦力，他們的工資每人每天2法郎50生丁。

泥瓦工及其同行①	4	0	4	
建筑用大理石切磨工	4	0	4	
摆钟用大理石切磨工	4	25	3	
蹄铁工	2	75	3	
建筑物細木工	3	0	4	
靠手大椅子細木工	3	50	3	
光学器械制造工	3	0	6	
金銀品細工	3	0	6	
金銀线編织品制作工	3	0	4	
鋪石工	4	0	4	非熟练工每日工資2法郎25生丁
房屋油漆工	3	50	5	
車辆油漆工	2	75	5	
假发制造工	0	85	0	营养不良，睡眠不足
水电工	4	50	4	
烧瓷工	3	75	0	
裝釘工	3	0	3	
馬具制造工	2	75	5	
建筑物用鎖工	3	50	4	
玻璃品吹型工	4	25	3	工作場所有危险性
鉛版印刷工	4	0	3	
縫衣工	3	0	5	
凿石工	4	25	4	
硝皮工	3	50	4	
地毯工	4	0	4	
洗染工	3	0	4	
染絲工	3	50	0	
铁板制造工	3	50	3	
木桶制造工	3	0	3	
木器物品車工	3	50	4	
馬車制造中之車工	3	50	4	
銅器物品車工	3	75	4	
油漆工	4	25	4	

① 非熟练工每日2法郎50生丁——童工有6个月每日为2法郎40生丁；有两个月每日为2法郎10生丁。

在这些数字中，每一数字代表着多少眼泪！多少沉痛的呼声！多少强烈地压抑在內心深处的詛咒！这就是住在巴黎的人民的情况！这座学术的城市、艺术的城市、文明世界的万丈光芒的首都；此外，这座城市的面貌，只是极其眞实地反映了夸张得这样厉害的文明的各种丑恶的对比：华丽的林蔭行人道和泥濘的小巷，灯火輝煌的商店和阴暗的工場，蕩漾着歌声的剧場和阴森黑暗、里边正有人在哭泣的陋室，胜利者的紀念碑和溺死者的停尸室，凱旋門和验尸所！

在大城市里，某些人的豪华无时无刻不在侮辱其他人的貧困，可是大城市却对乡村有着很强烈的吸引力，这的确是一件突出的事。事实是这样存在着的，而且是千眞万确的事实，那就是工业在和农业进行着竞爭。一家忠于当前社会秩序的日报，新近轉載了一位教会首长——斯特拉斯堡① 主教——的文章，在他的笔下流露出下列几行悲惨的詞句："一个小城市的市长曾经向我說过：'从前我用三百法郎就可以支付我的雇工的工資；現在我需要一千法郎才刚刚够。我們如果不把他們的按日工价提得非常高，他們就用离开我們而到工厂里去劳动来威胁我們。但是，农业是国家的眞正財富，它多么不該遭受这种情况的損害啊！我們看到，如果工业信用发生动搖，如果有一个企业倒閉，那么突然就会有三四千憔悴的工人，由于无工可作，无飯可吃，需要国家来負担他們的生活。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們完全不懂得为了将来而节約：每星期都把他們劳动所得花得一干二淨。而革命时期正是破产最多的时期，在

①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的城市，在阿尔薩斯，下萊茵省的行政中心。铁路枢紐站。——譯者注

这时期中，这些挨餓的工人們突然从不节約而淪为赤貧，試問这批人怎么不影响到公共安宁呢！他們甚至无法把自己的劳力出卖給土地耕种者了；他們的衰弱了的胳膊，由于不再习慣于田間的笨重劳动，也不再有多大气力了'。"

所以，大城市不仅成为极端貧困状态的发源地，而且还必須把乡村的人口以不可抗拒之势吸引到这些发源地而把他們吞沒掉。并且好像是为了帮助这种不幸的运动似的，人們不是在各处修建铁路嗎？因为在一个妥善組织起来的社会里，铁路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在我們的社会中則仅是一种新的灾害。铁路逐漸使缺乏人力的地方变得更加荒凉；同时却又使得人們在那本来难以找到立錐之地的地方，变得人口过分稠密；铁路又使那种在工人分类、工作分配、产品分配中已經发生的可怕的紊乱現象更加复杂化。

让我們再来看一看中等城市吧！

盖潘博士曾在一本我想它在我們的政治家的藏书中大概不配占有地位的小本年鑑中写了下列的几行：

"南特是一个介乎像里昂、巴黎、馬賽、波尔多那样的大工商业城市和三等城市之間的中等城市，在那里，工人們的习慣或者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些，因此我們认为我們不能选择比这更好的城市来证实我們所必然得到的結果，并給予这些結果以一种具有絕对明确性的特征。

"只要正义感尚未完全泯灭，那么在看到貧苦工人的享乐与苦痛之間所存在着的那种极不相称的情况，沒有人会不感到难受的；对这些工人說来，生活仅仅是不死而已。

“除了工人自己和他家属所需要的那块面包之外，除了他暂时为忘却痛苦而需要的一瓶酒之外，他是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不希冀什么别的东西了。

“如果你願意知道工人居住的是怎样的住所，那么就請你走进他所住的一条小巷吧，在那里，他是被貧困包围着的，正如中世紀时由于人民的成見而居住在被指定的区域內的犹太人的情况一样。——請你低着头走进那門向小巷开着的并且比小巷路面还低的一个骯髒的地方去吧，里面的空气像在一个地窖里那样，是寒冷而潮湿的，脚在泥濘的地面上直打滑，时时有跌倒在污泥里的危险。过道是向下傾斜的，因此就在过道两旁的地平面下，各有一間阴暗、寬大、冷冰冰的房間，房間的墙上滲出污水，而且仅由一个破烂的窗子通进空气来，这个窗子很小，进不来阳光，又太坏，所以关不牢。如果恶臭的气味不使你向后退縮的話，請你推开門，稍稍向前走一两步；但是你要当心，因为高低不平的地面，旣沒有鋪磚，也沒有鋪石，或者至少石板是已经被极厚的泥垢盖满，因此再也看不出有石板了。这里有两三张用糟烂的細绳縛住的床：它們已被虫蛀坏了，床脚都向一边傾斜着；有一床草褥，还有一条沿边形成破布条的被子，这条被子因为只有一床，很少洗过，有时还有一些床单和一个枕头：这就是床上的东西。至于衣柜，在这些房屋中是不需要的。往往有一架紡紗車和一架布机权充家具。

“在楼上的其他各层中，房屋比較干燥，也比較明亮，但同样骯髒、同样可怜。——就在这里，冬天往往不生炉火，夜間在树脂的蜡燭照明之下，人們为了得到十五至二十个苏的工資，一天要作十四小时的工。

“这个阶級的孩子們，在他們能靠一种辛苦而笨重的劳动給他們的家庭增加几个里阿尔① 的收入以前，他們是生活在阴沟的污泥里的；——他們面色蒼白，滿臉浮肿，衰弱异常，他們那两只深陷在眼眶中的受着瘰眼炎症侵蝕的发紅的眼睛，使人看了觉得难受；也許有人会說他們和富人的孩子本质不同。住在郊区的人們和住在富人住宅区的人們之間，差别并不这么大；但是却发生着一种可怕的淘汰作用：最茁壮的果实固然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是未熟凋零的。二十年后，有的人身体很强壮，而有的人却死去了。关于这个問題，我們虽然还能作很多补充，但是这部分社会成員的生活开支的細賬，将作出很有力的說明。

一个家庭的房租	25法郎
洗衣	12法郎
燃料	35法郎
家具修理	3法郎
搬家（至少每年一次）	2法郎
鞋子	12法郎
衣服（他們穿的是人們送給他們的旧衣）	0法郎
医疗費	免費
药費	免費

“如果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每年的收入是三百法郎，就必須用其中的一百九十六法郎来糊口，而这家人尽管尽量刻苦，最低限度也需要花費一百五十法郎来买面包。这样，他們还剩下四十六法郎，供购买盐、奶油、白菜和馬鈴薯等之用；我們不談肉类，因为他

① 法国旧銅幣名。——譯者注

們根本談不上吃肉。如果有人认为酒吧間还要吸收一定数目的錢的話，那么他就会明白，尽管慈善机关有时免費供給几斤面包，这些家庭的生活是非常凄惨的。”

我們曾有机会亲自在特洛亚①研究現行社会制度对工人阶級的命运所发生的影响；我們曾亲眼看到一些悲慘的景象。为了使人們不致責备我們夸大，让我們把亲身調查所得到的数字列举如下，以說明事实的眞相：

特洛亚的工业統計

制袜帽工：四百名雇主，这些雇主有营业执照并雇用約三百名工人，其中半数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至一法郎二十五生丁；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其他四分之一每日可以得到工資一法郎。

木工：二十五名雇主，拥有二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二法郎和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制鞋工：二百名雇主，有三百至四百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为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七十五生丁。其中有一些是制长靴工，每日工資为二法郎至二法郎五十生丁。

泥瓦工：雇主二十名，拥有将近一百五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工資从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盖房工的工資相同。

細木工：雇主一百五十名，拥有将近七百名工人。工人平均每日工資为二法郎。

① 法国香巴尼省的省会，在塞納河旁。——譯者注

制天花板工人和房屋油漆工：雇主一百名，工人三百名。工人每日工資从一法郎五十生丁至二法郎不等。

鎖工：雇主八十名，工人約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資为一法郎七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二十五生丁。

裁縫工：雇主一百二十名，工人二百至二百五十名。工人每日工資从一法郎二十五生丁至二法郎五十生丁。較熟练的和地位較好的可以得到三法郎五十生丁。但这种人的人数是极少的。

硝皮工和制革工：二十五个工場共有五十至六十名工人，工人每日得二至三法郎。他們每天只工作十一小时。

织布工：他們一共有五百至六百人。他們每人每日得工資七十五生丁至一法郎五十生丁。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二法郎，但每天要工作十三甚至十四小时。

仅拥有极少数工人的行业并沒有列入这个表中。

人們是不是要求一种性质更普遍、所表現的情况更慘的数字呢？

1837年阿德里安·加斯帕蓝①先生公布了一份正式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在一千三百二十九处王国的救济院和收容所中被救济的貧民人数，在1833年达到四十二万五千零四十九人。此外，描写工人阶級貧困情况的重要著作的作者步雷先生在上述的控告性数字外，又加上一个数字，說明那些住在自己家中而受救济的貧民的人数：步雷先生证明，根据最近的行政調查的可靠結果，在法国有一百多万人忍受着飢餓的痛苦，并且是仅靠富人餐桌上

① 阿德里安·加斯帕蓝（1783—1862），法国农学家，生于奥兰奇，1838年任內政部长。——譯者注

落下的面包屑来維持生活的。另外，我們在这里所提到的仅是“官方的”貧民：如果我們能够对那些不是这种“官方的”貧民加以精确計算的話，那又将如何呢？根据步雷先生认可的假設，一个“官方的”貧民至少代表着三个貧民，这是絲毫沒有什么夸大的地方，人們由此就可以承认受苦的人民群众在全体人口中的比例差不多是一比九。有九分之一的人口都陷于貧困之中！难道这还不足以使我們宣告你們的制度是残酷的，而这些制度的原则永远是邪恶的嗎？

我們刚才用数字指出了，应用卑劣而野蛮的竞爭原則竟把人民推到多么极端的貧困中，但这还沒有把一切都說完。貧困产生可怕的結果：让我們深入到这个慘痛問題的中心去吧！

古人說，飢寒起盜心，这眞是可怕而意味深长的話！根据警察厅的一位科长弗雷吉埃先生的統計①，在巴黎工作蕭条的季节，男女老幼工人共有二十三万五千名，而在工作繁忙的时期，则有二十六万五千名。在这个数字中按照上述的計算，有三万三千人由于貧困和无知堕落在罪恶的泥沼中，他們在极度失望中掙扎着、堕落着。至于那些只靠罪恶勾当謀生的人，如盜窃犯、詐欺犯、拐騙犯、窩藏犯、娼妓和她們的姘夫等等，他們就构成一个惊人的数字：总数达三万零七十二人，再加上刚才提到的三万三千人，就使巴黎所容納并給养的一支罪恶大軍，包括男女老少在内总数共达六万三千人。

我們来談一談警察局认为沒有充分理由加以逮捕的那些作坏事的居民所聚居的巢穴吧。在文明世界首都的中心，在那些藏污納垢的区域里，在充滿着血腥的神秘事件的小巷中，有許多地方，人們

① «居民中的危险分子»，第一卷第27頁以下。

以两个苏的代价出卖鋪位。《居民中的危险分子》的作者說(第一卷第52頁)，在1836年，最下等的居住場所总数达二百四十三处；所收容的住戶共六千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妇女，靠卖淫或偸窃为生。

的确，在这里，混杂聚居着我們道德世界上的渣滓，还有一些浸沒在丑恶人群中的貧穷人，他們的极端貧困孕育了罪恶；在那里，发生着使人战栗的景象。在那里，人們所見到的只是面目猙獰可怕和野蛮兽性的人們。在那里，所用的語言都是用来掩盖他們的思想的下流俚語。在那里，人們极端地放蕩鬧酒，在那里，每天都可以遇到那些常客，一边爭吵流血一边喝着劣等的綠葡萄酒，这种酒使他們的粗暴性情得到兴奋并且也使他們衰竭。从那里，有时产生这样一些人，他們由于对社会做了駭人听聞和可怕的事情而走向监獄或断头台。

还有說起来駭人听聞的事情，那就是許多为非作歹的人在巴黎却有着一种公开的地位。警察局知道他們，有他們的姓名住址，掌握着他們不法行为的档案；为了要在犯罪的現場逮捕他們，警察一步一步地跟踪着他們。而在他們那一方面，只要他們的不法行为沒有法律证据的时候，他們就昂首闊步，而且放心大胆地窺伺着时机。因此，懲罰和犯罪二者在我們社会內部构成两种敌对势力，这两种敌对势力都随时巩固自己的实力，不断地彼此监視着，以一种互不相容的态度互相打量着，用狡猾的手段斗爭着，并注定我們要永远而且无休止地看到它們这种永恒的斗爭的演变。

这还是小事。长期以来，人們只是由于孤独的、个人的、粗暴的动机而去犯罪。但是在今天，杀人犯和盗窃犯却結成帮了；他們服从紀律的規定，他們給自己制訂一种法典、一种道义；他們成群

結帮地活动并按照周密的計划进行。最近期間，刑事法院接連进行公开审理的，有曾经向中产阶級宣战的“沙尔班梯埃帮”，有经常地在圣日曼区行劫的“古尔夫阿西埃帮”，有曾向工人儲蓄所搶劫的“高杰·白莱士帮”。另外还有“硝鏹水帮”、“催眠药帮”、“勒杀帮”等等。不被劳动所吸收的力量跑到罪恶的陣营里去了。面临犯罪分子对集体进行杀害，忠实的人們认为不能再在一起进行集体生产了。当我們等待人們决定去組织工人社团的时候，我們却看到杀人犯已組织起来了。

这种混乱是不可容忍的，必須予以結束。但是，如果得到的結果使我們灰心，那么最低限度我們要尽力去追溯这种混乱的原因。簡单說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貧困。

因为，誠恐侮辱上帝，我們不敢主张人类生来就必然是邪恶的。我們更願意相信上帝的作品是善良的、是神圣的。我們不要为了推卸我們曾经破坏这个作品的責任而成为不虔敬的人。如果人类的自由确实存在的話，那么一些伟大的哲学家都曾对此表示怀疑：至少人类的自由在貧民身上是遭受到异常的限制和压制的。我知道一种比蒂培尔①和尼罗②的暴政更残忍、更难于逃避或难于摆脫的暴政，这就是事态的暴政。它是从一种腐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由无知、貧穷、放蕩、坏榜样、得不到安慰的心灵上的痛苦、找不到减轻方法的肉体上的痛苦等等所构成的；它的牺牲品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生活在一个农产富饒、商店里装满着珍貴物品、大厦中空曠无人的国家里，自己的衣、食、住却毫无着

① 蒂培尔，紀元14—37年的罗馬皇帝，多疑而残暴。——譯者注

② 尼罗，紀元54—68年的罗馬皇帝，性情残暴。——譯者注

落。

請看一个出生在我們城市的污泥中的不幸者吧。他从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的訓导。他在受罪恶薰陶的环境中长大。他的智慧始終停留在黑暗里。飢餓煽起了他最起碼的欲望。从来沒有一个朋友来帮助过他。也沒有温和的声音在他辛酸的心灵中喚起温情和爱情的共鳴。現在，如果他成了犯罪的人，那么，你就向你們的法庭呼吁，对他加以制裁：我們的安全需要这样作啊！但是你不要忘記，你們的社会秩序从来也沒有适当地帮助这个不幸的人解除痛苦。你不要忘記，他的自由意志是从他在搖籃时起就已遭到恶化；他的願望受着沉重的和不公正的命运的压制；你不要忘記，他挨餓；他受冻；他从不知道、也不懂得什么是仁慈……虽然他是你的弟兄，虽然你所信奉的上帝也是那些貧穷的人、懦弱的人、无知的人、一切受苦的和永生不灭的人类的上帝。

今天，当人們把一个人交給劊子手行刑时，如果你問为什么，就有人回答："因为这个人犯了罪。"如果你継续問这个人为什么犯了罪，那么人們就什么也回答不出来了！

有一天，这是1844年11月4日，我閱讀了《法院通报》，其中有一篇叙述最近发生的一宗謀杀案件，詳情很有令人痛心的意义：

"本年7月12日，"总检察长阿貝尔先生的起訴书上写道，"雪弗魯依来到工艺博物館街警察分局自首，說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且立即供认了他犯罪的詳細情节。他說，他的被害人名叫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原是他的姘妇，已经和他同居了一个多月；貧困带来的不幸和对生活的厌倦使他們难以忍受，于是他們共同商定一起死去。为了能够实行这个可怕的計划，他們喝了烈酒，把他

們房間的窗戶关好，把窗縫堵塞，还准备了可以使他們窒息而死的木炭。葛丽娜-安奈特·布隆上床就寢，雪弗魯依对她說：‘我們就快死了！’她回答說：‘是，是，’同时，并結結巴巴地說着这几个字：‘还沒有呢，等一等！’她說完这些話，神经就有些不正常。据被告說，他曾经給她一杯糖水喝，使她的神经鎮靜一下。布隆精神稍稍恢复，接着說：‘你快要死了，我的好茹連，你已经点燃了木炭，我們一起睡下吧！’她果然睡着了。然而被告却沒有把木炭点着；据被告說，他怕布隆在精神錯乱的时候倒在炉火上。他說，就在这一刹那間，他起意要窒息这个不幸的女人，于是他重新喝了烈酒壮胆，把松脂熔解后，塗在一张布上，把布貼到她的臉上，这样她的嘴和鼻孔就完全盖严密了。不多时候，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就死了；雪弗魯依說自己已经再沒有勇气去点起炭火，也沒有勇气想别的方法来自杀，他便立即走到警察分局自首。”

从案件审理的情况看来，这个被她的情夫用松脂面具窒息而死的可怜女子并不是一个庸俗的人物。“有一天，她对她的情夫說，我要和你談談我的幻想。在我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在圣莫尔①作工；在夜間，天气很好的时候，我时常单身跑到圣莫尔坟地附近田野里的一处非常幽靜的地方，在那里，四围是綠草和花朵。我曾经好几次为我自己构造的幻想而哭泣。我在戏院看过一出名叫《凱特利》的戏，这出戏使我感到煩惱。在这出戏中，有一个女子，她很懂得爱；而我呢，在我的孤独中，也像这个女子一样，我爱一个超人，他是我所既不认识又沒有見过的。可是我和他談过話；

① 法国安德尔省的一个市鎮。——譯者注

我想像他就在我的周围，他就睡在我的身旁。以后，我就去寻找花朵，把花朵散布在他的周围，并且我低低地說：他就在那里，他对我很忠实！啊！是的，我很爱他。我也就哭了。由于我有了这些幻想，我感到幸福，因此那时我每天都要到那里去。"

多么深厚的情感！何等高尚的理想！热情和幻想交融在一起，这該是多么动人！多么温柔的忧伤的性情呀！但是葛丽娜-安奈特·布隆却陷入了貧困：她的心灵在貧困中很快就衰弱和枯竭起来。她在沉醉中去找寻致命的梦境；最后，发觉生活的压迫过于沉重，她对她的情夫說：

"你快要死了嗎，我的好茹連？让我們一起睡着吧！"

这样，貧困仿佛是为了使惨痛的教訓多样化似的，就以各种极不相同的姿态出現：在某些人身上，貧困是悲惨的，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貧困則是凶恶丑陋的，它有时給自杀带路，有时又促使人去进行謀杀。那么，是不是还需要更多的理由使政府最后下决心去研究可能的救济方法呢？

几年前，国王的检察官布克利先生在他复职演說中承认，現今的社会秩序呈現出許多无名的創伤；家庭外面，潛伏着不調和的情况，时刻有对它进犯的可能；人們在那里公开提倡貪婪或吝嗇；人們来往行走在窩藏犯的黑店和黑夜中盗窃犯的匕首之間；就在巴黎，近代文明的策源地、我們的科学和艺术的中心，罪恶选择了它最喜欢的住所；那些地下社会的可憎恶的人物，如拉斯奈尔和布勒曼之流的有組织的罪犯，就是从巴黎的神秘和下流的地区中逃出去的。在这个富有的、文雅的、有礼貌的、尽情欢乐的表面掩盖下，展現出使人毛发悚然的悲剧；在离我們仅有几步远的地方就

有不少的违法行为、不可思議的荒唐行径、难以相信的淫乱秽行以及許多被自己的母亲慢慢地弄死的嬰儿！是的，这就是那些当权的最重要的人物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他們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赶紧增加法院和扩大法院的生杀之权！而他們对于杜絕如此多的罪大恶极和駭人听聞的事件的根源的必要性，却一字不提！可是，預防似乎終究是比懲罰好些。根据里昂·福歇先生①所得的資料，被塞納初級法院所逮捕和审問的人数如下：

1832年……………………………………………… 9,047人

1842年………………………………………………11,574人

这就表示：从1832年至1842年——用我們这个时代的絕妙表达方法来說——罪恶增加了28%。要知道，巴黎城是有人員众多的国家保安队、一万五千名卫戍部队、三千名市警察、八百三十名消防队、无数的警官、督察員、警察、密探保护着的；并且人們还在不断地增强着这些工作人員的力量。但是，尽管鎮压的力量扩大，犯罪的活动也增加得更快。是不是我們等着罪恶成为不可收拾的力量，等待它来包围我們，等它把我們都掐死呢？

因此，如果对于穷人来說，这里存在着一个救济的問題，那么，对于富人来說，那就是一个安全問題了。貧穷的根源——竞爭，对于穷人来說，是无休止的暴政，而对于富人說来，却是一种永久的威胁。誰都知道，大部分的罪犯都是从大的工业中心产生出来的，

① 里昂·福歇（1804—1854），法国的新聞記者、经济学家兼政治家，1848年作过內政部长。——譯者注

工业省区所提供給刑事法院的被告人数，要比农业省区所提供的多出一倍。单单这一个比較就足以說明，人們对于現今的劳动組织、对于劳动組织所应規定的条件以及对管理这个組织的法律应当作何感想。

对于这一切，哦，慈善家們，請你們想像一下感化院的美好制度吧！当你們費心劳神地給了罪犯以教育，当他走出你們的监獄时，正在等着他的貧困又把他无情地送回到那里去了。你們这些远見的医生們，請你們相信我的話，把这个染有疫病的人留在病院里吧，你們恢复他的自由就是把他交还給疫病。

而且，对于能恢复健全生活的弱者来說，同无法改造的坏人发生接触是致命的。恶行好像美德那样，也有它的感染作用和它的道理的。

这就是使我們那些政治家痛苦地认识的事情，这就是产生像1844年5月众議院所通过的那样的监獄法案的原因。这个法案的目的是在于避免混杂的危险，这种混杂使监獄中那些新犯人和那些长期以来已经腐化堕落的犯人混杂在一起。这个法案不仅把只是采用夜間隔离的欧貝恩① 制度，而且还把采用夜間和白昼都隔离的費城② 制度介紹到法国。結果是，监獄为了使释放到社会上去的犯人不致更加堕落，更有作恶的经验，更加令人可怕，以免使社会受到这种犯人疯狂行为的危害，就不得不采用单独监錮制度，这只是用时間来埋葬罪犯：这是一种可怕的刑罰，結果使犯人

① 美国的一个城市，有著名的监獄。——譯者注

② 北美合众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大城市，因实施罪犯隔离监禁而著名。——譯者注

变成呆木愚蠢、自杀或发疯！在罗馬时代，当一个貞女陷入情网的时候，人們就把她活埋了，并且在她的身旁放上一罐水和一块面包；但是，正如著名的拉梅耐① 对我們說过的，在罗馬，人們还讲人道，不去更换埋葬在地下的貞女的面包，也不去更换她的那一罐水。在把这种制度輸入給我們的那个国家里，罗得島州从1843年1月1日起就取消了单独监錮制，因为在三十七个人中就有六个人发疯。西尔維奥·彼利科② 說过："孤独是一种这样残酷的折磨，以致我始終不得不想把我心头的几句話說出来和要求我的邻居答复我。如果他不回答，我就会向窗上的铁栅、向对面那个小丘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鳥說話。"

单独禁錮的残酷是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它相比的。犯人一旦被关进叫作单間禁閉室的这种坟墓里去，他除了絕望以外，和人类沒有别的关系了。他的殉难既无人見，他的呻吟也沒有共鳴。他的孤独由四面冰冷的墙壁包围起来，不使外泄。同时他什么都沒有：他看不到人的面孔，观察不到广大天空的景色，听不見大地的声音和大自然的諧音。永恒的沉寂压在他的身上。他完全被人遺忘。他在死亡中呼吸和掙扎。

如果最近所通过的法案能够减轻这一类懲罰的邏輯理論所具有的野蛮成分，那么我們将感到非常高兴，我們也要衷心地

① 菲利西特·德·拉梅耐(1782—1854)，法国反动政論家和政治家。天主教修道院院长。他发展了企图使工人运动服从教会领导的所謂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譯者注

② 西尔維奥·彼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曾参加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他的作品"獄中記"(1832年)反映出他轉向基督教的温和立場，这种轉变表明他已放弃了政治斗爭。——譯者注

为那些使得罪犯有时还有希望能够看到人面在他面前经过的立法而祝福。不过，即便含有这样內容的法律，仍旧是多么的残酷啊！

但是，我們的立法者，却竟相信了单独禁錮的教育意义，眞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在他們的眼里这种教育意义掩盖了单独禁錮的恐怖性。他們根据少有的盲从性，以为一个人如果和自己的同类尽量隔离就可以提高他对他同类的責任感；他們相信罪犯的社交本能是可能加以改造和教导的，办法是使用强力去压制这些本能，使他們因沒有机会进行社交和意志消沉而萎靡下去。簡单說来，他們认为为了挽救墮落的人，只有使罪犯面壁反省自己的罪行。

关于这个問題，已经談得很多了：这个問題本来要求作深入的研究，但我們所以談这个問題只是为了指出，在基础极坏的社会秩序中，一切感化制度都会产生巨大的和不可避免的弊害。其中最优良的制度，对罪犯在实际上进行感化而不是进行折磨，它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显然的危害和丑事。因为人們根据什么权利可以让貧苦的儿童在离监獄不远的地方、在苦难中去吸取罪恶的毒素，而在监獄中却有人竭力去向那白发蒼蒼的罪犯說教呢？让那些被遺弃的、无知的、愚昧的、挨餓的、极度絕望的人，通过犯罪去得到社会保护的权利，并使用匕首去为自己开辟一条受教育的道路，这不是荒謬到了极点嗎？

从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有效而合理的感化制度只有一个，那就是一种健全的劳动組织。我們周围，经常敞开着一所使人墮落的、規模巨大的学校，应当立即加以关閉：那就是貧困。

只要人們不从根本上去打击邪恶制度，那么人們在反对必然后果上的一切努力将是白費的。沒有被摧毁而只是掩盖起来的邪恶是会萌芽起来的，它将在善良的外表下成长起来，在每种进步上使人发生錯觉，并在每一件好事下面埋伏一个陷穽。

我們都知道，儲蓄銀行的建立沒有得到广泛的歌頌者和拥护者。

很多誠实的政論家曾经认为，对人民来說，儲蓄銀行是一种通过事先安排而逐漸增加財富借以解放自己的办法：在一个非常吝嗇的、不仅限制人民的乐趣而且还限制人民的生活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天大的幻想；工人的工資既永远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怎会有足够的儲蓄呢？即或艰苦較小的人偶尔有些小額积蓄，然而疾病、失业都在等待着吞食这笔微薄的儲金，这种儲金又怎能构成将来解放无产者的資本呢？

此外，儲蓄銀行仅仅有一部分的来源是靠誠实的劳动得来的。作为大批不法利益的盲目的和合法的收贓者，儲蓄銀行在不知不觉地鼓励了这些不法利益之后，对于一切前来儲蓄的人，从偸窃了他主人財貨的仆人起，一直到出卖色相的妓女，一概欢迎。

人們向无产者建議要为了将来而积蓄：这等于对他們說，要忍飢挨餓，要压制不可抑止的欲望的根苗，要用他自己的意志来加重他处境的貧困。那么为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在经过十年的节衣縮食、艰难困苦之后，当衰老的心脏不再为追求幸福而兴奋，当人們的青春已逝，好得到一笔微薄的資本，作为竞爭的候补战利品。

但是，問題还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在虛伪和不公正的文明社

会中，如果使人民完全依靠他們的統治者，这并不是沒有危险的。当人民由于狭隘而虛构的利益和他身受的压迫制度联系起来时，为了恐怕看到他們自己辛辛苦苦攒积起来的几文錢在社会变革的危机中化为烏有，是否不能不感到自己是与压迫者的命运相联系的呢？而成为暴政的政权，当它能支配人民群众的儲金时，当它可以拿銀行倒閉来威胁他們时，当它可以任意摆布他們，使他們順从它的危险行为和参与它的使他們成为牺牲品的残暴行为时，这种政权还有什么不敢对人民群众做的呢？

就儲蓄本身来說，这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只是幼稚的和狂妄的矯揉造作。但是——人們应該很好注意——如果儲蓄跟个人主义联系起来，那么，儲蓄就会产生自私自利，会和布施絕緣，会不知不觉地在最善良的天性中杜絕乐善好施的泉源，会以貪婪的滿足来代替施恩于人的那种神圣詩情。反之，如果儲蓄跟社团配合起来，那么它就将获得一种高尚的本质、一种神圣的重要性。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而儲蓄，这就是宣布对于自己同类和对于前途的不信任；但是，如果既为自己又为他人而儲蓄的話，这就是做一件最聪明的事情，这就是給予智慧以应有的热誠对待。

某些道德学家曾经夸奖現今的儲蓄銀行制度，說它是迫使貧苦阶級不再貪杯的一种有力的手段。但据我們看来，挽救的办法还不在这里。工人之所以这样甘心去寻求一种导向梦境之乡的出路，就是因为現实生活对于工人来說是太残酷了。人們为了工人的利益要把工人手中的酒杯砸碎，而工人之所以爱好这个酒杯，是因为一醉可以解千愁。为了能忍受生活，該有多少人需要借酒杯来忘掉

部分的情感呢！如果不是社会的过錯，那又是誰的过錯呢？因为它在社会成員之間，把劳动与享受作了那样的不公正的分配！閑蕩的人是由于厌悶而醉酒，劳动的貧民則是由于痛苦而醉酒。原来，对于一切人来說，智慧产生于操作和休息、辛苦和快乐之間的适当的交替。所以我們又不得不回到基本的問題上：通过消灭貧困的根本原因而消除貧困。

我們已經談过，个人主义产生了竞爭；由于竞爭才有工資的变动和工資的不足……談到这里，我們所碰到的就是家庭的瓦解問題。一切婚姻都是負担的增加。为什么要穷上加穷呢？因此男女間的姘居就代替了家庭。貧民生养了孩子：怎样去养活他們呢？因此，在墙角里，在某些荒僻的教堂的石阶上，甚至在立法机关的迴廊下都发現有这样多的穷人嬰儿的尸体。为了使我們对杀嬰的原因不再有絲毫怀疑，統計在这方面使我們知道，我們十四个工业較发达的省份所提供的杀嬰数字与法国全国所提供的杀嬰数字的比例是四十一与一百二十一之比①。絕大多数的罪恶总是产生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国家完全应該对一切貧苦的母亲說："我負責养育你們的孩子，我开設教养院。"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还应該更进一步，还应該消灭各种能够妨碍人們冲击无能为力的制度的障碍。弃嬰收容箱②已經設立了！放弃自己权利的母亲得到了保守秘密的利益。但是現在享乐的誘惑旣然不必顾虑男女姘居所强加的責任，

① 参閱1840年7月15日《宪政公报》所公布的統計表。

② 一种装置在嬰孩收容所墙壁中的、可以轉动的圓形箱柜，箱柜的一半露出在墙外，当有人要把自己的嬰孩送交收容所时，可以把嬰孩放在露出在墙外的那半个箱柜中，把箱柜轉动，就可以把嬰孩送进去。这样，放弃嬰孩的人就可以不必面对面地暴露自己的面貌而把嬰孩交付給收容所。——譯者注

那么，誰又能制止男女姘居情况的发展呢？这就是道学家們立刻大声疾呼的事情。接着，冷酷无情的統計家出来說話了，而且他們的責备更加激烈。“取消弃婴收容箱吧，取消弃婴收容箱吧，不然，你們就要看到，收容的弃婴数字将大大增加，就是我們全部的預算也不够养育他們了。”的确，自从設立弃婴收容箱以来，法国的弃婴数字有显著的增加。在1784年1月1日，弃婴的数字是四万；1820年是十万二千一百零三；1831年是十二万二千九百八十一；今天差不多是十三万①。弃婴的数目和人口之間的比例数，在四十年間差不多增加到三倍。对于貧困的这种大規模进襲，应該給以怎样的限制呢？而且怎样才能避免总是在增长着的百分之几的附加税的重担呢？我分明知道，在現代的救济所中死亡的机会是很多的；我分明知道，在准备收容到慈善机关去的婴儿中，有許多在离开出生的陋室时，或在寒风凛冽的大道上，或在育婴堂的恶浊空气里，就丧失了生命；我知道，还有其他許多婴儿，由于营养不足而慢慢死去，因为，在巴黎的九千七百二十七所弃婴养育所中，只有六千二百六十四所养有一头乳牛或一只奶羊，最后，我还知道，收养在同一保姆家里的婴儿中，有的是因吃奶而死亡的，因为他們的同伴們是由放蕩的父母生出来的，因此把保姆的奶汁都弄得有毒了②。可惜！像这样的死亡率还不能构成一项足够的节約。

至于說到百分之几的附加税和預算数字，那么从1815年至1831年的开支均有所增加：在夏朗德③，从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二法

① 請参閱于尔納·德·博滿斯、都夏台尔、伯諾亚斯頓·德·夏都諾夫等先生的著作。

② 見埃德穆斯当·都梅里尔：《預算案的哲学》。（埃德穆斯当·都梅里尔〔1801—1871〕，法国語言学家和古文学家。——譯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翁各雷謨。——譯者注

郎增加到九万二千四百五十四法郎；——在朗德[1]，从三万八千八百八十一法郎增加到七万四千五百五十三法郎，——在罗得—和—加隆[2]，从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六法郎；——在罗阿尔[3]，从五万零七十九法郎增加到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二法郎。——法国的其他省份也是这样。在1825年，各省議会共通过了五百九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法郎的补助費，到年底证明尚亏空二十三万零四百十八法郎。但是禍不单行：救济院的保健制度逐日改善！然而卫生的进步却成了一种灾害！天啊！这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呢！那么还該怎么办呢？有人认为，凡是把自己嬰孩送进救济院的母亲就得被迫接受一种使她受屈辱的义务：就是要她向一位警察局局长坦白她的錯誤。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如果使妇女們变得不知廉恥而习以为常，社会又能得到些什么呢！当青年們的一切荒唐行为得到官方的許可，当一切淫蕩举动得到社会默认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对于必須作这种痛苦的坦白所作的規定很快被习以为常所打破；如果妇女們从而受到不知廉恥的教育，而国家当局又在鼓励不顾貞节的行为，那么政府只有把一切违反廉恥的法律一笔勾銷。如果說最好还是把弃嬰收容箱全都取消；这不免是太大胆的要求。这眞是瀆神的願望！啊！你們发現百分之几的附加稅的数字在增大，这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却不願意使杀嬰的数字增加。压在你們預算上的負担，使你們感到惊惶！但是，我們說，既然人民的女儿們在她們的工資中找不到維持生活的办法，那么，你們在这一方面虽然

①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行政中心为蒙特馬尔山。——譯者注

② 法国西南部的省份。——譯者注

③ 法国西部的省份。——譯者注

有所收获，你們在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应当有所損失，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家庭就这样完了嗎？唉！这是毫无疑問的。你应当考虑一下，如何把劳动重新組织起来。因为：有了竞爭，就有极端的貧困；有了极端的貧困，那就会瓦解家庭。事情是这样突出！現制度的拥护者对革新的阴影战栗，而他們并沒有觉察到，如果維持这种制度，那就会通过一条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道路把它推向最大胆的現代革新，也就是推向圣西門主义！

我們所攻击的工业制度的最丑恶的結果之一就是把孩子們推进工厂里去。我們讀到牟罗兹[①]的許多慈善家向議会两院呈递的請願书："在法国，有人招收各种年龄的孩子在棉紡工厂或其他工厂中作工；我們在那里看見有**五岁**和**六岁**的孩子。不論年龄，每天劳动的时間都是一样的；紡织厂里，除非在商业危机的情形下，每天的劳动是从未少于十三个半小时的。

"当你在清晨五点钟穿过一座工业城市时，你就能看到有那样多的人拥挤在紡织厂的門口；你将看到一些不幸的孩子，面孔蒼白，身体瘦弱，发育不完全，眼色阴暗无光，臉色发青，呼吸困难，走起路来傴僂着身躯，好像老人一样。你听听这些孩子之間的談話吧：他們的声音是沙哑的、微弱的，好像被他們在紡织厂中所吸进去的污浊空气所遮盖起来似的。"

但願上帝认为这种描写是夸大的！但是，这篇叙述中所指出的事实，是以官方文件和严肃人物蒐集起来的文件中所記載的观察結果为根据的。另外，那些证据也都是信而有征的：夏尔勒·杜

① 牟罗兹，法国上萊茵省的首府。——譯者注

班先生[1]在上議院說：在每一万个应召前去忍受战争疲劳的青年中，法国的工厂最多的十个省份提供了八千九百八十名残废或畸形的人，而在农业省份中，則仅有四千零二十九名。1837年，为了挑选一百名壮丁，在卢昂就要剔选掉一百七十名，在尼姆，一百五十七名，在埃尔柏夫，一百六十八名，在牟罗兹，一百名[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竞争的必然后果。竞争使工人过分貧困，于是工人不得不把小孩領到工厂去作工，以补充工資的收入。同样，无論在什么地方，只要竞爭統治着，在工厂中使用童工就成为必然的事。例如，在英国，許多工厂的大部份工人由儿童所組成：据德奧賽先生引证的《每月評論》报导，在邓底[3]的工厂中，有一千零七十八名劳工都还沒有达到十八岁，大部分在十四岁以下，一部分在十二岁以下；有一些在九岁以下；最后，其中还有刚滿六岁或七岁的。然而，根据埃德賴斯当·都梅里尔先生所引证的《奧斯兰德报》，人們可以看出对于儿童剝削的后果：在曼彻斯特随便选择的七百名男女儿童中，人們发現：

在三百五十名未经工厂雇用过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二十一名，健康不良的有八十八名，身体十分强健的有二百四十一名。

在三百五十名被工厂雇用的儿童中，害病的有七十五名，健康不良的有一百五十四名，健康良好的仅有一百四十三人。

因此，那种迫使父亲去剝削他們亲生子女的制度就是一种杀人的制度。并且，从道德的观点而論，誰能設想还有比在工厂中发

---

① 夏尔勒·杜班(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兼工程师。1836年为法国科学院院长。——譯者注

② 請参閱前述的那个統計表。

③ 英国北部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生性关系的情形更不幸的事情呢？这就是向孩子們灌输恶习。克敏斯医师曾在一所梅毒病医院医治一些十一岁的梅毒病患者，讀了他关于这事的談話，怎能不令人惊駭？而在英国的一些貧民收容所中，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根据这样的事实，又能得出什么样的結論呢？

路易·勒·格朗学院的教授洛蓝先生，对王国所有的初等学校的状况写出了一篇令人悲痛的不寻常的报告。他在冗长地闡述了工业对教育的那些可恶的胜利和这种胜利对于儿童品行的影响之后，接着写道：法国已经开始感染了那些已在英国生根的同样习惯，在英国，根据《教育日报》統計，证明四天中就有一千四百十四名儿童去过十四家卖烧酒的小店。由此可見，如果沒有一次劳动的改組，又怎能制止人民的这种迅速毁灭呢？是否用法律来限制工厂雇用童工呢？这是人們已经尝試过的事情。是的，在法国，立法者的慈爱心腸既是这样，因而終于有一天上議院規定八岁的儿童可以去看一台机器。按照这条仁爱和慈善的法律，八岁的儿童将只受到每天劳动十二小时的限制。这种法律不过是抄襲了英国的“工厂法”。怎样的抄襲呀！但是，归根結底，还是必須实施这条法律。这种法律是否能实行呢？当不幸的家长向立法者說：“我有八岁、九岁的孩子。如果您限制他們的劳动，您就减少了他們的工資。我还有六岁、七岁的孩子。我沒有养活他們的面包。如果您禁止我使他們受到雇用，那么您要我让他們餓死嗎？”試問这时立法者应該怎样答复呢？有人大声疾呼說：父亲們并不願意。是否可以强迫他們願意呢？这种对于貧穷所实施的强暴作法，是根据什么法律、根据什么公平的原則呢？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人們要在

孩子身上尊重人道主义就不得不在父亲身上大胆地破坏人道主义。

所以，如果沒有一次社会改革，在这里就沒有挽救的方法。因此，在这种竞爭籠罩一切的情況下，劳动将給将来制备衰老的、畸形的、病态的、腐化的后代。啊！富人們！誰将为你們在边疆效命呢？可是你們总得需要士兵呀！

但是，这不仅摧毁貧困的儿女們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功能，而且也摧毁他們智力上的功能。根据法律的强制規定，的确，在每一个地区都要有一位初級小学的教师，但是到处都是以一种可恥的吝嗇态度来投票通过維持該教师的经費。还不仅如此，不久以前，我們曾走遍法国文化最高的两个省份，每当我們問到一个工人为什么不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时，他总是向我們回答說：他已经把孩子送到工厂中去了。因此，我們能够通过亲身的经验来证实从所有各种证据所得出的結論以及我們在大学教授洛蓝先生的正式报告中所讀到的东西，下面就是洛蓝先生的話："只要有一个轻工业工厂、一个紡织工厂、一个重工业工厂刚刚开办，那么，你就可以停办学校。"眼看着工业在向教育进行犯罪式的进襲，試問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学校还能有什么重要性呢？請你参观一些村鎮吧！这里充当教师的是一些被释放的罪犯、流氓、冒险家；那里有一些挨餓的教員离开了讲坛去耕地，他們只是在沒有别的較好的事情可做的时候才去教书；孩子們差不多到处都是群集在潮湿的、不卫生的屋子里，而且甚至是在馬廐里，在那里，冬天他們就利用牲畜的体温来取暖。有些村鎮的学校，教室同时就是老师的厨房、飯厅和臥室。穷人的子女所受到的正

是这样的教育。可是对这些穷孩子来說，这还是最幸运的呢。我再說一遍，这些情节都是从政府报告中得到的。那些政論家主张需要教育人民，他們认为要是沒有教育就談不到改善人民的状况，他們认为一切要从教育开端，試問这些政論家都想些什么呢？答案是非常簡单的：当号召穷人在学校和工厂之間作出抉择时，他的抉择是毫不犹疑的。工厂在被优先选择方面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在学校里，对孩子进行教育，但是在工厂里，却有人給錢。所以，在竞爭的制度下，人們在离开搖籃几步远的地方就夺走穷孩子，压制他們的智慧的发展，伤害他們的心灵，同时也摧残他們的身体。这是三重的邪恶！三重的杀人罪！

讀者，还要請您耐心一点！我就将結束这一悲惨的論证。人口的增加，在貧民阶級中要比在富人阶級中迅速得多，这是一个铁的事实。根据《欧洲文明的統計》，巴黎的出生人口，在最为富裕的住宅区，是当地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其他住宅区，就增高到二十六分之一。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德·西斯蒙第先生①在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对于这一点曾作了很好的解釋，认为所以发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那是因为按日計工的劳动者是处在不可能有所希望和預見的地步。只有那种对明天有把握的人，才能够按照他的收入定額来估計自己孩子的人数；而任何过一天算一天的人，只好屈服在一种神秘的命运的桎梏之下，把他的子孙都寄托于这种神秘的命运，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寄托于这个命运了。况且，有的是救济院，它們使眞正的乞丐洪流威胁社

① 来昂納尔·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小資产阶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是所謂經济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会。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灾禍呢？

如果瘟疫发生得比較頻繁些或者和平存续的期間比較短些，那就好了！因为，在現行社会制度中毁灭，可以解决一切問題，而无需再想其他挽救的办法了！但是，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少；霍乱却成为可望而不可得的疾病，这将怎么办呢？而在一定时間以后，我們对我們的那些穷人又将怎么办呢？显而易見，在一切社会中，如果生活必需品的增加不如人口增加得那样快，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面临着深淵的社会。这就是法国的情况。律比雄先生在他的那本标題为《社会結构》一书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这一可怕的眞理。

的确，貧困可以杀人。按照維累梅大夫的統計，在同一时期出生的两万个人，一万个生在富庶的省份，另外一万个生在貧困的省份，就死亡率来說，在四十岁以前死亡的，在富庶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五十四人，在貧困的省份里一百人中有六十二人。到九十岁还活着的人，在富庶省份里一万人中有八十二人，在貧困省份里一万人中則仅有五十三人。

这个用死亡来挽救貧困的办法是个最无效的办法！在保持着各种比例的条件下，貧困所产生的不幸的人，比它所能消灭的要多得多。再說一遍，有什么法子可想！斯巴达人杀死他們的奴隶，加雷尔① 令人把乞丐全都淹死。在法国，十六世紀中頒布的許多法令，把乞丐处以絞刑②。人們可以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懲罰形式之間随意选择。

① 加雷尔，罗馬皇帝，305—311年在位。——譯者注

② 見埃德萊斯当·都梅里尔：《預算案的哲学》第一卷第11頁所引证的作者。

我們为什么不采用馬尔薩斯[①]的学說呢？不，馬尔薩斯缺乏邏輯：他并沒有把他的体系貫彻到底。

莫非我們要采用1839年2月在英国出版的《謀杀篇》的学說或采取馬尔居斯的著作嗎？在这本著作中，他提議工人阶級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以后，如果再生孩子就要把他們全都悶死，但是要奖励作出这种爱国行动的母亲們。你笑嗎？但是，这本书确是由一位政論家兼哲学家严肃地写出来的，而且被一些最认眞的英国作家們評述和討論过；最后它是在公憤之下被当作一种残酷的但一点也不是可笑的东西而擯弃了。事实上，英国沒有权利去笑这些嗜杀成性的疯狂，因为那时候英国被竞爭的原則所迫，已不得不征收一种济貧稅——另一种异常荒謬的极端措施。

下面摘录伊·布尔維所著的《英国与英国人》一书中的数字，供我們的讀者們深思：

独立的按日計工的劳动者，用他的工資每星期只能购买一百二十二盎斯[②]的食物，其中十三盎斯是肉类。

由教区担負其生活的壮健貧民，每星期得到一百五十一盎斯食物，其中二十一盎斯是肉类。

罪犯每星期得到二百三十九盎斯食物，其中三十八盎斯是肉类。

这就是說，在英国，罪犯的物质条件比受教区供养的貧民的物质条件較为优裕，受教区供养的貧民的物质条件又比从事劳动的

---

① 托馬斯·洛勃特·馬尔薩斯(1766—1834)英国資产阶級庸俗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人口原理》是資产阶級反对无产阶級的思想武器。——譯者注

② 常衡一盎斯合一磅的十六分之一。——譯者注

忠厚老实人的物质条件較为优裕。这种情况岂不令人惊駭？可是这种情况却是有必要的。英国有一些工人，但是工人少于居民。既然在养活貧民或杀死貧民二者之間沒有折衷的办法，英国的那些立法者就在这两种办法之中采取了前者。他們沒有加雷尔皇帝那样大的勇气，事情就是这样。还需要知道的是法国的那些立法者是否能以冷静的头脑去考虑从英国抄襲得来的工业制度所产生的可恶的后果！

竞爭产生貧困：这是被数字所証明了的事实。

貧困的繁殖力非常惊人：这是被数字所証明了的事实。

穷人的生殖力把許多需要劳动而找不到劳动的不幸者投入到社会中去：这又是被数字所証明了的事实。

到了这种地步，社会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杀死全部穷人或免費养活他們：不是残暴就是发疯。

Ⅲ　竞爭是資产阶級崩潰的原因之一

我本来可以說到这里为止。但是一个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社会相类似的社会是孕育着內战的。倘若无政府状态就在資产阶級的脚下，那么，資产阶級以为自己內部并无无政府状态而自豪，也是枉然的。即使我們对于作为資产阶級基础的东西避而不談，难道資产阶級統治本身就不包含着即将到来的和不可避免的瓦解的一切因素嗎？

按照亚当·斯密[①]和薩伊[②]派的经济学家的說法，"廉价出售"这个伟大的字眼概括了无限制的竞爭的一切优点。但是为什么只是根据消費者从"廉价出售"中所得到的暂时利益去考虑"廉价出售"的結果呢？"廉价出售"，只有在生产者中間撒下最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的种子的情况下，才有利于消費者。"廉价出售"是富有的生产者用以打倒不太富裕的生产者的棍棒。"廉价出售"是胆大的投机者用以毁灭勤劳人們的一种陷穽。对于那些无錢购买一种价值昂貴的、而他的更富有的对手們却有办法购置的机器的制造商来說，"廉价出售"就是宣告他們死刑的裁决。"廉价出售"是高度垄断事业的执行者；鯨吸掉中型工业、中型商业和中等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資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場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譯者注

② 让·巴蒂斯特·薩伊（1767—1832），法国資产阶級经济学家。他摒弃了亚当·斯密学說中的一切有价值的、科学的部分而利用了其中所有的庸俗部分。——譯者注

資产；总之，这是为了几个工业寡头的利益而毁灭資产阶級的方法。

难道"廉价出售"，从它本身来考虑，就应該受到人們的詛咒嗎？誰也不会大胆支持这种荒謬的說法的。但是，坏的原则就是把好事变坏并貽害一切事物。在竞爭制度下，"廉价出售"只形成暫时的和虛假的好处。当斗爭还在进行时，"廉价出售"是被維持着的；而当最富有的人战胜了他所有的敌手时，价格就立即重新上升。竞爭导致壟断：根据同一理由，"廉价出售"导致价格的暴涨。这样，在生产者中間曾是战爭武器的东西，迟早会成为消費者們貧穷的一个原因。如果在这个原因上再加上我們已经列举的一切原因，首先是人口的过度增加，那么我們就应該很好地承认，消費者大众的貧困是直接由竞爭产生出来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說，这种趋向于汲干消費源泉的竞爭，推动生产达到一种高度的活跃。普遍对立所产生的混乱状态使每个生产者都不能对市場有所了解。他应該靠着僥幸来把他自己盲目制造出来的产品銷售出去。尤其是当每个生产者可以把自己的損失通过那种非常有伸縮性的工資轉嫁到工人身上去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对他自己有所节制呢？甚至是賠本生产的，也不肯不继续生产下去，因为这些人不願意丧失他們的机器、工具、原料、建筑物的价值以及尙存的顾客，并且因为在竞爭原则的支配之下，既然工业只是一种碰运气的賭博，賭徒就不願放弃擲几下交运的骰子所能使他僥幸得到的利益。

所以，我們应該强調这种結果是并不过分的，竞爭迫使生产增长并迫使消費降低；所以，竞爭恰好和经济学的目的相违背；所以，

竞爭既是压榨又是疯狂。

当資产阶級武装起来反对在他們打击下而垮台的那些旧势力的时候，他們宣称这些旧势力是处在神志不清和冲昏头脑的状态下的。好吧！資产阶級今天也到了那个地步；因为他們自己沒有看出自己的全部血液已经外流，而且他們还用自己的双手撕裂着自己的肚腸。

是的，目前的制度威胁着中产阶級的財产，同时对穷人的生存也带来了一种残酷无情的危害。

誰沒有看到"法国邮船公司"为了反对"拉斐特和卡雅尔邮船公司"同"皇家邮船公司"的联合而进行的訴訟呢？这是什么样的訴訟啊！虽然这件訴訟几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們社会情况的弱点！人們对它所加的注意远不如人們经常对于議会中勾心斗角所加的注意。但是，在这一訴訟中，令人惊訝和大惑不解的是人們沒有能够从中得出自然地应得出的結論。这个問題涉及的是什么呢？两家邮船公司为了压倒第三家邮船公司而联合起来，它們因此而被控告。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波。法律被违反了，这就是那条为了阻止强者对弱者的压迫而不許可联营的保护性的法令！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条法令禁止拥有十万法郎的人与另一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联合起来反对第三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因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第三者的破产；然而那条同一法令却又允許拥有二十万法郎的人向那个只有十万法郎的人进行斗爭！試問，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无論是在第一种情况或在第二种情况下，难道不总是一个較雄厚的資本向一个薄弱的資本进行攻击嗎？难道不总是强者对弱

者进行搏斗嗎？难道不是仅仅由于力量对比不平均就使搏斗成为可憎的嗎？一位辯护律师在这件著名的案件中說过："每个人为了使别人破产，可以使自己破产，这是許可的。"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說的是眞話，而人們也感觉到事情就是这样簡单："每个人为了使别人破产，可以使自己破产，这是許可的！"

那些为現制度辯护的政論家們，当他們将信将疑地认为危险业已来临时，当他們像《宪政报》和《法国邮报》最近在文章中所表現的那样大声疾呼时，他們所主张的是什么，而希望的又是什么呢？

这两张报紙說："唯一挽救的办法就是彻底实行这一制度；对所有反对这个制度全面发展的东西，都加以毁灭，从而最后以商业上的絕对自由来促成工业上的絕对自由。"什么！这就是挽救的办法嗎？什么！制止战争灾禍的唯一办法就是扩大战場嗎？什么！在工业內部进行着的互相吞噬还不够，还得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之上增加一种新的顚复活动的无穷糾紛嗎？他們要把我們引入混乱中去。

我們也不理解那些人想用怎样的神秘方法把两种相反的原則結合起来。把社团結合在竞争制度上是一种无聊的想法，这等于用两性人来代替太监。社团只有在普遍性的条件下才能构成一种进步。在最近几年中，我們曾看到創办了大批的合資公司。誰不知道它們丑恶的历史呢？无論是一个个人与另一个个人进行斗爭，或是一个社团对另一个社团进行斗爭，反正总是爭斗和暴力的統治。然而，資本家集团之間又是怎样呢？这里是一些非資本家的工人，你把他們怎么办呢？你拒絕把他們当作成員，难道是想把他們当作敌人嗎？

是不是有人說，动产的过度集中会分散继承原則而受到抑制并使情况不再严重化，而資产阶級的势力倘被工业所瓦解，就会通过农业而重新形成呢？这是錯誤的見解！土地产权的过度分散，倘我們不加注意，是会导致重新形成大地产的。設法去否认这一点是徒然的，因为土地分割成小块，那就是小耕农制，也就是說用鏟来代替犁，也就是用老一套代替科学方法。土地的分割使农业不能利用机器，不能利用資本。沒有机器就沒有进步；沒有資本就沒有牲畜。在这情况下，小范围的经营如何能抵抗大規模经营的竞争而不被兼并呢？这一結果还沒有发生，因为土地的分割尚未达到极限。但是等着瞧吧！在等待期間，你們看到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小土地所有者都是按日計工的劳动者，一星期中在家里做两天主人，其余的时間他就是邻居的"农奴"。他越增加他的土地，他就越来越接近农奴的地位。事实上，你也可以看看事情的经过是怎样发生的：某一个农民，自己只占有几亩貧瘠的土地，这几亩地由他自己去耕种，虽然每年使他可以得到最多不过百分之四的收益，然而一有机会，他还是要扩大他的土地的。他用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借得来的錢，去扩大他自己的土地。因为在农村里虽然缺少信貸，高利貸却是不少的。这就可以猜想到那些后果了：一百三十亿法郎，这是法国地产所負担的債务。这就是說，除一些成为工业的主人的金融家而外，又出現了一些成为土地的主人的高利貸者。因此資产阶級在城市里和乡村里都走向崩潰。一切都在威胁着他們，一切都在炸毁他們，一切都在使他們破产。

像今天那样組织起来的或者不如說那样无組织的工业，在資

产阶級內部，已经发生了可怕的道德淪亡的情况，关于这一点，我不預备多說什么，以免人云亦云，以免使眞理成为空洞的理論。一切东西都成为可以买卖的了，并且竞爭已侵入到思想領域中去了。

这样，工厂压倒手工业；豪华的商店并吞小商鋪；独立自主的工匠被不自主的按日計工的劳动者所代替；用犁耕种土地胜过用鏟耕种土地，并使穷人的土地落到高利貸者的可恥的支配之下；破产增加了；信貸的沒有节制的扩张把工业变成一种賭博，在那种賭博中，誰也沒有把握能否取得胜利，連騙子也沒有把握；最后，这种只能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喚起嫉妒、疑忌、仇恨的广大的紊乱現象，逐漸扑灭了一切光明磊落的胸怀，逐漸使一切信义的、忠誠的、詩意的源泉都干枯了……这就是采用竞爭原則所产生的后果；这是一幅丑恶而又极其眞实的图景。

既然这种可悲的制度是我們从英国人那里抄襲得来的，那么，让我們就来看一看这一制度給英国的光荣和繁荣做了些什么。

Ⅳ　被英国的例子所譴責了的竞爭

英国人曾說，資本和劳动是两个天然敌对的力量。那么应該怎样使这两者并存而又相輔相成呢？对这件事情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工人永远有工可做；而业主在产品暢銷的情况下，得到公公道道地支付劳动工資的錢财。問題不就解决了嗎？当生产无限活跃而消費有无限伸縮性时，誰还有理由来抱怨或企图抱怨呢？工人們的工資将永远够用，厂主們的純利将永远是可观的。让人类的活动无限地发展吧！并且不让任何东西来妨碍它的活力。让我們大胆而毫不顾虑地宣布放任政策吧！英国的生产是否太单調，以致不能长期給貿易提供久远的前途呢？好吧！我們就来訓练水手，建造船只，使我們可以在全世界进行貿易。我們住在一个島上嗎？好吧！我們可以到各大洲去靠岸。我們农业所提供的原料数量过于有限嗎？好吧！我們就到世界边緣去寻找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全世界的民族都成为英国产品的消費者，英国則为全世界的各族人民而劳动。生产，不停地生产，利用各种方法来刺激其他国家从事消費；英国的全副力量就放在这項工作上；那就将使英国发财致富，使它的后代的天才得到发展。

这是何等庞大的計划！这几乎是一个既自私自利而又荒謬絕倫的計划，而且这就是最近两世紀以来，英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毅力所推行的計划。嘿！当然，錮居在这样一个貧瘠多雾的小島上

的英国人，一旦离开那里，就以商品而不是以軍队去征服世界；几千条輪船駛向东、西、南、北各方；教导很多国家去享受它們自己的財富；把欧洲的产品卖給美洲，把印度的丰富的物产卖給欧洲；使各国依賴英国的存在而生存下去，并且通过世界貿易的无数联系把这些国家系在它的腰带上；英国发見黃金是一种可以与利劍相比的力量，发見庇特[①]是一个使胆大妄为的拿破侖也会踟蹰不前的人物；这一切組成了使人眩目而惊异的伟大气概。

但是，英国为了达到它的目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它那貪婪的欲望和狂热的妄想有什么止境呢？难道还必須回忆它如何侵占了埃塞奎博和苏里南，錫兰和德摩拉里，托貝戈島和圣·卢西亚，馬耳他和科福[②]，而把世界囊括在它那庞大无边的殖民地罗网里嗎？大家知道，自麦逊条約[③]以来，它是怎样在里斯本建立起它的势力的，而且它是通过怎样的濫用强权而在印度建立起它自己的商业暴政的，这是在荷兰的势力范围之旁，混杂在由瓦斯哥·达·伽馬[④]和阿尔比克尔克[⑤]所締造的殖民残迹中建立起来的。此

① 威廉·庇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是反对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拿破侖的法国的欧洲国家联盟的主要組织者之一。——譯者注

② 埃塞奎博，英属圭亚那的一道河；苏里南，荷属圭亚那的一个地区；德摩拉里，英属圭亚那的一道河；托貝戈島，英属西印度联邦的东南島屿；圣·卢西亚，英属西印度群島的中部島屿；科福，伊奥尼亚群島(希腊)的第二大島。——譯者注

③ 約翰·麦逊(1650?——1706)，英国政治家。1703年与葡萄牙签訂麦逊条約。該条約对英国商人甚为有利。——譯者注

④ 瓦斯哥·达·伽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他发現了通往印度的航路。为了征服印度，三次到达印度。他的发現，先后成为葡萄牙人及其他欧洲人的掠夺性殖民政策的起点。——譯者注

⑤ 阿尔奉苏·阿尔比克尔克(1453——1515)，葡萄牙的航海家和侵略者，曾把印度沿海的許多土地变为葡萄牙屬地。——譯者注

外，誰都知道它的貪欲給法国所造成的禍害以及通过怎样不择手段的和背信弃义的挑衅性战爭在血泊中推翻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統治。还有，对于很久以来給英国保证海上霸权的那些暴力行为，我們又能說些什么呢？英国曾经尊重或者甚至承认过中立国的权利嗎？它所实施的封鎖禁运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最蛮横的暴政了嗎？它不是把船舶检查权变成一种最恶劣的海盗行为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让我們再重复說一遍，这就是为了获得供工业用的原料和銷售市場。

两世紀以来，这种思想完全是英国的主导思想，因此，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经常使人們不去种植像稻米、甘蔗、咖啡等等那样的生活必需品，而积极地推动他們去生产棉花和蚕絲。但是怎么样的呢！英国在粮食进口方面規定了特别高的和（假如可以这样說的話）杀人不見血的稅額，而一切原料則几乎可以自由进入它的所有港口；这眞是一种丑恶的不正常的状态，以致律比雄先生曾经这样說过："在世界各国中，英国人是劳动得最多而吃得最少的。"

的确，这就是这种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所必然导致的結果。李嘉图① 曾殷勤地建立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而馬尔薩斯則以这样冷靜的头脑从它那里得出了那种可怕的結論。

这一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带有罪恶，它必然要使世界和英国遭到不幸。它以专心致志寻找消費者，也許应該补充說，寻找能够付錢的消費者作为基本政策。倘若不給人們以滿足欲望的能力，那

①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譯者注

么，喚起这种欲望又有什么用呢？英国为了想把一些民族作为消費者而以自己的活动代替其他民族的活动，就終于使这些民族破产，因为它吸干了他們的一切財富的源泉——劳动，这不是很容易預見到的嗎？而英国人使自己专門成为生产者，他們能不能希望他們的产品始終在专門从事消費的民族中暢銷呢？显而易見，这种希望是不明智的。总有一天，英国人会在使别人死于飢餓的同时使他們自己死于飽脹的。总有一天消費者的民族再也找不到可供交换的物資，这对英国来說，就会因此发生銷路堵塞、无数工厂倒閉、工人群众貧困以及信貸总动搖等等的后果。

如果要了解缺乏远見、生产的盲目性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就只要参考一下英国工业史和商业史就够了。有时，英国商人把滑冰鞋运到从未見过冰的巴西去①，有时，曼彻斯特在一星期內把过去二十年間所沒有消費完的更多的商品运往里約热內卢②。生产在扩大自己的資源、耗尽自己的精力的同时，经常是不去注意可能的消費方法的。

但是，再說一遍，一个国家如果把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責任放在别国身上，就是逐漸掠夺别国的資本，就是使它变得穷困；因而就使它愈来愈缺乏消費的能力，因为人們只能消費他們的能支付代价的物品。英国需要一些国家来消費它的产品，而它却使这些国家普遍穷困起来，这就是恶性循环。英国在这一循环中已经轉了两个世紀了；你看，这就是英国制度的罪过、深重而无法补救

① 毛胡：«巴西旅行記»。

② 同上。

的罪过。这样（我們所以强調这一观点，是因为这一观点特别重要），英国就处于这种史无前例的奇怪情况中，那就是它被两个同样有效的破产原因所支配着：即其他国家的劳动和它們的不积极劳动。前者可以給它造成一些竞爭者，而这种竞爭者是它所不能永远战胜的；后者则剝夺了它所不能缺少的消費者。

这就是在小范围內已经发生而在較大范围內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的情况。英国的产品增加得那么多，而預定作为交换这些产品的物資数量却达不到上述增加的比数，这一事实使它遭受多大損失呢？有多少次，英国按照預計的数字进行生产而由于情况的变化以致受到慘痛的懲罰呢？人們不会很快就忘記那次重大危机，它成为英国人在墨西哥到巴拉圭之間的地区上所进行的阴謀的慘重失敗。消息刚传到英国說，南美給工业冒险家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园地，立即就举国欢騰，全都跃跃欲試。这曾经成为全国性的狂热。在英国，生产从来沒有达到如此疯狂的程度。据那些投机者說，在几天內，用几只輪船，就可以把美洲所蘊藏的无限財富运进大不列顛来。信心很高，以致那些銀行也迫不及待地铸造輔币以期捷足先登。这次大規模运动的結果是什么呢？人們对于一切都計算到了，只是沒有計算到交换物品的存在与否和运輸上的便利問題。美洲有着它的黃金，而黃金却不能从矿中开采出来；而受到燒杀的国家，既无法提供棉花，也沒有靛青来交换人們給它运来的商品。这一荒唐玄妙的事件，使英国人付出无数的代价和眼泪，这一点，英国人知道，欧洲人也知道。

人們千万不要认为我們是以个别的例子作为常規而論证的。我們指出的这一罪过产生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害处。因为，一

方面英国在国外用尽了难以想像的力量使全世界都受它工业的支配，另一方面它国内的情况給細心的观察者提供什么样的景象呢？工厂接連开設；发明相继而来；北方的高炉被西方的高炉挤垮了；工业人口在无限制的竞爭的多种刺激下无限度地增长着；供人們食用的牛的数量远不及人們必須飼养的馬的数量；施舍的面包逐漸代替劳动所得的面包；济貧稅实行了，可是貧民的人数到处增加；最后，英国向惊訝而憤恨的世界展示了一幅貧富悬殊的图景：这些就是国家以自私自利的原則为政策而造成的必然結果。这个原則就是英国必須不惜任何代价到处去寻找商品的消費者。

为了形成这些灾禍性的結果，英国不是干着很多非正义的行为、鼓动叛乱、挑拨离間、制造战爭、收买罪恶的同盟并攻击各种高尚的思想嗎！

但是，我不再往下說，不去說完这段阴暗的历史，这是为了避免别人責难我，說我有意侮辱这一坚强而古老的英国民族。不，尽管英国給全世界和我国造成了灾害，但是我既不願意也不能忘記的是：英国也能在各民族的历史中占有几頁不朽的篇幅；英国比欧洲各国先获得了自由；英国的法律，即使处在貴族压迫的桎梏下时，还能給与人类的尊严以惊人而庄严的尊敬；这是从英国的內心所发出的最猛烈最强有力的呼声，来反对宗教裁判所的暴政以及和它相結合的罗馬教会的暴政；就是到了今天，它还是沒有使政治上的狂暴把它变成使弱者不能存身和遭到杀害的唯一国家。最后，唉！貧穷而高貴的被放逐者們，沒有被战敗却受了伤的大力士們，这是在那里，你們終于找到了避难所；在那里，你們重振了我們残余的事业；在那里，你們享受着心灵生活和精神生活，

而这些是你們处在大灾难的情况下，你們的敌人的憤怒让你們保持的唯一东西；从那里，你們在思想方面也追随着我們，而我們却和你們几乎是同样地不幸、同样地被放逐似的；因为我們只能偶然在自己的周围找到祖国。我們固然生活在祖国，但是，唉！看到她这样受到委屈，我們不再能认识她了！

此外，英国已经得了全面的报应。一个近代的政論家曾经說过，报应是一部对每个人和对每个民族都适用的刑法法典。这一眞理被英国的历史沉痛地证明了。今天英国的强盛达到什么地步了呢？它已经失去了海上霸权。它在印度的财产受到威胁。还在不久以前，英国貴族几乎为土魯斯① 的战胜者执鐙，他們不敢再把他叫做是滑铁卢② 的战敗者了。

而世界上这个最有势力的最优秀的英国貴族阶級变成怎样了呢？让我們找一找他們的領袖人物吧。是不是一个无名画家的儿子林德赫斯特勛爵呢？还是被庇特封为男爵的棉织厂主的儿子、罗伯特·皮尔爵士呢？或者还是韦尔斯利的爱尔兰族的衰老的代表惠灵頓勛爵呢？这些就是英国貴族阶級的領袖人物；就是这些人領导着这个阶級，統治着它并代表着它。而这些人和英国貴族阶級并不是同一血統的！

有一天，維斯特敏斯特侯爵在上議院大声疾呼地說道："有人說，我們这些英国土地所有人可以牺牲我們收入的五分之一。說

① 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城市，1814年拿破侖的軍队在这里战胜过英国軍队。——譯者注

② 比利时的居民点。在布魯塞尔以南。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一役，拿破侖被英荷联軍和普魯士軍队击敗。——譯者注

这些話的人，难道他們不知道其余那五分之四是属于我們的債权人的嗎？”

这几句話显然有些夸大。可惜，太眞实的是：在英国，采邑的不能出让就使貴族的大部分收入免于追訴，而这些收入却是无限庞大的。如果，这好像是确实的，这些收入对英国五百戶上議院議員的家庭来說就高达一亿三千五百万英鎊，而对男爵、爵士、紳士家庭的四十万人来說就高达十三亿英鎊，那么，应該承认英国貴族从全世界剝夺来的財物中得到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但是，人們已經看到了在英国商业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威胁。貴族阶級旣是所有工业合股公司的股东，人們可以預言，貴族不久就要开始受到物质上的懲罰。

至于对貴族精神上的懲罰，也沒有比这更慘痛的了。这些大貴族的財富使他們受到无名的空虛的忧郁症的折磨，这是上帝賜与世界上大人物的一种疾病，好让他們也处在痛苦之中，而痛苦是加于一切人身上的强有力的严厉的教訓！这些傲慢的貴族，在他們享受之中实际上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們所找到的是思想上的苦恼和心灵上的永远不安。于是他們就不得不逃避他們小島的浓雾，挑着使他們感到厌倦的財富的担子，前往他們曾从那里夺得金錢的世界各处去散播这笔金錢。

現在，問題是要知道資产阶級的法国是否也要效法英国。問題是要知道法国为了給自己的强大工业寻找永远是新的原料，是否要想取代圣乔治宫在海洋上的那种可恶的統治。因为，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說，那就是竞爭的邏輯所不可避免地要到达的地步。但是英国决不会不动干戈就让别人把海上霸权夺走的。

V 竞爭必然导致法英两国間的一場殊死战

如果要使两个民族間的同盟成为自然而然的，就必須使这两个民族在协議中相互提供利益；所以，必須使它們拥有非共同的富源，必須使它們在組织上和在目的上有所差别。法国和英国是两个强国，它們要依靠外国的供給而生活，并要求向外扩张；因而，它們之間的一切持久同盟就首先发生了障碍。罗馬是用战爭来扩张的，而当迦太基[①]意图用貿易在罗馬面前扩张时，罗馬和迦太基終于在世界各处遭遇，并且发生了冲突。

法英两国間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結构在今天是相同的，并且这两个国家已基本上成为航海的国家。統治着我們社会秩序的原則不就是无限制的竞爭原則嗎？无限制竞爭的結果不就是不断地增长生产和进行冒险嗎？为了給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如此不規則的生产去寻找日新月异的銷售市場，难道不是需要在工业上去征服世界，并称霸海洋嗎？

从我們摧毁了行会头子和小业主的那一天起，自然而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問題：世界上出現了一个多余的国家；或者是法国应当改变它的社会地位，或者是把英国从地图上划掉。的确，从那一天起，在这一长期的敌对情况上又增加了一些不寻常的复杂情

---

① 非洲一个繁荣的古代城市国家，是罗馬的劲敌，后为罗馬所灭。——譯者注

况，这种敌对情况在十五世紀时，曾使貝德福德公爵来到巴黎①，使查理七世逃至布尔日②。1789年，法国采用了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传統；它按照英国民族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工业民族。踏上了剧烈的竞爭道路以后，它不得不到处开設銀行，在各港口設置代理人。但是要和英国爭夺海洋，这簡直就是要英国的命。英国也分明知道这一点。从而就产生了由英国买通而組成的同盟；从而就产生了对欧洲大陆的封鎖；从而就产生了庇特和拿破侖之間的可怕的决斗。但是，庇特已经死去，拿破侖受到了慢性的暗杀，斗爭却仍然必須重新开始。也許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个斗爭：那就是使法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农业国，英国仍然是工业国。以上这些，我們的政治家們从来也沒有怀疑过，梯也尔③先生最近在議会中說道："法国应該滿足于做大陆国家中的首要国家，"这时，肯定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句話的重要性。因为倘若有人向他叫嚷，問他是不是要改变我們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又怎样回答呢？不，尽管海洋多么广闊，而在这海洋上，却不能同时既有法国又有英国的地位，这两个国家是被同样的经济法則所統治着的，因此也受着同样精神的支配。既然这两个国家都想設法向国外扩张，既然它們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生活下去，它們怎能不时常互相遭遇和发生冲突呢？問題的癥結就在这里。所以在最近的条約中，英国把

① 貝德福德公爵是英王亨利第六的叔父，英国于1415年在阿會古尔地方战敗了法国之后，他就任法国的摄政王。——譯者注

② 查理七世于1422年在布尔日加冕为法国国王，在他当政时，法国人民把当时占領着法国的英国人逐出法国。——譯者注

③ 阿道尔夫·梯也尔（1797—1877），法国的政客和历史学家，摧残1871年巴黎公社的劊子手。——譯者注

法国排挤出去的动机也純粹是貿易上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毫无疑問。帕默斯通勛爵[①]的报紙——《环球报》，說得更加明显。这家报紙說，倘若帕默斯通勛爵要冒一切危险和法国絕交，倘若他促使圣-詹姆士[②]的內閣利用叙利亚爆发的叛乱来反对穆罕默德—阿里[③]，这是因为他看到使叙利亚在商业上受英国的保护对英国来說是多么重要。帕默斯通勛爵的計划很簡单：他把叙利亚看成是东方的钥匙，而想把这柄钥匙放在英国手中。他們要和土耳其政府签訂一个协議，根据这項协議的条文，叙利亚总督要完全按照英国政府代表的意見行动。英国首相，像人們可以看到的那样，对他的計划并不保守秘密。要給英国輪船打通三条可以通往印度去的航路：第一条经过紅海，第二条经过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第三条经过叙利亚、波斯和俾路西斯坦；英国的希望大致如此。有人认为，英国为了实現这些希望，竟肯把君士坦丁堡让給俄国。《环球报》坦率地說，这三条通往印度的航路一旦打开，沿途就会到处都是市場。因此，今天的英国仍然是旧日的英国；今天像昨天一样，像以往一样，这貪得无饜的勇往直前的民族必須去寻找并且得到产品的消費者。英国有棉毛紡织品需要銷售市場？快些征服东方，好使英国負責供給东方衣着。这是否要使法国屈辱呢？对英国来說，完全不是这回事，实在說来，这是它的生存問題；而它只有在通过自己的商人去奴役世界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因为这是它的经济体制

① 亨利·約翰·帕默斯通（1784—1865），英国反动的国务活动家。曾任外交大臣、首相等职。——譯者注

② 圣-詹姆士系指英王所居住的王宫而說的，这里的意义就是說“英国的內閣”。——譯者注

③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埃及的摄政王。——譯者注

需要它这样作的。

倘若竞爭的原則仍然坚持下去，无論对英国或对法国来說，这都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竞爭必然給世界带来騷扰。假如法国为了民族自由而动武，那么所有勇士都会衷心拥护的；但是是否要从而造成追随英国残暴的后尘呢？如果最后的目的只是为了征收济貧税，那是不值得去掠夺全世界的。

目前的社会秩序是不好的，应該怎样改变它呢？

按照我們的看法，让我們来說明什么样的挽救方法是可能的。不过我們事前要向讀者声明，我們下文指出的那种社会秩序的基础，是我們只把它看做过渡性质的。

結論：按照我們的意見，人們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組织劳动

政府应当被认为是生产的最高調节者，并且为了完成它的任务，被授予一种巨大的权力。

这項任务就在于利用竞爭的武器去消灭竞爭。

政府可以发行一笔公債，用这笔公債的收入在国家工业的最重要部門中創办一些社会工場。

这种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因而初建的工場数字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正如我們下面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工場根据它們本身的組织就具有庞大的扩张力量。

既然把政府看作是社会工場的唯一創办人，那么，当然要由它来制定規章。而这种制訂的規章经全国代表大会討論和表决后，就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

在最初为了购置劳动工具而征集的資金的范围內，所有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征召到"社会工場"去劳动。

虽然現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賽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将是平等的，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慣发生改变。

社会工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指定各級人員。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們既然有时間可以互相鉴定，并且，正如我們

将看到的那样，他們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級人員就可根据选举原則产生。

每年都要結算純利潤，把它分为三份：第一份按照社团成員的人数平均分配；第二份专門用于：1）老、病、残废者的扶养；2）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工业都应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最后，第三份則用来为志願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这样，社团就可以无限地扩展。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規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一些属于某种职业的工人，这些职业由于本身的性质，不得不分散而且又局限在一地。这样，就使每个社会工場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組织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們都須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社会工場的每个成員都有随意处理自己工資的权利，但是由于共同生活的显而易見的节約和不容置辯的优越性，不久就会从劳动的社团中产生出那种自願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費社团。

資本家也可以被邀請参加到社团中来，并且可以支取他們投資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預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們只能以工人的身分分得利潤。

一旦社会工場按照这样的原則建立起来，我們完全可以看到它所能产生的結果。

在主要工业，例如机器工业、絲綢工业、棉紡工业或印刷工业中，都会有一个社会工場和私人工业进行竞爭。这一斗爭是否能

长久継续下去呢？不能。因为社会工場比起一切私人工厂来，有它的有利之处，这种有利之处是共同经济生活的結果，并且是一种組织方式的結果，在这种組织方式中，所有工人都毫无例外地关心着生产得好和生产得快。这一斗争是不是破坏性的呢？不是的，因为政府总是采取办法来阻止这些工場的产品价格降低到最低水平，以减弱斗争的效果。而今天，一个非常有錢的人和不十分富有的人决斗时，这种不平等的斗争只能是带有灾难性的，因为个人永远只是追求他的个人利益；假如他比他的劲敌以便宜两倍的价格出售他的产品，就能使他的敌手破产，并独霸市場，那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当政权本身处于个人的地位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我們所要建立的这种政权，是否会对于打乱工业、动摇一切生計感到兴趣呢？由于它的本质和地位，政权原来就是保护者，而在为改变社会的目的而同某些人进行神圣的竞争时，它还是这些人的保护者，这难道不是眞的嗎？因此，在一个大資本家今天向一个小資本家宣战和在我們制度中的政权向个人宣战之間，是不能相比的。第一种战争必然会使用詭計、暴力以及非正义本身所带来的一切不幸；而第二种战争的作战方式则是不粗暴、不破坏，并且只是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它的目的，就是用社会工場来逐步而和平地兼并那些私营工場。政府不会像今天的一切資力雄厚的資本家那样，充当市場的主宰和暴君，而是将成为市場的調节者。政府使用竞争的武器，不是为了用暴力来推翻私营工业，——这正是政府所极力要避免的事——，而是为了不知不觉地把私人工业带到組合中去。的确，如果一个社会工場在任何工业中建立起来，那么人們就会看到，无論是工人或資本家都将为了这种工場給社員所

提供的利益而奔向它那里去。在一定的时間以后，人們将会看到有利于社团原則的沒有强夺、沒有不公正行为、沒有不可挽救的灾害的現象，而在今天所产生的現象則是非常可悲的，并且由于暴政，它服务于个人主义。今天，一个非常富有的工业家可以狠狠地打击他的对手，而把他們当場打死，这样他就能垄断一个整个工业部門。在我們的制度下，国家逐漸成为工业主人，而我們成功的結果将不是垄断，而是竞爭的消灭：那就是社团。

让我們假設在一个工业的特殊部門中已经达到了目的；让我們假設那些机器制造商有意为国家服务，这就是說，有意服从共同管理的原則。既然同一种工业并不总在同一地点生产，而且既然它有不同的中心，那么，就有可能在所有属于同一种工业的各个工場之間建立一种在每个个别工場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社团制度。因为在消灭了个人与个人之間的竞爭以后，再让竞爭存在于团体与团体之間，那是荒謬的。所以，在政府已经能够控制的每一种劳动領域内都要有一个中心工場，而其他一切工場則都作为附属工場而隶属于它。正如罗特希尔德先生①不仅在法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拥有企业，这些企业和总事务所所在地互通消息，同样地，每种工业都有一个总办事处和它的分办事处。从这时起，再不会有竞爭了。在属于同一工业的各个不同生产中心之間，利益是共同的，而力量的集中将代替一切破坏性的力量的敌对。

我不再强調这一結构的簡单性，这种簡单性是明显的。事实上，你們可以注意到在第一年之后，每个工場都可以自給自足，而

① 見第24頁注①。

政府的任务只限于监督如何去維持一切同类生产中心之間的关系，并制止对于共同規章原則的破坏行为。今天，沒有一个公共机关不是比以上所說的更复杂百倍的。

試想一下，假如每人原来可以随意負責带送信件，而政府突然宣称："让我来，让我单独来办理邮政事业！"該有多少人反对啊！政府怎么能够在規定的时間內，正确地把三千四百万人每天每分钟可以写的信送到三千四百万人手中呢？然而，除了某些不是由于机构的本质而是由于我們的政权至今所存在的結构不健全而产生的缺点外，大家都知道，邮政工作是以多么惊人的准确性来完成的。我不談我們的管理制度以及这个制度所要求的一切机构的錯綜复杂性。然而你們看这个庞大的机器的活动該有多么大的規律性呢？的确，正如大家所說的那样，是分工和再分工的方法使表面上看起来是最复杂的机械装置自行开动起来的。怎么！怎能认为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使劳动者行动一致呢？而人們看到，約二十年前，在那里一个人能用他的意志来鼓动一百万人，使这些人按照他的生活来生活，并按照他的步伐前进的。的确，这是为了进行破坏。但是，既然共同进行破坏是非常容易的，难道在事物的本质中、在上帝的意志中、在社会的注定命运中，就不可能共同进行生产嗎？此外，我再重复一遍，从实行困难的角度所提出的非难在这里并不是严重的。我們要求国家用它所拥有的富饒的財富和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我們今天由一些个别的普通人所做的事情。

我們从一个工場的全体工人的团結一致形成同一种工业的各个工場的团結一致。为了使那个制度完整起見，就应該形成各个

不同工业之間的团結一致。为了这一点，我們就从每个工业已經实現的利潤分配額中抽出一笔款項，国家用这笔款項就可以援助那些受到突如其来的或特殊的情况的襲击的工业。此外，在我們所建議的制度中，危机一定要少得多。今天大部分的危机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是从一切利害冲突的残酷战斗中产生的，这种战斗既然造成一些战胜者，就不能不造成一些战败者，并且像所有的战斗一样，它把奴隶套在战胜者的战車上。消灭竞争，就可扑灭它所孕育的灾禍。不再有胜利；就不再有失敗。从此，危机就只能从外而来。所以也就只需防止这些外来的危机就够了。和平和同盟的条約对此无疑地是不够的；然而，倘若人們以一个建立在工业需要和世界各地劳动者的相互便利的基础上的同盟体系，来代替这一可恥的外交——这种虚伪、欺騙和卑鄙的斗争，它是以几个幸运的强盗瓜分各民族为目的的——，那么，該能避免造成多少灾难呢！但是，我們应当注意的是，只要那种吞食着我們工业的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这种新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实行。从几年来进行的許多調查来看，就显得非常清楚。怎样的凄惨景象我們沒有見到呢？这些調查不是已經給我們指出，殖民者武装起来反对制糖商、机器工人反对铁厂主、港口反对內地的制造厂、波尔多反对巴黎、南方反对北方、所有生产者反对一切产品的消費者嗎？在这些异常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一些人所迫切要求的东西，就是另一些人所憤怒地拒絕的东西：使这些人得以生活的东西，就是使另一些人死亡的东西。

显然，这种在利益之間的缺乏团結一致就使国家不可能有任何預見性，并使国家在它和列强的一切关系中受到束縛。对外用軍

队，对内用宪兵，今天的国家沒有別的行动办法，而它的整个效用必然只限于摧毁一方以防止摧毁另一方。如果国家坚决地着手領导工业；如果它能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如果它围绕着同一原則把今天一切敌对的利益重新联合起来：那么，它的对外行动怎能不是更加明确、更有收获和更加庆幸地具有决定性呢？重新組织劳动，不仅会预防在我們当中爆发危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預防那鼓起我們船帆的风所給我們带来的危机。

我是否需要继续列举新制度所产生的优点呢？在我們所处的这个工业世界里，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灾害，首先因为机器排挤了那些为了生活而需要劳动的工人，其次，因为有多少机器就是有多少杀人的武器，給予有权利、有能力使用机器的工业家去反对沒有这种权利或能力的人們。在竞爭的制度下，誰一談到新式机器，誰就談到壟断；这点我們已經证明过了。但是，在社团和团結一致的制度下，不再有发明的专利权，不再有专利的专用权了。发明者由国家給与奖励，他的发明很快被大家使用。因此，今天的毁灭性的工具将成为普遍进步的工具；今天使工人陷于飢餓、絕望并促使他起来反抗的东西，将只成为用来减轻他的工作負担并給予他以足够的空閑时間去鍛炼他的智慧的东西；总之，以前助长暴政的东西都将有助于博爱的胜利。

我們今天置身在不可理解的混乱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业并不从属于也不能从属于生产。既然一切生产都归根結底为了寻找消費者，而所有生产者都致力于爭夺消費者，那么，怎么能免除经紀人、掮客、买卖人和小贩呢？商业就这样变成了生产的蛀虫。介于劳动者和产品消費者之間，商业統治着这两者，并利用一方来統治

另一方。傅立叶① 有力地攻击了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和他的門徒維克多·孔西代朗以一种不可抗拒的邏輯赤裸裸地揭露了人們称之为商业的这一社会的大禍害。商人应該是生产的一个代理人，分享生产的利潤，并与生产的有利与否休戚相关。那就是理智所要指出的，也就是全体利益所迫切要求的。在我們所建議的那个制度中，沒有比这点更易于实現的了。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工业中消除了各个生产中心之間的对立情况，这个工业就像今天的那些重要貿易公司那样，到处都有根据消費需要而設立的商店和仓庫。

信貸应該是什么呢？应該是給劳动者提供劳动工具的一种方法。而今天呢，正如我們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信貸完全是另一回事②。銀行只把款子借給富人。即使銀行也願意把錢借給穷人，它也不能这样做，否則它就会墮入深淵。所以，无論如何，以个人观点建立起来的銀行永远只能是一种設想周到的使富者更富、强者更强的方法。垄断总以自由的外表出現，暴政則总以进步的面貌出現！我們所建議的組織直截了当地消除了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特别地和不可变更地专門用于招募工人以扩大社会工場的这一部分利潤，就是信貸。这时候，你們还需要銀行做什么呢？取消它吧！

当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时，任何劳动者必然会有遵守秩序的观念和預見的习惯，那时还怕会有人口过剩嗎？为什么今天穷人比富有的人繁殖得更快呢？关于这一点我們已经說过了。

在一种制度下，每种劳动門类都把一定数目的人聚集在一起，他們被同样的思想所鼓舞，按照同样的动机去行动，有着共同的希

① 夏尔勒·傅立叶（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譯者注

② 参閱論文«銀行問題»，載1839年12月1日的«进步杂志»。

望和共同的利益；試問，在这种制度下，伪造产品、投机取巧、漫天說謊、貪污舞弊等等的行为还有什么存在的余地呢？而今天，每个生产者和每个商人，既然必須不惜任何代价要搶走邻人手里的顾客和他的財产，就不得不去做上述的那些行为。所以，在这里，工业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道德革命，并且，它在一天之內所能完成的轉变，要比讲道者的說教和道学家的一切劝誡在一个世紀內所做到的还要多。

刚才所談到的有关工业的改革将使我們充分預見到，我們所要見到的农业改革将按照什么原則并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濫用旁系亲属的继承权，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继承权将要被取消，继承財产所包含的价値将要被宣布为公社財产。这样，每个公社就可以形成一片不得轉让的庄地，并且，由于这种庄地只能扩大，就能在既不造成痛苦也不发生强夺的情况下导致一次庞大的农业革命；公社庄地的经营应該以較大的規模并按照和管理工业的法令相符合的法令来进行。我們以后再談这个問題，这个問題还需要加以闡述。

在目前的制度下，我們已经知道人民的子女为什么不能受到教育。而在我們的制度下，受教育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們必須使教育成为义务的同时是免費的。既然劳动者的生活有了保障，他的工資也够开支，他有什么权利拒絕让自己的子女入学呢？很多严肃的思想家认为，今天在人民的队伍中来推广教育是危险的，他們的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是，他們怎能不看到这种教育的危险正是我們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有力证据呢？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是虛假的：劳动不受尊重；最有用的职业被人蔑視；一个劳动者至

多只不过是受人怜悯的对象；然而，一个舞女却会博得无数的花冠。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的教育是危险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們公立中学和一般学校給社会栽培出来的人只是一些野心家、一些不知足的人和一些草包。但是，应該教育人民去閱讀好的书籍：教育人民使他們懂得最有利于全人类的东西才是最可尊敬的东西；使他們懂得在社会中只有艺术而沒有手艺；使他們懂得沒有比那些本质上就是为了腐蝕灵魂、向灵魂灌輸驕傲的毒素、使灵魂远离博爱的实践并传播自私自利思想的东西更加値得轻蔑的了。然后，应該給人民的子女指出，社会是受他們学到的原則所支配的。难道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嗎？人們把教育看作是能滿足一切愚昧虛荣和空洞自負的墊脚石，因而人們就咒罵教育！有人参照坏的实例写出坏的书籍，因而有人认为有充分的权力来禁止别人閱讀坏书！多么可怜啊！

让我們綜述一下。应該进行一次社会革命的尝試：

1.因为目前的社会秩序充滿着太多的不公平、貧困、卑鄙，因而不能长久存在下去；

2.因为不論一个人的地位、等級、財产如何，他不会不关心一个新社会制度的建立的；

3.最后，因为这是一次十分必要的革命，所以有可能甚至不难以和平的方式去使它实現。

在革命使我們进入的那个新世界中，为了使博爱原則完全实現，可能还应該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是教育的事业，至少就实現博爱原則这一点来說就是如此。人类业已远离他的目的，以致我們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达到这个目的。我們至今还受其束

縛的腐朽的文明打乱了各方面的关系，同时也攪乱了所有的思想，并且毒化了人类智慧的源泉。不公平变成正义；謊言成为眞理；人們在愚昧无知中相互毁灭。

很多錯誤思想应当加以摧毁：它們将被消灭，我們对此不应当有所怀疑。举例来說，总有一天人們会承认，誰从上帝那里得到較多的力量或較多的智慧，誰就对自己的同类要担負較多的責任。于是天才不再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征取的巨額报酬、而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尽的伟大义务来确定他的合法地位，这是他的本份。因为，秉賦的悬殊不应归結为权利上的不平等，而是义务上的不平等。

这一制度，其基础还刚奠定，而自公布以来，就引起了很多的責难。这是必然的。今天在所有人們的头脑里，对新事物有着小心翼翼的自然傾向。

然而，把我們的学說作为对象的那些批評，一般地具有一种恰如其分和不偏不倚的突出特点；这些批評甚至对于我們的努力的性质和目的表示了强烈的同情①。

我們所談的这些問題具有一种特別的重要性；要解决它們，当然有巨大的困难。所以我們也只把这本书作为耐心和认眞研究的結果来貢献給大众。如果我們犯有錯誤，就請給我們指出；我們的信心是坚定的，但我們也并非这样自負，认为这些信心是根本不可动搖的。

① 关于这一問題，我們不应忘記的是，这本书被禁止以后，曾经攻击本书学說的«世紀报»就以最大的毅力起来反对那次訴追。毫无疑問，要使法院正确而迅速地糾正检察机关的錯誤，固然无需这样大的力量；但是我們仍然不应該不向«世紀报»的总編輯尙博勒(Chambolle)先生表示感謝，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中曾給予我們以高貴的和友愛的支持。

对各种批判的答复

我們将逐一研究人們曾经向我們提出的批判，并且，为了不致削弱这些批判的力量起見，我們把它們的原文轉載在这里①。

請看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是用什么样的話来解释我們的制度的。②

“让我們直接研究这本书的內容而不去研究它的形式，也不加以評定。該书闡述的制度是公众所关心的。这就是在某些人头脑中所孕育的一些观念，除略有出入外，有些作家是不約而同地支持这些观念的，人們目前正在設法使这种观念在工人阶級之間得到信任，并且已在工人阶級中找到一部分拥护者。根据路易·勃朗先生作为解释者之一的該学派的观点，劳动組织就是由国家拨款开办社会工場，首先在国家的最重要的工业部門內創办，然后相继在其他各部門內創办。国家制訂社会工場的章程；交由全国代表大会討論，通过后，就发生法律的效力。

“一切在道德上有保证的工人，都可以被召募到社会工場中去工作。

“第一年，由政府来安排各級人員；但在这一年以后的期間，工

① 直到目前为止，曾討論我們計划的报刊，計有：«世紀报»、«宪政报»、«喧嘩报»、«法郎吉报»、«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环球报»、«十九世紀評論报»、«商业报»、«人民日报»、«两种世界評論»、«車間报»、«辯論日报»等。

② 見1844年8月21日的«辯論日报»。

人既然有了充分时間可以互相鉴定，各級人員就可以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純利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社团成員平均分配；第二部分专門用来扶养老、病和残废者，并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第三部分則用来扩大工場，給那些願意参加工場的人提供劳动工具。

“在那些可以进行大規模经营的工业的每个社团中，可以招收属于某种职业的人——这些职业由于它的性质而不得不分散开来和局限在一处。这样，就可以使每个社会工場都由各种不同的职业所組成，这些围绕着一个大工业而組织起来的各种职业成为同一整体的各个不同部分，它們都須服从同样的法律，并分享同样的利益。

“工場成員之間的工資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等是暫时的。按照路易·勃朗和他的朋友們所了解的平等和博爱的意义来說，在经过了一段时間，教育把人們的思想都准备好了之后，所有的工資都将变成相等的。

“社会工場的每个成員都有随意支配自己工資的权利；但是，不久就会从生产的社团中产生出自願参加的关于需要和享乐的消費社团。

“資本家也可以被邀請参加社团，并且可以支取他們投資的利息，这种利息是在預算案中得到保证的；但是他們只有以工人的身分才能分享利潤。

“不久，私人企业、小业主和工人，将成批地要求加入社会工場，并且由于这些社会工場的竞胜能力是相当强烈的，所有的人都

把能参加社团看成是一种照顾。从此，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間后，零散的工业就将消失，今天蹂躪着世界的竞爭也将从世界上消逝；黃金时代将閃爍着光芒，阿斯特里①就将統治世界。

"这就是这一制度的忠实的摘要。在摘录路易·勃朗先生的論述时，我們尽可能地采用了他的原文。

"这一制度以值得贊揚的情感出发，就是要消灭无限制的竞爭所带来的令人煩恼的后果。五十年来，几乎无限制的竞爭已成为工业上的法則；在这种竞爭的后果中，有些灾难性的后果压在所有的工业阶层上面，压在工人身上也压在工厂主的身上；有些后果是人們所悲叹的，是为公共道德所譴責而要加以消灭的。不稳定、不景气、詐欺、暴力，经常是这一种制度的特征，我們也曾加以揭露，并且要求提出对它們的补救办法。但是，我們和一些有智慧、有理智的政論家一起把这些缺点看作是世界上最近实施的但实施得不徹底的一个新原則所产生的良好后果中的一些煩恼的后果，这一个原則就是自由的原則，它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和不朽的原則。如果要增产果实，我們想，只須修去树上的废枝，以小心和熟练的手法把杂乱蔓生的枝叶除去。

"如果我們沒有弄錯，并且我們要求讀者对此加以判断，路易·勃朗先生所属的那一急进学派却要人們把那棵树齐根砍掉。根据这种打算，不仅得到的果实少，甚至会一无所得：任何人都一无所得。穷人也会像富人那样餓死。的确，路易·勃朗先生和他的朋友們的信念則正与此相反；他們自負地认为他們可以使另一棵

① 正义的女神。——譯者注

壮丽的树生长出来，人类可以在这棵树蔭下找到美满无比的游息之处，而它的丰富的树汁可以供給人們一种鮮美的生活資料。让我們来研究一下，他們是不是弄錯了。让我們来看看，他們有意栽植在地里的那棵树能否从地底下吸取到一些营养的液汁，它是否有生活力，人类本性的規律是否不会使它立刻枯萎和死亡。

“誰拟訂一种改組社会的制度，誰就必然会受到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哲学思想的启发，也受到对于人类心灵的或好或坏的論证的启发。当他目光浅短、思想貧乏时，他是不加考虑地接受影响的；而当他具有一个能够思考的头脑时，他是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接受启发的。我們把路易·勃朗先生列在第二类之中，我們要向他請問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路易·勃朗先生的主导思想，就是那些时时刻刻在他的著作中透露出来的思想，不外以下两点：

“第一：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絕对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責任感来治理自己。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社会的和个人的进步，公众的和私人的幸福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靠个人利益来发生作用。沒有必要直接去刺激个人利益。一个間接的誘餌就足够了；个人利益并不值得人們更多地加以重視。誰談起个人的、直接的、切身的利益，誰談的就是貪欲。因而，路易·勃朗先生得出結論說，虽然社会工場的成員在很好地完成他們的任务时只得到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利益，他的那些社会工場还是会繁荣的；

“第二：社会的最后目的就是絕对平等。我們已经接近了这一目的；再加一把劲我們就会达到了。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所有

的人都可以得到平等的报酬。在社会工場成員之間，也就是說，在一切人与人之間的工資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一个暫时的意外事件，是全世界最高法則的暫时的例外；不久以后，由工資不平等所产生的差別就要被取消。以下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現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賽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的差別将根据职务的大小而定，一种完全新型的教育一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慣发生改变。

“但是，这两种主导思想根本上是錯誤的。建立在这些思想上的一切社会体系是一种幻想。人类的心灵是和路易·勃朗的观念相反的。他将对我說，人类的心灵是多么无聊。——可能是这样，但与其說人类的心灵是多么无聊，还不如說您的計划是多么无聊！人是怎样您就应該怎样来对待，而不要把他当成您所希望的那样来对待。在絕大部分人的心中和在絕大多数情况下，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个人权利的感觉超过了責任感；利害关系的思想超过了牺牲的思想。个人权益的密切而直接的感觉是不断地活动着的动力；在实业界中，在工业的交换中，在劳动領域內，这一感觉指引着并将永远指引着人們。如果你加以抑制，工业就要蕭条，并且就会停頓。此外，在艺术上也再沒有进步，工人中也再沒有热情，車間里也再沒有生气了。法律和宗教向人們宣揚責任感，并把牺牲光荣化；对此，我們衷心表示感謝。一旦責任感消失，那么社会也就要灭亡。一旦牺牲与克己不受人类的尊重，那么社会就会腐敗。但是权利感是会自行发揮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我們每个人都是权利感的說教者，并且可以发現自身是一个馴从的志願入道者。

与众不同的，是那些优秀的人物，也只有他們才不是这样。您可以替新西納图斯[①] 建立銅像，您可以对殉道者奉献花圈，但是您不能希望人类在实际生活的习惯行为中，在飯碗問題上，把以上两种人的克己精神当做模范。而且，我以为，就是上述两种人在日常的交易中，他們自己也是按照一般的办法行动的，并且他們也許都有强烈的利害观念。——作为地主的新西納图斯，在出卖他的谷物时，他大概也跟旁人一样，竭力要从买主手里得到最高的价錢。老伽图[②] 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責任心很强的人，但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却是非常精明的；圣保罗，伟大的圣保罗[③]；当然是一位虔誠无比的人，可是当他制作帳篷时，如果他感觉到他每日的面包只有依靠他个人的劳动，也許他就不会有这样大的灵感了。

“对所有的人給以完全相同的分配来实現平等思想，这就是不懂得人和历史。我們祖先在1789年所宣布的并在18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种眞正平等，未来也属于它的那种眞正平等，是在于消灭由于出身不同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平等的意义就是在法国再沒有世代相传的特权貴族和在貴族下面的第三等級。法国人是平等了，这也就是說法国是一个全国一致的国家，也就是說，国家的特殊荣誉应該属于有才干的和服务得好的人，而不看

① 新西納图斯，紀元前460年罗馬的执政官。他的生活簡单朴素，并且亲自种地。古代罗馬人把新西納图斯看作是忠勇和生活簡朴的典型。——譯者注

② 老伽图（紀元前234—149年），紀元前195年为罗馬执政官，紀元前184年为罗馬监察官。——譯者注

③ 基督的使徒。——譯者注

他的出身如何。其意义也就是：国家应当对各个方面給予同样的支持和同样的关怀；国家应該保护这个人的土地，保护那个人的年金，也要保护既无年金又无土地的第三种人的劳动。这也就是說，国家应該通过教育来使所有的人培养成为对社会和对自己都是有用的人；教育的目的还应該是在村庄里像在城市里那样，在茅屋和陋舍之下像在大廈和富宅之下那样，到处細心地去发現社会所需要的超人，使社会的事务得到很好的領导。但是，使所有的人，无論是高級官員或者是最低賤的临时工，都毫无例外地度着同样物质生活的这种思想是只有天眞的中学生才会有的幻想之一，正如这种中学生，当他刚出飯厅并不飢餓的时候，他对斯巴达人所食用的那种又黑又粗的粥糊抱有过高的想像那样。这不是平等，这是最可恶的暴政的粗暴的不平等。請您設想一下，所有的劳动者，也就是所有的公民，在一个軍营里都过着路易·勃朗先生向他們建議的共同生活：王公或总理、部长們、最高法院的法官們、社会事务的領袖們、那些用思考来安排并管理着人民工作的人，使用公用的木碗吃着一般的飯食；在公共的大厅里，以一般人所用的同样的娛乐来松散他們的沉重思虑；在那种和最普通的公民所居住的相同的編号房間中思考祖国的命运、社会的一般利益；在与最普通的公民同样的环境中，在家庭用具和孩子們的吵鬧声中，他們得到启发。这是不严肃的。只有在掌握权力的人兼并了所有的利益并且霸占了所有的財富时，才会使强烈的想像力狂热地产生出类似的空想，或让自己受到这些空想的誘惑。倘若我是在土耳其，作为一个被土耳其总督在前一天夺走了最后一只羊、砍去了最后一棵棕櫚树的不幸的基督徒，我或許会产生这种梦想。但

是，在法国，在我們这个时代，公共职位的待遇是这样的微薄，以致对于一个有一点能力的人来說，接受这种职位就等于作了物质上的牺牲，并且公共职位也并不提供任何精神上的补偿；在我們这个时代，像革命的意识和革命的教育所造成的那种領导人的地位是値得怜悯而不値得羡慕的；在我們的国家中，既然首要的政治要求是使政府具有威信，而首要的社会要求就是要有各級領导人員，那么，这些使領导人的生活縮减到这种地步的計划，是无法自圓其說和无法加以諒解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的制度所依据的两个基础是既不坚固又不一致的。仅仅靠責任感是不可能建設一个社会的；革新者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就会忽略人类一般行为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至少忽略那种能使人奋发的力量的一半。在社会建筑上，起凝結作用的是責任感；但是，使各种材料彼此聚合的却是个人的情感。絕对平等不只是妄想，而且是极端非正义的；这是对世界上最高貴、最純洁的东西的蔑视，是一种可耻的黑白不分。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一制度就会全部垮台。为了从另一个观点来評价这个制度，让我們在这种淋漓尽致地詆毁竞争的說法中，找出一些正当的和恰当的东西。让我們来研究一下，竞争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灾害，人們是否把竞争說成是另一种东西，或者相反地，它虽暂时給予人們以痛苦（其苦味我也可以承认），却是路易·勃朗先生用他們的名义今天对竞争痛加攻击的那些人的前途得到改善的条件。

“自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路易·勃朗先生，通过他的社会工場的选举制度造成了大多数人的暴政，并且通过絕对平等組织了对于

高尚人物的奴役制度。同样，由于取消了竞争，路易·勃朗就消灭了物质进步的动力；并使那种应該有一天能够完全消灭貧困，从而有可能使人类社会完全从貧困下面解放出来的力量陷于瘫痪。

“竞爭造成了物价低廉：这一眞理传遍了街头巷尾，同时也使身居高楼大厦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人們在街头墻角、在雕梁画栋——如果这些雕梁画栋还存在的話——之下到处找得到的眞理，就必然是一些好的眞理。物价低廉，如果不是那些不富裕的阶級的物质方面的解放，該是什么呢？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减低到相当的程度，使得一个人——他除了仗着双手的劳动为生，别无其他生活的来源，并且他的智慧虽是平庸，然而他本人却是勤勉的、循規蹈矩的和誠实的，——可以用他自己的工資，随时为他自己和他的小家庭的美滿生活而购置一些必需品，得到丰富而有益于健康的食品、一所在冬季可以把門窗关起来的和生着火的房子，穿着洁凈的服装，并且在星期天可以使他的伴侣穿上一套相当漂亮的服装，那时，就将完成一次对貧困的巨大征服了。我同意路易·勃朗先生的說法，我們距离这个目的还很远，但是他也会同意我的意見，就是五十年以来，我們在显著的程度上接近了这一目的。但是，我們要怎样并且通过哪条道路达到这一目的呢？

“1789年，我們的祖先曾想給法国找到这些幸福以及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其他許多幸福。他們摸索、探討，参考以前各世紀的經验，請教旧社会有才智的人們的意見，而且，他們即使把基督教义踩在脚下，却也从它那里得到启发。最后，在作了长时間的內心的检查，对他們的周围作了长时期的观察之后，为了

希望人类能够达到幸福的前途（神明的启示告訴他們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肯定的，然而他們对于使他們的后代得到这个幸福的前途比他們自己达到这个前途希望得更加热烈），为了达到像他們所理解的那种平等（这种平等在他們的思想中包括上述一切优点），他們就选择了自由的道路。

“但是，在工业上，自由就意味着竞爭。

“所以，絕对地、系統地譴責竞爭，这就是不贊成1789年的原則，这就是否认那采用了这些原則的文明；这就是要我們的祖国椎胸自悔，請人类饒恕它把人类引向錯誤，并且这就是要我們的祖国滿臉羞愧，內心絕望地向后倒退。

“竞爭是自由在工业上的化身，因此，竞爭就像自由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具有它的流弊那样也产生了流弊。竞爭場上标志着一些失敗、一些灾难，并且撒播着破产，它往往是浸潤在泪水中的。有多少次，家庭的前途在这里被毁灭！多少正当的希望在这里变成泡影！多少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儲蓄在这里被吞沒！多少勤劳忠实的人們在这里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名誉！我并不隐瞞这点，我对这点比任何人更加感到惋惜。但是，自由的竞賽場上布滿着断垣残壁，无恥的行为玷污了它那神圣的土地，它也曾浴于鮮血之中。有一个时期，曾开始运用了可怕的断头台，我还可以說，神化了断头台，因为人們还說它是‘神圣的断头台’；无神論在这里統治了几天，值得人类詛咒的魔鬼在这里制訂了法令。难道說，这样就应該咒駡自由嗎？

“所以，为什么要使竞爭对于用它的名义已经造成并且正在造成的謊言、恶行和强暴負責呢？竞爭的原則如果不是永远地、也至

少在长时期內将成为工业上的法則。我們这个时代的人所应当做的，就是在它的实施中防止它走向极端。千万不要让自己受邏輯的指引，对一个独特的原則作出极端的推断。应該在那些互不相容的原則的相互之間維持平衡。因此，为了避免竞爭的流弊我們不应該忽視任何一点。倘若現在我們不能完全治愈竞爭所发生的灾害，那么我們就应該設法减轻这些灾害。为了得到这一效果，我們要为竞爭、即为工业自由做出我們曾为政治自由有成效地作过的事情，这一成就不久就会更加显著。自从1830年革命的那些日子后的第二天起，我們就把政治自由和秩序联合起来，并把公共秩序与自由并列，这曾经是一次有益而伟大的进步。有了这种新方向的法国政治不是就曾避免了不少的不幸嗎？同样地，在工业方面，我們不要再把竞爭的概念与联合和团結一致的概念分离开来。这样立刻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措施。但是取消竞爭，那是絕对不行的！

"可供人类使用的原則并不太多。文明不能像人們換衬衫那样改变原則。所以，让我們尊重那些原則，这些是我們祖先費了那么多的心血建立起来的，并且它們毕竟是像世界那样古老、像正义那样永恒的。在我們祖先用血凝成的基础上，我們应当尽力不作任何与他們高尚情感相抵触的事情，这种情感鼓舞了他們，給他們启发了那么大的力量，而且也是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但是，我們千万不要試图推翻这个基础。如果这样做，这是一种亵瀆神圣的企图；也是一种对我們自己的侵害，而且我們将会失敗的。自由的原則同荷馬所說的那些巨大的岩石一样，荷馬說，齐集在特洛伊城前的希腊的英雄們曾用他們有力的双臂把这些岩石举起来，并把

它們抛得很远；但是，后世的最强壮的人企图在地上把它們推动也都沒有办到。

"米歇尔·舍伐利埃。"

对于讀者刚才所閱讀的这篇《辯論日报》上的文章，我們用下列函件作为答复，这一函件登在1845年2月17日的《辯論日报》上。

編輯先生：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在評論我在四年前所发表的題为《劳动組织》一书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思想加在我身上，并且根据这些思想来反对我所主张的制度，对这一制度，我在受到他的批判之后，仍然坚持是好的。先生，能否允許我請貴报讀者在我和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之間担任評判員，因为所引起的問題也許有着十分普遍的重要性和十分重大的意义，足以证明这样的一次破例举动是必要的。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一开始就責备我，說我把我的制度奠基于下列思想上："人类社会如果不是絕对地、也至少是主要地可以用責任感来治理自己，而个人利益只是次要的动力。"

是的，我相信，我很荣幸地相信通过教育而适当地得到发展的責任感的力量。在这方面对我的責备使我很高兴，我接受这种責备，并且引以为荣。但是，像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以及所有的人那样，我认为，人类的活动可以在个人利益中得到一个非常有力的和无可怀疑的动力。可是，他們也許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个人利益必須与責任感相結合，以免以不光彩的手段对付社会；他們也許将同意我的看法，就是当社会秩序不是使上述那种結合成为永久

的和自然的，而相反地使它成为不可能时，这种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坏的。現在，問題就在于此。

竞爭制度，从它的性质来說，給予个人利益以一种反社会的傾向，給予它一些和責任感相违反的鼓励；为此就必須攻击这个制度。所以，对我們来說，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幼稚地去否认个人利益的力量，而是要使它高貴化、純洁化，使它富有活力。

我們看到在社会中竞爭起了什么作用？竞爭給个人利益安上了兀鷹的翅膀和貪得无厌的心。在生財之道上，成千上万的竞爭者蜂涌前进，他們疯狂地彼此挤压，互相碰撞，互相践踏。而人們竟敢冠以"自由"的漂亮名字的工业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每个劳动領域中，吸引了不受数目限制的并且不断增加的生产者，因此，新来的人为了得到自己的地位，就不得不对竞爭道路上所碰到的人进行一場殊死的战斗、一場激烈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呢？那就是伪造贋品、有計划地降低物价、造謠、誣蔑以及各种各样的狡猾手段。为了增加自己的顾客，商人就必須把邻人的顾客拉去。科学在发明了新的方法时，也只不过把一根棍棒交給某些人来粉碎他們的对手。在竞爭制度下，一个人的发財致富岂有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用别人的破产造成的呢？誰能說一个暴发戶的幸福不是由許多零星的灾害組成的呢？你們是上升了，但是你們是用受害的人来做你們的台阶的。这就是在目前的制度中正在起着作用的个人利益。試問，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責任感还有它自己的地位嗎？

我所談的这一斗爭不仅是激烈的，而且还是极端不平等的；这一斗爭使穷人和富人、使弱者和强者、使具有一切冒险机会的投机

者和只有劳动机会的誠实人进行交鋒。胜利属誰还会有疑問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很懂得，像在其他的战役中，胜利是属于拥有巨大兵团的一方那样，在工业战爭中，胜利是属于拥有雄厚資本的人的。在这样的社会場合，个人利益只是通过一系列激烈的斗爭、通过一連串不公平的失敗、通过各种无情的貪欲之間的不断冲突、通过普遍的和空前的貪得无厌而表現出来的，而人們却夸张个人利益的力量！可是人們責备我們，說我們否认了个人利益的力量，因为我們反对这种力量的这些丑恶的表現。

但是，該怎么办呢？怎么办？就是要改变那种在本质上使个人利益和責任感不能互相結合的社会制度；并且，要拿出善良的心腸来奠定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制度中，任何人只有通过公共利益的胜利才能找到个人利益的滿足。組织劳动社团就解决了这一問題。例如，在我們所建議成立的社会工場里，个人利益毫无疑問是得到照顾的，因为每个劳动者都能分享利潤。只是，不提高大家的利潤，也就不能提高某几个人的利潤。这样一来，竞賽并沒有被消灭，而是純洁化了；个人利益不再挑起仇恨，而成为一种彼此亲善的方法，一种对于博爱的鼓励；对个人的鼓励并不丧失它的力量，并且成为道德上的力量了。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預先非难說，在一切社团制度中，个人利益总是間接的，因为它带有一种集体的性质。我认为他的这种結論是不合邏輯的。一个工人既然可以分享利潤的一部分，那么，利潤的增长对他是有利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利益更为直接的了。但是，什么！难道在集体利益中沒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作用嗎？难道在軍队里，对国旗的忠誠不就是属于集体荣誉的利益嗎？

难道人們沒有見到成百万人在光荣的集体利益的影响下热情地奔向死亡嗎？难道不是由于一种集体感才产生了天主教的无限权能，奠定了所有伟大的机构，鼓舞了所有伟大的事业，产生了所有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在历史上出現了人类意願的最高权能嗎？这种使我們对我們民族的尊严如此关心的利益，这种叫做“祖国”的集体利益，难道沒有力量嗎？人們既然能够把上述的那种利益完全用来为战争和破坏服务，那么怎能叫我們信服，认为永远不可能把它用来为生产和人类的博爱而服务呢？

請明白下列各点：我們并不主张人們为了人民的解放而牺牲人类的人格、个人的权利，但是，我們要求通过社团原則的旣謹愼而又广泛的应用，个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希望和欲望同社会其他成員的福利結合起来。

我是否认眞地尊重个人的利益呢？是的，这是当然的事；正是为了个人利益，我們才攻击这个产生无产者的制度的。个人利益的那些需求旣然如此値得人們加以尊重，那么，对于那么多不幸的工业奴隶和传动带的仆人，你們为什么又不尊重了呢？什么！个人利益是非常神圣的，可是在你們給它辯护的那个社会里，我看到有很多人过一天是一天；他們弯着腰干着沉重的劳动，挣的錢只能使他們免于餓死；他們耗尽体力去創造一些他們永远不能分享的享受。啊！那些了解人类心灵、并且不把理論建立在幻想上的人們，那些眞正实际的人，只有他們懂得：个人利益如果在一些人身上受到尊重的話，那么，在其他人身上也应該受到尊重。在今天的社会里，摆在我們眼前的是什么景象呢？在上面，是吃人的和沒有节制的竞争；在下面，則永远是带有威胁性和悲慘性的单調的劳

累和痛苦。这是一种正常状态嗎？回答是很簡单的，并且也非常可怕的。今天，沒有一个人在入睡时能够很有把握不会在暴风雨中醒来；我們明智的政治家們仅能了解到，革命随时准备着敲打社会的大門。

再来談談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的另一种錯誤。他責备我，說我指出絕对平等是社会的最后目的。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我們。人們旣沒有相同的机能，也沒有相同的需要，而且只能仗着使用基本上不同的秉賦来生活在社会中，显然，宣传絕对平等，这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用来批評我的那些辞句，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曾经肯定过的并且我願意再重复一遍的就是：如果根据能力規定的等級制度是必要的和富有生命力的話，那么，按照能力而分配的制度却就不然。領导人类社会这項使命并不是一件小事，因此不能把它也当作可以进行买卖的东西；誰当領导人，誰就应該作出牺牲。毫无疑問，报酬必須足够得使人們能够从容地去执行职务；但是，为了不使政权变质，不过分貶低政权的地位，不誤解政权的本质和它的伟大，人們就不能根据收入的多寡来权衡职务的重要性。

此外，使大公无私的精神成为行使权力的条件，这就把秩序和紀律的原則应用到行政等級中去；因为这样可使政权更多地受到尊重和更少地受到嫉妬；这样可以杜絕貪婪的和扰攘不宁的庸人以及丑陋的野心家成为候补人；这样才可以把政权委托那些认为必需发展自己精神上的最高才能和应用有益思想的人去执行；这样就可以使对权力的服从成为一种感恩的行为。

我在别处已经讲过：那些由于自己較为聪明而能够获得世界上一大部分財产的人，无权去咒駡那些在野蛮时代由于体力优越

而奴役弱者的强者。倘若人們回答說，才干需要由报酬来刺激，社会的利益需要这样做，那么請問，是否这种报酬必須是物质的呢？是否这种报酬必須用財富来估价呢？那些眞正高尙的人所寻求和获得的主要报酬就在于运用他們的才能。如果社会要想給予牛頓报酬，它是报酬不完的，对于牛頓来說，只有一种公平的报酬：即当他的天才发現了支配世界事物的規律时他所感到的那种快乐。如果物质需要意味着上帝給予社会而应該再由社会給予个人的东西，那么，才能不就是上帝給予个人而应該再由他来給予社会的东西嗎？所以，按照标志在每个人的身体結构中的那条神的法律，一个人智慧多，就应当多做些有用的工作，而不应要求更高的待遇；秉賦的不平等只能邏輯地、合理地得出責任的不平等的結論。

在这一問題上，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提到在我国卓越的职位所得到的报酬不多。所以他不就承认了我們的理論并未越出当前社会的作法，不就承认了我們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嗎？此外，当我們的制度即使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內已经得到最幸运和最有意义实施时，他的这种主张也是不正确的。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把竞爭当作兴奋剂而加以吹嘘。但这种兴奋剂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是用什么方法影响人类的活动的呢？飢餓就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它有时可以使大道上的窃盜胆壮。复仇是一种有力的兴奋剂：它有时激起那些被欺侮的人去杀人。貪欲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兴奋剂：他能产生投机和投机的丑事。我們要为貪欲、报仇以及飢餓去立庙奉祀嗎？

所謂由于竞爭而产生的物价低廉，它代表着什么呢？它所代表的是在劳动力上所作的节約或使用新机器而得来的节約。所以，

物价低廉只是把从貧穷生产者手中夺来的东西給予富有的消費者。竞爭使物价低廉成为一种斗爭的方法，在这种斗爭中，物价低廉总是或者和工資的普遍降低相呼应，或者和实行残忍的垄断相呼应的。因此，对某些人是进步的东西，对另外的一些人則是增加貧困。唉！那些幸运儿的幸福只是在他們不知不觉中由穷人的不断增加着的痛苦所造成的！

固然，竞爭并不总是轉向不利于工人的一面。当产品在工人稀少的地方受到迫切需要时，他們的地位就顚倒过来了。受到条件支配的将是厂主；工人提出条件，他們昨天还是被压迫者，第二天可能就变成压迫者了。

在这里，我們也許应当說：类似这样的情况只能看作是例外；富人有着穷人所缺少的金錢可以規避这种暫时的压迫，而法律对厂主之間的同盟的处罰要比对工人之間的同盟的处罰輕得多。然而，我們并不这样說，如果人們充分提出反对的意見，我們是欢迎不暇的，而且我們也急于要利用这些反对的意見。不管暴政是从上而来或是从下而来，在我們看来差别不大：在这两种情况中，我們认为暴政都是可恶的。我們是人民的保卫者而不是人民的侍臣，因此，我們不願意使人們可以例外地从中得到利益的混乱比那些使人們慣常遭到痛苦的混乱发生得更多；并且我們应該声明，在任何制度下，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級除去采取报复的手段之外，根本得不到其他任何补偿的办法，同时，除去工业上的罗馬农神节①

① 指罗馬时代的每年十二月十六、十七和十八日三天的盛大节日，在节日期間，所有的人包括奴隶在內，都必須尽情作乐。这里引用这个名称意即无产阶級除去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外沒有其他任何自由。——譯者注

外，无产阶級根本沒有其他任何节日，那么这种制度是十分不幸的。

至于因为稍稍触动一下現行制度的基础就怕所有的人都会餓死，对于这一点，难道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所表示的担心是很严肃的嗎？怎么！一个工人为自己劳动，因而热情地、专心致志地和快速地去做那些在今天說来他是慢騰騰地、滿怀反感地、口出怨言地、甚至往往內心带着反抗情緒做着的事情，在这个时候，难道所有的人反而会餓死嗎！当社会中不再有像今天那样混水摸魚的寄生虫时，当生产不再在盲目和混乱之中进行，不再导致商品的滞銷，以致博学的经济学家們說現代国家的貧困是由生产过剩产生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餓死嗎？今天，不可計数的資本損失形成商店歇业、工厂倒閉、破产頻仍、商品滞銷、工人失业、工人阶級由于经常劳动过度和时間过长而发生疾病，总之，混乱的、規模庞大的和普遍的竞爭产生了一切灾害；在竞爭消灭以后，当我們不再为这些現象悲叹时，难道所有的人还会餓死嗎？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可以絕对放心……至少关于实行我們的理想这一点，可以絕对放心；因为目前社会制度的任其发展的情况，只能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当然，我很容易证明：既然这种制度对人民的美滿生活沒有任何保障，那它就使社会陷于一种僥幸的生存状态；人們所吹嘘的这种工业自由只是为了劳动工具占有者而存在；这种工业自由让穷人被意外的事情所支配；这种自由是由压迫和无政府状态所組成；这种自由只給强者增加力量，給富者增加財富，給那些最不需要貸款的人增加貸款。上天知道，我决不是在这里煽动无产阶級，給他們灌输不幸的急躁心情！資产阶級本身

也受着相当大的威胁，人們应当向資产阶級发出呼吁并要他們认眞地来考虑这种情况。唉！如何能否认这点呢？竞爭是为了大資本家的利益而进行的。所以，在压倒了小資产阶級之后，这个竞爭就将压倒中产阶級；这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并且它已经以触目惊心的朕兆表現出来了！不妨看看乡村的情况，那里受着高利貸的无恥的封建制度的压榨。請研究一下大城市的工业生活，那里到处揭示着金融寡头的形成，而逃避这种金融寡头的桎梏变得愈来愈难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手艺人成了一个不能独立自主的按日計工的劳动者，小商店倒閉了，它們被豪华的大商店挤垮；在竞爭的斗爭中，奢侈成为一种可靠的和杀人的武器，大資本家的联合包围了中小資产阶級，并且把他們悶死。怎样来避免这些禍害呢？

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說，我們只要把竞爭糾正一下就可以滿足了。但是用哪些办法呢？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并沒有把它們指出来，而我們却很想了解一下这些办法。什么，原則已经肯定了，他們却不希望它产生自然的結果！什么！战爭已经发生，他們却还抱着这种不会有牺牲者的奇怪幻想！但是善与恶同样有它的邏輯；当他們指責結論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坚持保留它的前提。現在我再重复一遍，这里的結論就是建立一种比軍事专制更沉重百倍、更卑鄙百倍的专制。难道不就是把运輸的垄断也就是說把工业的活动、它的灵魂、它的生存和它的呼吸都出让給一小部分的富翁去垄断嗎？这样，你們就可以采取放任主义，可以使你們自己滿意于你們响亮的詞句，可以使自己頌揚那些在自由的名义下使无政府状态成为合法化的立法者的智慧。在这等待期間，站在忍受痛苦的人民头上的資产阶級日趋瓦解，而資产阶級的侍臣

們并不設法把資产阶級营救出来，只知道用甜言蜜語去哄騙資产阶級沉沉入睡。

路易·勃朗

以下是《商业报》在1841年8月3日有关本书所发表的評論：

“变为工业企业主的政府怎样执行职务呢？我們如果以公共工程部的例子来判断，那就可以推测，政府的措施，不論在节約方面、积极行动方面、企业的发展和改进方面，都不是出色的。我們还可以設想一下，当政府旣是生产者又是消費者的时候，它是为了公用事业或者为了靠稅收征集产品而領导劳动生产的。但是，当国家成为唯一的制造商并独自負担供应私人消費需要时，它将用什么方法来銷售产品、寻找国內外的銷售市場呢？”

如果这些非难一点也沒有指錯的話，那么，无疑地这些非难是十分严重的。当然，如果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并且負責供应私人消費需要，那么肯定它就要在这一巨大任务的重担下失敗。再进一步說：假如国家能这样做，那么，这样一个制度的結果所能造成的就会是暴政，就会是在公益的假面具下对于个人所施行的强暴，就会是丧失一切自由，最后，就会是普遍的窒息。但是，难道我們提出了类似这样的东西嗎？这种非难如果对圣西門[①]主义提出，还能成立。但是我們的学說与圣西門学說之間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我們曾经說过，国家应当是工业的調节者：难道这就是說国家应該对工业施行垄断嗎？我們曾经說过，国家应当創办社会工場，

① 昂利·克劳德·圣西門(1760—1825)，法国卓越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最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譯者注

供給劳动者以劳动工具，規定那具有法律形式和效力的工业章程，难道这就是說，国家应該变成投机者、工业企业主嗎？这里，誰不感觉到，他們是用不是我們的立場来攻击我們的呢？請再閱讀一下我們的計划：大家会看到在社会工場所得利潤的分配中，我們并沒有分給政府任何一份；所以，在我們的制度中，政府既不是垄断者，也不是投机者。的确，我們让政府在社会工場成立的第一年間来参与工厂的行政管理。但是，为什么要把一个制度的基础和推行这个制度的方法混为一談呢？我們說了些什么呢？“社会工場成立后的第一年，由政府安排各項职务的等級。一年以后就不再如此了。工人們既然有时間可以互相鑑定，并且，他們既然都关心社团的成功，那么，各級人員就可以从选举中产生出来。”意思就是說：机器一经安装起来，自己就可以开动。国家只須像它监督所有法令的执行那样来监督章程的遵守。可是，这些章程既然是实施一种关于联合和博爱的学說，那么，工业立刻就会走上新的道路，以致国家除了排除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企图为对抗这个运动而制造的种种障碍以外，沒有别的事情可做。請很好注意这一点：我們不像圣西門学派那样，要求国家亲自去做一切事情，我們只要求国家发动一次以社团原則代替竞爭原則为目的的工业革命。我們并不要求国家成为工业企业主和把所有的垄断权都集中在它的手中，我們要求政府出面干預，以便給予某些工人团体以劳动工具，并給这些工人团体制定法律，使它們不可能不在王国的整个地面上不知不觉地扩展起来。

“有一个国家，大約从三百年前起就在大規模的范围內施行着一种和路易·勃朗先生所提議的相似的制度，这个国家就是巴拉

圭。在南美殖民地叛变之前，这个国家处在完全实現了公有財产和社会博爱的烏托邦的神权政治的統治之下。表面上，这个政府是符合公民的願望的，因为，那些从宗主国的权威之下解放出来的公民，除了以联邦制的形式代替单一制外，願意沒有其他变动而保留这个政府。新組织的領导者佛兰西亚博士[1]改善了旧的組织，并且除了根据人民一致拥护的意見外，并未通过其他任何形式就維持了他过去所处的地位，雷納耳[2]根据一致公认的证据叙述了巴拉圭的制度之后，发現了一种他不能解释的現象。他說：在那种政体之下人口似乎应該极快地增长起来；因为在那里，沒有一个閑人，沒有一个工作过忙的人；在那里，食物是有营养的、丰富的、对于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公民穿得也很舒适；在那里，老人、寡妇和孤儿依靠土地的剩余产品而得到大量的贍养；在那里，人人都可以不計較利害关系而自由选择对象；并且，在那里，儿女成群是一种慰借而不会是負担；在那里，从不发生那种同腐蝕穷人和富人的那种游手好閑分不开来的、加速人类生命死亡或衰頹的荒淫，在那里，絲毫沒有什么可以激起不自然的情欲、破坏正常食欲的东西；在那里，人們可以享受貿易的利益而絲毫不受到奢侈恶习的影响；在那里，粮食滿仓，在同一宗教的博爱下，各民族联合起来，彼此进行无偿的援助，这是一种可靠的方法，它可以防止季节的变化无常或风雨不調所引起的歉收；在那里，社会懲罰永远沒有必要对任何一个罪犯判处死刑、受辱和徒刑；在那里，人們不知道

① 何塞·加斯帕尔·罗德里蓋斯·佛兰西亚（1766—1840），1814—1840年巴拉圭的独裁者。他沒收了修道院的财产和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他对反动势力和外国干预巴拉圭事务的阴謀进行了斗爭。——譯者注

② 季育姆·雷納耳（1713—1796），法国的历史家和哲学家。——譯者注

什么叫征税和訴訟——这是到处使人类受苦的两个灾害：看起来这样一个国家应該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不如此。事实是，在和法国一样广闊的土地上，巴拉圭可能只有五十万居民。这一定是一种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組织所含有的深刻弊病，抵消了这么多的利益。"①

我們不难指出在巴拉圭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我們所提倡的制度之間的根本不同点。如果我們承认那种比拟是正确的話，那么，我們刚才讀到的引文对我們的結論是一篇多么有利和卓越的辯护詞啊！怎么！德行和幸福就是一个社会在应用了你們所攻击的学說时所得到的东西！你們除了給我們描繪一幅关于这些学說所提供的利益的引人入胜的图画以外，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攻击这些学說！"巴拉圭本該是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国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住在巴拉圭的那些人旣善良而又幸福，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根据雷納耳的說法，"在他們那里絲毫沒有加速人类生命的死亡或衰頹的东西"，那么，人口不多又有什么关系呢？人口的增加是否总是繁荣的象征呢？我們可以看到，巴黎人口的出生率，在富裕地区占人口的三十二分之一，而在最貧困地区就提高到二十六分之一。但願上帝的意旨是使那眼光短浅的经济学家們所互相祝賀的我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显著、那么迅速！啊！你絕对相信人口增长是件好事嗎？那么請你看一下你的周围：飢餓的人繁殖得最快。我們的祖国很快就要容納不下我們了；这一点你还看不到嗎？現在我們不是已经在互相窺伺，等待互相吞噬的机会嗎！让那些

① 参閱1841年8月3日的《商业报》。

征服者去要求母亲們多多生育吧；这些人需要人丁兴旺，因为他們需要一些人来做炮灰。

“如果竞争是貧困和破产的必然原因，那么，怎样去解释美利坚合众国这样一个竞争制度的国家的繁荣呢？”①

沒有再比作出这种解释更容易的了。美国人并不像我們那样拥挤在一个不能任意开拓疆土的国家里。至少到現在为止，他們之所以能够部分地避免竞争的灾害，簡单說来，正是由于还存在着空地。但是，怎么啦！那个强暴地驅使英国人走出他們的島屿并使他們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必須征服的市場的压力，那个不可抗拒的压力，現在不是已经統治着美国了嗎？銷路問題在美国不是已经像在英国过去和現在那样日漸显得严重了嗎？我們不是已经听到美国总統杰克逊将軍②面对着他的国家由于信貸的极端发展、私人投机的狂热、无限的竞争在人們心灵中所燃起的熾烈的欲望而即将发生的危险，在大声呻吟嗎？我們且不談竞争使美国个人的才能带有的那种毫无节制的冲动所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恶习：貪欲、自私、恶意、粗野的思想和风俗。

竞争早晚要成为一种压迫，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所采取的社会制度的罪恶，現在已经严重地威胁着那个作为他們政治机构基础的平等原則。只要銀行制度在美国受到支持，那么民主制度就要失敗。杰克逊大声地声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在这一点上的意見也就是所有那些美国民主主义的忠实拥护者的意見。

---

① 参閱上边所引据的同一期的《商业报》。

② 安德留·杰克逊（1767—1845），美国政治家，曾于1828年和1832年两度当选为美国总統。——譯者注

这个結果是值得大家来彻底加以研究的：

“对路易·勃朗先生的計划的主要指責，是說他的計划固然以通过社团消灭竞爭为目的，然而这个計划本身只是一种竞爭制度而决不是社团的制度。这个計划的本身含有不純的因素，这种不純的因素却是計划的拟草者的那种敏銳的思想所不应当觉察不到的。

“的确，路易·勃朗先生許可資本家加入社团，条件是資本家可以支取他們投資的利息，但是，他們必須取得工人的身份才能分享利潤。

“这样，資本家不管社会工場获得利潤或遭到損失都有权得到固定的年金。这样，他們不但不和工人协作，反而只关心得到他們資本的最高利息，而工人的利益恰巧与此相反。因此，在参加生产的两方面——資本家和工人之間造成一种明显的对立，并且由此产生謊言、舞弊、仇恨，換句話說，就是竞爭本身和它的全部結果。但是，对一个经济学家来說，資本并不单单是貨币。如果資本单单是貨币，那就可以把敌对利益縮减到一个相当狹窄的范围之內。在資本这个字义里包含着全部劳动工具、产品的一切来源、生产的全部面貌。因此，地主、厂主、牧場主、动产与不动产的所有人将完全和劳动者分裂开来。本来应該在这一計划中被克服的竞爭却得到了庄严的承认。”①

給我們提出这种反对意見的人，是否已經考虑到今天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产生明显的对立的原因呢？而这种对立是提出上述

① 見1841年3月1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意見人甚至在我們的制度的实施中也感到害怕的。在生产的事业中，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劳动工具，另一些人的使命是提供劳动力，这样，資本家和工人就互相进行斗爭，为什么呢？因为沒有什么东西来調整他們之間的关系，因为专横在这里支配一切。工人感到需要得到工具时，資本家就在这种需要上进行投机，同时工人也利用資本家試图使他的資本获得利潤的需要而設法从中得到利益。我們的制度把社会工場的成員和資本家安放在与上述完全不同的地位上。大家不要忘記，社会工場有国家給它提供的資本，这种資本是集体的，它应該不断增长，并且它是属于社团自己所有的。因而，在这里工人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利率一旦确定（絲毫沒有理由去禁止人們在一定的时期內用立法手续来确定利率），可以許可願意为社会工場服务的資本家在事先規定的条件下参加投資；相反，那些資本家如果不滿意这些条件，可以保留他們的金錢，而工場可以不用他們的錢。我們的制度給社会工場創造了这样一种形势，就是使資本家的协助对它永远是有益的，而不是使这种协助成为非此不可的，所以，就沒有发生爭論的可能。

更好的是：随着我們制度的发展，集体資本就增长起来；大部分劳动者愈来愈独立；个人投資的机会日益减少；資本的暴政被击中了要害。

“当你按照职务的等級来規定工資时，你无疑地承认了，一切劳动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也就无权得到相同的报酬。那么，为什么在利潤方面你却又建立起你在工資中认为是不合理的那种平等关系呢？”①

① 見1841年5月1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我們曾经預料到这种非难，并且事先用这样的詞句做了答复：“現在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錯誤的和反社会的教育，使人們在增加收益的办法以外，很难找到起竞争和鼓励作用的因素，但是工資的差别将按职务的等級而加以規定，一种新型的教育定会使思想和风俗习惯发生改变。”至于現在，我們在工資方面不采取平均主义的报酬办法，并不是认为那种办法是不合理的，而是认为它会給习慣以猛然的打击；根据我們的看法，只有教育可以有力量来改变这些习慣。在利潤的分配中，我們所认可的平均分配办法是在“現在怎样”和“应当怎样”两者之間安排得够好的一种过渡办法；因为我們已经讲过，我們再說一遍，总有一天人們会承认，誰从上帝那里得到較多的力量或較多的智慧，誰就对人类要担負較多的責任。因此，天才不是通过他从社会取得的巨額报酬，而是通过他对社会所尽的义务的光輝成就来获得社会的公认，他应該这样做，也只有这样他才不愧为天才。秉賦的不平等应該得出的結論是責任上的不平等，而不是权利上的不平等。

“根据那个計划，第一年各級职务将由政府来安排；但从第二年起，各級人員就要根据选举原则产生。

“讀者如果曾经注意或参与过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他就会知道有多少阴謀、謊言、誣蔑和虛伪的諾言、不道德的威胁施展在这些斗爭中，讀者就不会不知道，这是家庭不和睦和国家风俗敗坏的一个机会；并且，只有某些旧式自由主义的落后公民才幻想着国家生活本身就是斗爭。此外，每个有理智的公民都会沉痛地看到，这些周期性的动乱的来临就使一切丑恶的情欲又一次在社会上泛濫起来。然而，所涉及的問題只是一些遙远的和人們不很了解的利

害关系，至多只涉及到通过选举的选择来保障某些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倘若把个人的命运、家庭的現状和前途都交付給选举来决定，倘若公民們不光是指定候选人，而是由他們自己来决定他們自己的社会地位，作为他們有权可以获得尊敬和財富的衡量标准，这就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况了呢？我且不說最末一等的人，就是第二等和第三等人又有誰願意去充当呢？什么是調节个人貪欲的天平呢？"①

是的，在省、市或国会的选举中，有关的只是一些遙远的和人們不很了解的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些选举才是这么多的动乱和阴謀的根源。此外，你怎么会沒有看到，选举的无政府状态本身只不过是在目前社会中由于阶級区分、利害关系的多种多样性、奋斗目标的不一致而产生的混乱和对抗矛盾的結果呢？

社团的每一个成員都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并且都同样关心着共同事业的繁荣，如果把选举的原则介紹到这样的社团中来，不就会面目一新嗎？如果选举人不是不凭了解而以本能或往往以盲目的热情去进行投票，而是在完全了解事情的情况下，在他們全部生活所接触到的范围內，总之，在完全了解他們的利害关系的情况下去进行选择的話，那么，这又将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为了选举得好，那就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利害关系和能力。是啊！社会工場的成員显然都是具有这两个条件的。他們关心着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社团的成就是由他們的选择来决定的，而社团的利潤则又是由他們来分享的；他們有能力很好地进行选择，因为

① 見1841年5月1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他們每天随时随地都彼此見面，他們在一起劳动，他們具有很好地进行鉴别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一个工人能否对他的工长作出鉴定呢？如果一个工人应該从他的工长的才能中得到他自己的一部分利益，他是否願意找一个无能的工长呢？問題就在这里。

“路易·勃朗先生承认，創办社会工場的国家在第一年中将管理各种职务和利潤。假如国家一旦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为什么要让它失去这种特权呢？”①

这是因为担心国家在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时，会濫用这种制度所給予它的巨大权力，也是因为担心当国家管理的不再是某一个工場，而是所有的工业部門时，它的任务会变得太沉重。

我們要避免圣西門主义所碰到的暗礁。这个学說的奠基人早就很好地看到，只有国家机关才有足够的力量把社会从危险途径中挽救出来，但是，由于他們过于强調政府首創精神的优越性，因而超越了那个目的。他們不是把指导和調整工业生产的責任委托給国家，而把管理工业的瑣碎事务都放在国家的肩上；因而使国家的行动极不方便，而暴政反而成为可能。

当然，我們并不是咒駡权力原則的人。我們曾多次反击了那些既危险又愚蠢的攻击来保护这个原則。我們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当有組织的力量还沒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到处都是专制。在这本书里，沒有一行不是以我們的名义来沉痛地抗議，抗議人們把穷人可耻地遺弃不顾，还有人竟敢把这种遺弃叫作是自由！但是，即

---

① 見1841年3月8日的«阿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使我們希望有一种强有力的和有效的政权，我們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认为政权是不会有錯誤的，那就是发疯；我們并不掩飾，不管产生政府的政治組织怎样完美，一个政府总是由能犯錯誤和能为情欲所迷的人所組成的，而社会的生存是不应当由这些錯誤和情欲来决定的。所以对我們来說，要解决的問題是：給政权造成一种强大的富有首創能力的力量，然而要避免政权的活动侵入社会的一切活动。

“国家提供了原始基金。然而，看来似乎旣不許可国家分享利潤，也不許可它征收任何利息。国家与其他資本家之間的这种差别是不公平的。”①

但是，为什么要說这是不公平的呢？难道你把国家看成是一个投机者嗎？难道国家同它所代表的和反映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利益嗎？

“一部分利潤指定用来减轻其他工业所遭受的危机，因为所有那些工业都应該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援。如果其他工业也把它們的利潤交給社会工場的話，那就太好了；但是，根据它們自己的組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也不合理。”②

按照我們的計划，这种互相救助只能在集体組织起来的各种工业之間进行。

“另一部分利潤专門用来为那些志願参加社团的人购置劳动工具。——应当加一句，这笔款項将从工資中扣除下来；这是一笔

① 見1841年3月10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② 同上。

垫款，而不是餽贈，不然就会是不合理的；因为資本既然是由国家供給的，那么，无偿地把劳动工具送給某些工人，那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剝夺大多数人。"①

如果我們所提倡的制度的发展不包括全体工人，那么你就說对了。但是，为了达到我們的目的，我們才从社会工場的資本中提出一部分来，而这一部分資本只能用来扩大社会工場，因此，它事先就毫无例外地是属于全部工人的。从工人的工資中扣除工人为了生活和为了服务于他所属的社会而必需的工具的价款，这岂不是一种不合理和苛刻的行为嗎？庇特本人就曾說过，国家应該供給人民劳动或面包。

"劳动組织将从工业开始，其实，它应該从联合起来的工业与农业方面开始进行。"②

为什么要凭空使困难复杂化呢？革命由工业改革开始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革命来引起与之相結合的农业改革。要知道，我們并沒有忘記这一个必要的联盟（見本书第87頁）。

"路易·勃朗先生的思想基本上是圣西門的思想。事实上，圣西門不断主张政权取得工业領导权，同时創办服从政府所制訂的規章的工場，在这些工場中，政权应該分配每人的职务、每人在工业等級中的地位以及每人在生产或利潤中应得的部分。"③

我們已经答复了这一指摘，使我們吃惊的是：向我們提出这个指摘的是一种宣传傅立叶社会主义的报紙，换句話說，就是一种专

① 見1841年3月10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② 同上。

③ 見181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报》。

門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說的报紙。

圣西門的学說和我們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学說之間，区别是明显的、带有根本性的；同时这又是理論上的和实践上的区别。

在圣西門学說中，政权就是一切，政权行使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政权从自身取得那种可以对社会实施强制的权利，以后就随意支配社会，把才能分成等級。政权分配职务，領导一切人的劳动，进行财富的分配。在圣西門的学說里，国家就是工业的教皇。相反，在我們的計划中，国家只給劳动制定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工业活动就可以并且也应該完全自由地进行。国家只是把社会放在一个斜坡上面，社会一旦被安置在那里之后，它就由于事物的力量和既定的机械作用的自然結果而滑落下去。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等級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从上"而来的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在我們的計划中則相反，等級制度基本上是通过"从下"而来的选举而建立起来的。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国家对于工业的干預是有永久性的；而在我們的計划中，国家只不过在最初时期进行一定程度的干涉。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社会的功能完全消失在政权的职能之下。在我們的計划中，社会从政权那里得到推动力量，而在取得这种推动力量之后，它就仅仅受政权的监督了。

在圣西門的学說中，利潤分配問題是通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而得到解决的："按才分配，按才派工"。在我們的計划中，秉賦的不平等，只在过渡时期作为报酬上的差别的基础，并且还带有重大的限制。因此，形成圣西門的道德原則的东西，在我們的計划中，只不过是一种对于那些我們认为是錯誤的思想的必要的让步，并且我

們願意依靠教育使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战胜这些錯誤的思想。

因此，圣西門的学說和我們的学說之間在最終的目标上、在方法上和在道德上，絲毫沒有共同之处。

“至于那些資本家，路易·勃朗先生很願意他們資本的利息在預算中得到保障，然而他却完全不准他們分享工場所得的利潤。对于这种奇怪的排斥，我們只提出下列两点意見：第一，不让資本家对于工人阶級命运的改善直接感到兴趣，这是太不了解工人阶級的利益。其实，如果我們所談到的那些企业应該改善这些阶級的地位，那么就要增多这些企业；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它們成为对資本家有利的投資場所，所以資本应該享受利潤的分配。第二，資本作为有助于生产的一种手段，它是否具有和其他生产手段相同的合法性呢？問題就在这里。假如資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在生产中要求得到的一份也是不合法的，那就应該排除它，它也就不該得到利息；反之，如果資本是合法的，那么，它既然有助于利潤的增加，就不能合法地被拒絕分享利潤。”①

前几段中，問題是以一种毫无系統的方式提出来的。毫无疑問，作者的意图是向我們詢問，根据我們的意見，在生产的利潤中，允許資本家分享一份和工人相等的利潤是否合理。

我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說，在正常的社会中，这是极端荒謬和极端不合理的。怎么！一个人在继承父亲的遺产时得到了一百万法郎，这笔錢原是他的高祖父积攒起来的，来路的好坏不得而知。

① 見184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报»。

这样，他就像博馬舍① 书中的那个貴族那样，只因出生关系而成为富有，他願意拿这一百万法郎投資到工业中来，使它产生利潤。除此而外，他却以打猎来消磨岁月，看戏游蕩，通宵賭博，他的全部生活都用在享乐上面，或者用在滿足他的以个人主义为目的的忙忙碌碌的事务上面。因为他不是愚蠢地把这一百万法郎埋藏在地下——这一百万法郎，沒有他也可存在，并且在他之前已经存在，他不懂得怎样使这一百万法郎增多的艺术，而最后他只知道領取和浪費这笔款項的利息——，你却要在这些生产的果实中分給他一份与聪明和勤劳的人相等的利潤。这种財富是通过聪明而勤劳的人增多起来的，而他們为所有的人服务，他們的一生完全貢献于社会。天啊！这是什么合理的分配啊！那些立志改革世界的人，却不理会到利潤的这种分配原則是对所有正义法則的一种粗暴侵犯和对人类理性的侮辱。試問你对这些人又当作何感想呢！

你是不是說，在生产事业中，資本和劳动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因素呢？我們倒要弄清楚。由于資本和劳动同样是創造財富的两个必要的因素，难道我們因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說，在公正的观点上，資本家和工人是同样有功績的人嗎？这样一种結論是不合乎情理的。

你是不是說所有的資本家并不都是游手好閑的嗎？我同意你这种說法。但是，为什么要使那些游手好閑的資本家得到那么大的利潤呢？而在那些不是游手好閑的人們中，为什么要使富人比

① 比埃尔·奥古斯丁·卡龙·博馬舍（1732—1799），法国作家，卓越的喜剧作家。——譯者注

勤勉的人得到較多或相等的报酬呢？

你是不是說，这样作即使不太公允，至少也是有益的。不过，首先，一种把有益的和正义的东西分割开来的哲学是貧乏的和过时的哲学。其次，你敢于主张的是什么呢？如果社会把資本家所提供的非亲自参加的服务和工人所作的亲自参加的服务等量齐观，对于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呢？劳动是和劳动者一起死亡的；但資本是否和資本家一起死亡呢？在靠着集体資本而生存的社团的生活中，沒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并且历史也給我們提供了关于这类社团的很多的例子。因此，人們可以設想一个沒有資本家的社会，但是能够設想一个沒有劳动者的社会嗎？所以，虽然資本和劳动同样是必要的，但資本家和工人并不同样是必要的。社会的存在并不絕对取决于資本家，而它却絕对取决于工人。因此，如果工人得到的待遇不如資本家的話，那么，这就是把所有正义和眞理的观念都顚倒过来了。这是由于文明誤入歧途而造成的，这不是明显的事嗎？

你能否认这一点嗎？請注意，倘若你要这样做的話，你就沒有資格来談論公正、道德和进步；你就沒有資格来談論上帝。上帝就会消失而让位于最盲目、最粗俗的宿命論。

让我們再来談談那个两端論的說法吧。我們把原文归納如下：“倘若資本是不合法的，那么它要求在产品中分得一份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就应当把它排除出去，而不应让它得到利息。”这只不过是一种詭辯。傅立叶的門徒們和我們一样清楚地知道，既存事实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不管社会組织是好是坏，它是由錯誤的观念、庸俗的偏見、普遍的无知以及存在了几世紀之久的传統邪恶所

造成的。倘若我們想要得到一个实际的解决办法，那么就要很好地看清这一切。我們所以要求社会工場給資本家的資金支付利息，一种优厚的利息：第一，因为有必要使我們所提倡的社会工場不排斥任何可以促进它們发展的方法；第二，因为我們計划的目的既以整个社会的革新为終点，因此，需要邀請資本家們尽可能踴跃参加社团，以便迅速地把所有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

"要达到这种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資本家分享利潤。"

我們并不否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資本家的吸引力不是很大的。但是，問題是要了解，为了吸引資本家，如果对他們的資金付給和国家今天付給公債持有者相等或更高的利息，这是不是够。因为，如果这样就够了的話，那么超过这个程度，那就将是疯狂的行为，因为这会是无益地牺牲原則的严肃性。然而我們說，社会工場一旦建立起来，資本家就会乐于参加到社会工場中来，因为由于这些社会工場的发展，个人投資的机会就将一天一天地愈来愈减少。

或許你要問我們，既然在我們的計划中个人資本的兼并迟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有什么理由使我們对資本家照顾得这样多，并且要去把他們不可能不走的下坡路緩和到这种程度呢？其实，使我們采取这些照顾办法的理由，并不只是希望同无数的矛盾和根深柢固的成見妥协，而且还有比这更多更好的理由。这就是改革社会而不把它推翻；給各种利益指出各种不同的和可靠的方向；不用野蛮急躁的方式来动搖即使是那些建立在流弊之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們所要摧毁的，总之，要給将来作好准备，而不是粗暴地和过去一刀两断……难道这仅仅是一种策略嗎？不是，这是一

种責任。

“路易・勃朗先生的言論缺少一种基本的东西，缺少了这一点，他的言論就失掉了依据，我們所要說的就是确定那些和竞爭有关的事实，因为这种被路易・勃朗先生根据它所产生的慘痛的后果而正确譴責的无政府状态的竞爭，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要知道，如果我們要得出精确的結論，不是完全有必要来确定那些与竞爭有关的前因后果嗎？可是，这就是路易・勃朗先生完全忘記去做的。

“我們的确在他的文章中讀到这样一句話：‘我曾說过，竞爭是从个人主义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我們要想在路易・勃朗先生的全篇文章中找到一段关于他所主张的由个人主义产生竞爭的理論，那是找不到的。我們現在还在寻找。——而且，在这里他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什么呢？也許人們并不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各种工业的分散，或理解为家庭分离以組成各种工业团体，不相联結并被迫彼此进行斗爭，这就是說，不得不以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方式进行竞爭。对于这种工业的分散和家庭的分离，路易・勃朗先生只字不提。可是这就是他所悲叹的竞爭的最大原因，是他提醒政論家和当局注意的所有工业上的和道德上的貧困的重要根源。这样的健忘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嗎？怎么！你向我們推荐一种医治某些社会創伤的药品，你认为这种药品是合乎邏輯的和合理的；你要我們拿理性来判断这种药品，却忘記告訴我們产生这些創伤的原因！”①

《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的編輯事前已經替我們答复了

① 見1840年9月23日的«法郎吉报»。

《法郎吉报》編者的这項非难。我們在此再来重复一下这一答复，这一答复是有力的，它說：

“有人曾向路易·勃朗先生提出（《法郎吉报》，1840年9月23日）：‘为了医治竞爭的禍害，也許应該追溯这个竞爭的原因，那就是工业的分散，家庭的分离，并从根本上去打击禍害，而路易·勃朗先生却并沒有这样做。’在我看来，这一指責是不公正的。

“竞爭的眞正意义（就是一起跑步）是不同的个人同时要求得到同样的产品，这种要求就带来了斗爭。这种要求是一种从人类的天性中产生出来的原始事实；而不是家庭的分离和工业的分散的产物。人与人之間的竞爭就像劳动工具之間的分散那样。这是两个同时并存的、有連带关系的和互为因果的事实。社团在代替了分离的家庭以后，确实可以增加生产，但是如果沒有其他許多条件的协助，无論竞爭或斗爭是决不会因此而被消除的。这是千眞万确的，因此，在工业中，像在农业、商业中那样，劳动决不是由分离的小家庭和家族来进行的，实际上它經常是由很多属于不同家庭的、在一定条件下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来进行的。我們甚至有理由认为，分离的家庭（分散方式）的生产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是难以想像的。旣然資本、劳动和才干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就必須假定有一个可以自給自足的家庭，它永不仰仗别人的帮助，也不仰仗别人的工具、消費品和資金，簡言之，一个和人类完全断絕一切关系的家庭，这至多只是某些野蛮人的情况。在我們一切社会中，家庭早已脫离了这种孤立状况，而在生产事业中結合起来，固然它們結合的方式是不完善的和不完整的，它們通过相互交换，通过借用或租用工具、才干和劳动力而不断地結合起来。和这种絕

对孤立相适应的絕对分散也是脫离現实的。因此，这两者都不能成为产生竞爭的原因。我再重說一遍，竞爭和分散是两种并行的規律的两个原始事实，并且是互相支持的。攻击竞爭，同时也就是攻击分散；破坏了分散，也就摧毀了竞爭。家庭的孤立同时是由劳动工具的分散和工具所有者的竞爭所造成的，因此，家庭的孤立必然是与这两者的命运相始終的。

"所以，路易·勃朗先生从直接針对竞爭的角度来处理劳动組织問題，就把这个問題提到相当的高度。"①

《宪政报》专門为了說明我們的計划而登載了一篇对我們充满善意的論文。不幸的是我們的思想在这篇論文中虽然得到了說明，却沒有受到討論。作者仅用籠統的詞句責备我們的前提过于夸大和我們的結論过于絕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們所依据的事实，大部分引自官方报告的数字。就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而言，讀者可以判断我們如何努力使邏輯服从于准备过渡的需要。那篇論文的作者写道：

"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也許像我們的生活环境那样，需要一些可以使它純洁的暴风雨，并且可以肯定說，不管暴风雨是怎样的强烈，时間久了平衡是会逐漸地恢复起来的。"②

但是，我們所叙述的禍害，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禍害嗎？成千上万的工人，从出生到进入墳墓都在受着貧困的折磨，他們不是经常不断地在忍受着痛苦嗎？这种可怕的斗爭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并从这种斗爭中产生了受到最残酷的灾难的磨练的最丑恶

① 1841年2月15日的《阿韦龙省和罗得省評論报》。

② 見1840年12月19日的《宪政报》。

的禍害嗎？如果你用“暴风雨”这个名詞来指工业危机，那么工业危机就是禍害的暂时的加重嗎？还是全部禍害呢？你根据什么来断定工业危机可以澄淸那些利害关系的环境呢？

在工业的风雨飘摇中，我們看到工厂倒閉，資本匿迹或被消灭，破产相継发生，財产相継傾复，广大失业的无产者面色蒼白，在叛乱和布施之間去寻找他們的面包；难道社会在这种崩潰的翌日就能找到最好的出路嗎？时間久了，平衡会恢复嗎？啊呀！你不知道你是把应該放在血迹斑斑的政治年鉴中的“华沙恢复了秩序”① 这句名言搬用到工业史中来了！

在这自称是光明的世紀中，为了不让我們看見那些腐蝕我們的創伤，人們竟用黑暗把我們包围起来，这实在是一件怪事！难道否认創伤就能治愈伤势嗎？我們多么像古代的那位哲学家啊！他在受到最大痛苦时叫喊着說：“噢，痛苦！你永远不能迫使我承认你是一种禍害！”这是多么幼稚的驕傲呀！我們要努力驅逐病魔，为了向病魔挑战，我們不需要自己对自己說謊。

但是，竟有一些向上帝說出这样侮辱的話的人敢于肯定禍害是永恒的。下面就是《环球报》对我們的学說所提出的反对意見：

“誰否认目前社会秩序的創伤呢？当然不是我們。我們看到了被称为奴隶的非洲人以及被称为公民的欧洲人，我們从无产阶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这两种人进行过观察。当然，我們知道哪方

① 1830年法国革命之后，在波兰华沙发生了一次革命的大暴动，这次暴动被残酷地鎭压下去。“华沙恢复了秩序”这句話，是法国当时的外交部长賽巴斯底阿尼在国会中答复議員責問时所說的一句話。因为它是为了掩盖华沙流血慘重的鎭压情况而說出来的，所以已成为政治历史上的名言了。——譯者注

面是最貧困。但是，大家经常談到的这些物质上的不幸，被激进党刊物用来作为经常写作的資料，它們是否就揭示出人們想要談到的极不正常的情况呢？是否就揭示出必須用一切代价排除的那种情况呢？还是相反，它們是一切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只需稍加修改的(比較完善的立法所应該做的好事)不幸呢？我不想提出其他論点来证明这一眞理，我只用你自己所提出的那个論点。你說：富人在共同受苦的折磨下，慢慢地屈服于一种神秘的創伤，并在表面幸福的气势中逐漸弯下腰来。

“你在写这几行时，是否想到从这几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哲学推論？你只从中得出下面一个推論：使富人痛苦的就是穷人的貧困。这是背离唯物主义哲学的奇怪謬論，它和眞理相抵触，并使眞理变成謬誤。事实并不是那样：造成富人的痛苦的并不是穷人的貧困，而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穷人的貧困倒正是上帝对富人受痛苦的一种解释。你所說的那些神秘的創伤，使富人在其影响下逐漸屈服，难道这不是向你說明了，任何人类組织都不能实現物质上的幸福，都不能用純人类的方法来实現这一幸福嗎？”①

你眞这样想么？你要用这种学說直接去否定一切进步嗎？你有什么权利来肯定人类有責任去摧毁的禍害只是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呢？在前进的道路上，許可达到的和不許可超过的界限固定在哪里呢？

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进步呢？如果你相信进步，那么我抗議你規定它的界限。如果你不相信进步，我就不必再跟你討論了。

① 見1841年3月15日的«环球报»。

人們把所有的禍害几乎都归罪于人性的墮落，实則应归罪于社会制度的邪恶。請看一下你的周围吧！有多少有能力的人安置得不恰当，因而就敗坏了这些能力！多少活动因为找不到它們的合法的和自然的目标而变成了騷乱。人們强迫我們的热情受邪恶的感染，結果都变了质，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这是把一个健康的人放入传染瘟疫的气氛中，在那里呼吸着死亡的气息。

“基佐先生[①]曾经說过：人类天性本身就带着一种人类的努力所不能控制的禍害。在我們身上就有着紊乱。分配得不平均的痛苦是我們命运的天意法則所規定的。”[②]

这就是他們的哲学！这就是一种使人絕望的哲学——如果能称做哲学的話——但是，对于那种使群众受苦成为神圣化的制度，这种哲学是很合适的。

好吧！以下就是在这种制度下所需要解决的問題：怎样来說服这些被认为注定要受苦的广大群众得不到安慰而去受苦，毫无希望而去受苦，并且按照天意的法則而去受苦；又怎样去說服这些群众，使他們相信自己应該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呢？怎样去防止群众的失望呢？怎样去遏制群众心中所引起的那些不能滿足的热烈欲望呢？

在古代社会中，忍受痛苦而沒有希望的人就是奴隶。

摧毁了奴隶制以后，天主教做了些什么呢？天主教为了迫使它所不願意解放的人民滿足于他們自己的命运，就用“受苦将来可以

① 法朗苏瓦·基佐(1787—1874)，法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和反动政客。——譯者注

② 見1958年的《法兰西評論》。

受賞"这一著名的教条代替了古代的宿命論。它对这些不幸的人叫喊着：你們忍受痛苦吧，不要怨天尤人，因为痛苦是神圣的；你們要愉快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上帝为了你們的痛苦保留着天堂的和难以用言語形容的补偿。

但是，这个教条对人們来說已经失去了它的力量。人們懂得这不过是一种阻止被压迫者起来反对压迫者的合法反抗的純粹詭辯，这种不道德的詭辯已和作为它們的基础的暴政一起垮台了。

現行制度的哲学家、邏輯学者們，你們怎样来解决这一"听天由命"的严重的問題呢？被你們的哲学判定永远受苦的人，試問你們用什么道德上的控制来使他們停留在他們的貧困中呢？你們沒有看到我們所经历的革命使人民觉悟起来，使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力量嗎？你們是否知道这具有魔力的要求平等的呼声，已經从社会的这一端响徹到另一端，深入到所有的灵魂深处，喚醒了那些至今还沒有被人意识到的願望呢？这就是你們应当重視的一件事实。不論这一事实是凶是吉，是受人贊成的还是受人咒罵的，它是存在着的；它控制着你們，并带动着你們。

当基佐在議会中大声疾呼說"劳动就是一个控制的工具！"的时候，他感到了这一問題的重要性。

我明白了：对于古代社会的奴隶就有宿命論，对于中世紀的农奴就有听天由命的教条，而对于現代社会的穷人就是忍受飢餓；让我們强迫人民为生活而夜以继日地去劳动吧；让他們的生活完全消磨在沉重的劳动中，不让他們有时間去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这样，世界上那些享福的人的安全就再不会被扰乱了。

这一切全都是梦想和疯狂！这个方法不只是野蛮的，而且在目

前的社会中还是荒謬的。

如果要使“劳动成为一个控制的工具”，至少它所应当控制的那些人都不应当缺少工作。但我們已經证明，无限制的竞爭的結果必然会使很多的工人失业和挨餓。

有一次，在王国的第二大城里昂，有成千的工人走出他們的工厂，目光炯炯，手中拿着枪；在广場上飘揚着一面大旗，旗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这一次，里昂的工人大約是缺少基佐先生的那个道德控制工具了吧！

在那种以道德控制工具为絕对必要的学說中去寻找这种道德控制工具，这是在目前制度下所办不到的事情之一，这是应該絕对解决的問題之一，并且，这是我們为了穷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富人的利益、为了弱者的利益也是为了强者的利益、为了受苦的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享福人的利益而提出的問題。因为，我們有必要在反复地說过多少遍之后再重复說明，为不幸的人們的事业辯护就是为整个社会的事业辯护。

“有一个暗礁是路易·勃朗先生沒有充分注意而加以預防的：这就是对工人所受的禍害給以有力的同情就会引起对我們劳动組织的原則本身宣布一种严厉的裁判；这样就把那些与最近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事业分不开的現象說成是制度本身的內在缺点造成的。”①

按照《世紀报》编輯的意見，他的結論就是竞爭是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体系还只是刚刚出現，需要加以改进。但是，人們只要

① 見1840年8月22日的《世紀报》。

稍稍注意閱讀我們对这一体系所給予的批評，就会相信我們所攻击的正是它的那个原則本身。我們曾竭力证明我們所揭发出来的灾害在邏輯上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在竞爭所产生的后果中，我們所强調指出的不是一些偶然的和临时的弊端，而是一些根本性的弊端，这是《世紀报》編輯自己也承认的，他在下面的几行中写道：

“对于自由竞爭的譴責以它使劳动者受到最残酷的痛苦为基础，这是彻底改变劳动組织的必要的前提。路易·勃朗先生很清楚地建立了这个出发点。在閱讀了这些充滿着自信的、这样生动的篇幅之后，人們就了解到：作者确信应該以最大胆的尝試为代价，来阻止社会堕落，使它不致陷入可怕的大灾难中去。”①

作者又补充道：

“尽管对自由竞爭作了这样多的指責，但还应該說，竞爭带来的是利多弊少。对于人民痛苦的正当同情不应該使我們成为忘恩負义的罪人。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群众的痛苦并不比今天少。今天，工人住的、吃的、穿的都比过去好。人民命运的逐漸好轉成为一个不容爭論的事实。这一好轉尙未达到应該达到的程度，但是毫无疑問的是，貧困至少是比以前小得多了。”

我們本来可以簡单而干脆地否认这一事实；因为我們能到哪本书里去找这一事实的根据呢？老年人的記忆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关于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物质条件的概念。但是，应該注意到，人們以一种表面上的确实性所引证的事实只不过和这一制度的衰微有关，和这一制度的腐敗有关，它的腐敗如此彻底，以致它就带来

① 見1840年8月22日的《世紀报》。

了这个制度的崩潰。其次，哪位历史学家写出了人民貧困的历史呢？只有一个人尝試着写这种历史，那就是蒙泰伊先生①。蒙泰伊先生所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的人民，在我們看来，并不比我們目前的人民更遭殃。

此外，問題并不在于要知道今天人民比他們祖先所受的痛苦是多是少，而是要知道他們受苦受到什么程度，他們为什么受苦。但是，我們证明了什么呢？我們证明了他們的貧困是深刻的；而这种貧困是由竞争的原則而来的；只要听任这一原則随意发展下去，貧困就会有增无已。

我們刚刚浏覽了那些通过报刊而向我們提出的批評。另外，还有一些别的批評是通过信件或口头提出的，我們就把它們来加以研究。

有人問过我們，是不是消灭了国内竞争就不可能解决关税的問題。我們来談談这个問題吧。

有些人說，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阻止某些外国产品的侵入，就会給国內的同样产品一种致命的竞争；而那些被这种竞争所威胁着的本地工业就会变成怎样呢？假如你不同情工厂主，至少也要可怜那些工人呀！你是否知道，当整个工业范围遭受波动时，这个注定要受罪的、只能以劳动为生的工人阶級要遭受多少痛苦，流多少眼泪呢？国家本来就是全国一切利益的保护者，它运用它的干预的权利来保护富人的发財致富的企图和穷人的工作，試問还有什么比这种干預权的行使更

① 蒙泰伊·阿尔諾—阿莱克西斯(1769—1850)，法国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各阶层的法兰西人的历史»。

高貴的呢？

另一些人回答說，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是不祥的，因为它对于广大的消費者是有害的；因为它强迫穷人和富人往往要出高价来买得他們平常可以廉价买到的东西。以禁止进口原料为例，那么这种制度是不祥的，因为它会使全国生产的源泉趋于枯竭，同时会剝夺就业的因素。倘若禁止进口的是制成品，这一制度也是不祥的，因为它使某些不能眞正持久的工业受到一种后果不好和欺騙性的鼓励。还有，在这种保护之下，国民的天才会趋向頹废，試問这种保护有什么意义呢？不以鞭策来推进工业，而用背带把它背在背上，难道这种政权可以称得起是很明智的嗎？一切关税会引起报复。我們在自己的港口拒絕任何外国产品，同样，外国也会在它的港口禁止輸入我們的产品。所以，禁止进口的关税制度只有在使一些人破产的条件下才使另一些人得到好处。铁的关税过高就会直接妨害产酒国家的繁荣。如果铁厂的主人眉飞色舞，葡萄园的主人就要发出苦痛的呻吟。使一切利益彼此发生冲突的保护該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保护啊！使无政府状态严重十倍的干預該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干預啊！

双方各执一詞，喋喋不休；相对地說来，还是前面的那些人有理。絕对地說来，他們是錯誤的。怎么办呢？很难作出决定，因此就产生一种折衷的理論，这种理論在今天似乎占着优势。人們相当普遍地认为，既然存在着不能一天就摆脫的客观情况的要求，那么，就应該保持寓禁关税或保护关税可以保持的項目；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可取消的就应該取消。这第三种意見看起来很有理由，实际上是相当幼稚的，按照提出这一問題的說法来看，問題是

完全不能解决的。

事实如下：应当作为問題而提出的不是禁止进口的制度問題，而是自由竞爭的原則問題。只要自由竞争继续存在，那么禁止进口的制度或保护关税制度就永远是必要的。請不要作空洞的爭論，因为我要問，为什么人們竟把关税制度当作有益的和使人受惠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呢？答复起来很容易。为的是要保护本地的某些工业来抵制与之相竞爭的外国工业的自然优势。但是，不建立这些本地工业，岂不是更好嗎？毫无疑問，因为这些工业是在不利的条件下建立出来的；因为他們只能依靠全国消費者的供养才能維持下去；因为它們只有，可以这样說，吮吸所有其他工业的血液才能生存下去。那么，这些工业为什么要建立呢？你可以向工业自由的原則去請教。

显然，在这普遍对立——我們社会制度的苦果——的情况下，一切事情，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須由我們去尝試一下；一切領域，不管是否能容納所有奔向那里去的人，都必須由我們去占領。竞爭是冒险的制度，它自然而然地推动人們走向盲目的生产；它促使人們目光浅短；它預先饒恕了一切冒险行为；它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冒险思想的生母。在它的籠罩之下，如果产生那么多疯狂的思想，如果在它使每个人的行动发生混乱时，有那么多本来不該尝試而又偏去尝試的工业，这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这就是禍害所在，这就是使关税制度成为眞正必要的理由。建筑物一旦建立起来，即使是疯狂地建立起来的，也应該加以支撑，防它倒塌下来压死人！

如果国家的干涉是以一个合理地而又强有力地組织起来的工业制度为前提，那么国家是否还有必要通过海关、禁止进口、关税

等办法来进行干涉呢？很明显，那是不必要的。

假如人們能够正确地实行我們所提倡的学說，关稅問題立刻就会得到一个既簡单又圓满的解决办法。的确，把社团的原則介紹到劳动中来，在所有本国工业中建立一种广泛的互助体系，难道这不就可以杜絕那些由于妄想或个人主义而产生的、后来又必須依賴合理企业来保护的不合理的企业嗎？我們提醒讀者注意下列一点，这一点在我們看来是新穎的：要消灭外国人在我們市場上所进行的竞爭，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我們彼此之間在市場上所进行的竞爭，换句話說，要想获得商业自由而不发生可怕的混乱和致命的騷扰，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社团和互助的制度来代替人們以工业自由的美名加以伪装的东西。

有人曾经对我們說："你們的制度不是把紀律性的規則介紹到工业中来嗎？这些規則会把个人自由的一切动力与創造力都剝夺掉的。实行你們制度的必然結果，不就是在扼杀竞爭的同时，削弱了那种被竞爭刺激得这样强烈的人类活动嗎？换句話說，在你們的制度中，自由——一切生趣的源泉——和竞賽——一切进步的源泉——将变成什么样了呢？"

什么！我們的制度会打击自由！恰恰相反，我們的制度会解放那些如今处境比奴隶地位还坏的、干一天活一天的无数群众。圣西門主义說，"国家是財产的主人！"这就意味着取消了个人。但是我們說："社会是財产的主人。"区别很大，在这个区别上，我們是不能不竭力坚持的。

我們的制度会威胁自由嗎？为什么威胁自由呢？怎样威胁自由呢？社会工場的成員不都是自由的嗎？他們不是通过管理工場的規

章而得到保护，因而不受任何专横行为的危害嗎？这些規章既"具有法律的形式和效力"，又規定了工人的地位、工人在生产中所应得的一份、以及利潤的分配，这些原則是任何人也不得违犯的，因为有公共的力量来使它們受到尊重。就是在社会工場中建立起来的等級制度也无非是对自由的尊重；因为这个等級制度是以选举为基础的，并且給工人群众选派一些他們根据自己的利益认为可以做他們上司的人来做他們的上司。建立起这样一种組织，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工作，并且都可以得到这个工作的合法报酬，这难道不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尊重自由嗎？

你們談自由嗎？我們是以自由的名义、以眞正自由的名义、以社会应該給与每个成員的尊重的名义来向目前的社会制度以及竞争所产生的无数暴政提出抗議的。

因为，奴隶是什么呢？

让我們研究一下事物的实质，我們不要咬文嚼字，像詭辯家和修詞学家所做的那样。

奴隶，就是那些衣、食、住都发生困难的人；也就是那些睡在空曠无人的豪华大廈外边台阶上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因为伸手向富人求乞而被处罰的穷人；奴隶，就是那些沒有住所、因睡在行人道上而被逮捕的人。

奴隶，就是那些不幸的人，飢餓迫使他們去偷窃，同时他們等待着社会判决他們坐牢。

奴隶，就是身为父亲而把他自己的年轻儿子送到有碍健康的紡织厂里去呼吸恶浊空气的人；奴隶，就是身为儿子而把他自己年老的父亲送往市立收容所去死在那里的人。

奴隶，就是六岁就进入工厂的穷人家的孩子；奴隶，就是从十六岁就卖淫的穷人家的女儿。

奴隶，就是那些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是在劳动中生，就是在战斗中死"的人，他們写了这个以后进行战斗，并且牺牲了。

你們，現行社会制度的勇敢的維护者，你們在談自由嗎？但是，当你們敢于提出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問題时，那些殖民者会拿什么来回答你們呢？"我們的黑人比你們的按日計工的工人要幸福得多！"他們給你們证明了这一点。

按你們的說法，竞爭对人类的活动不是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嗎？是的，我承认这一点。但是，这是什么样的刺激呢？刺激的目的又是什么？竞爭推动每个人全力以赴地去使别人破产。这里所談的活动是在战場上展开的活动。竞爭的本质是：只有使一些人遭到不幸才能使另一些人得到幸福。竞爭鼓励一个制造商去发明机器，但是，由于发明的专利权，这个机器在发明者手中立刻就成为一个压倒他所有敌人的武器。

一种可以减轻人的劳力的工业方法被发明了，这就是所要得到的結果嗎？新方法的幸运占有者知道得很清楚，在什么条件下他可以战胜他的敌手；他并不减轻他的工人們的劳动，而是将他們大批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工人由于这种"进步"就有餓死的危险。这就是竞爭使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只有当竞爭使貪得无厌的人增大欲望时，它才能刺激精心经营企业和改善企业的精神。

尽管这个动力在本质上是恶劣的，但是如果它在社会的每个成員身上都能起作用的話，还是說得过去的。但是，为了战斗就需要武器；为了竞爭就需要資本。因此，那些按日計工的工人就被抛

在竞争所造成的运动之外。这样，在某些人身上竞争被推进到狂热的地步，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完全沒有刺激，甚至連一点希望也沒有。这就是人們敢于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来支持的事物的眞相。

如果你走进一个現代的工厂，你就会看到在那里有一些人，他們的活动受着賺錢欲望的刺激；并且也会看到，在这些人之下，还有数以百計的人干一天活一天，他們看不到任何利潤，即使可以从微薄的工資中省一点錢下来，第一次的失业或第一次的疾病就会使他們立刻把这一点点儲蓄花光。对于这些不幸的人来說，竞争又是什么呢？他們并沒有进行战斗，只充当了战斗的武器。

富人是利用穷人来彼此进行战争的。

世界上人們最濫用的詞，毫无疑問就是"竞争"和"自由"，尤其是自由。現在不是已经到了确定"自由"这一字义的时刻了嗎？自由就是让人們按照自己的天性的法則去自我发展的权利。好吧！在我們的社会制度中，对大多数公民来說，这样理解的自由是否存在呢？我們早已证明，竞争为社会創造了一种强暴的环境，这种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把过度的和不断的劳动强加在工人身上。过度的和不断的手工操作使智慧的动力毫无用处，并且使感觉趋于低能。在一天連续十二、十三、有时十四小时的笨重劳动中，精神生活和道德感情还能不熄灭嗎？而且这是什么样的劳动啊！在組织良好的社会中，細致的劳动分工对所有的人都有无可怀疑的好处，但是也使人变成了机器。

所以，如果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来說竞争是一种刺激，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說就是一种眞正窒息的制度。

那些不要社会改革而糊塗地叫喊着“应該教育人民”的人們希望的是什么呢？很明显，这就需要給人民写书，刊印报紙，可是，即使人民有錢来买，却沒有时間来閱讀啊！这就需要强迫穷人把子女送进学校，可是，他們的孩子正需要从事劳动，使父亲不致被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

假如那个按日計工的工人能在手工劳动中抽出相当的时間，以便不完全忽略他在道德上和文化上的进修，那么人們就会同意我們的意見，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工人所能受到的教育无論如何都只是一种很粗浅的教育。当教育只是在人的理解力上灌輸某些已经形成的观念，在他的記忆力中灌輸某些事实时，教育是不会有利于人的；只有当教育能够发人深思并在人的身上发生作用时，它才有利于人，因为人們在受这样的教育时才会发展。而很不完备的教育，不但无用反而是危险的。

厄德耳斯坦·杜梅里先生在題为《預算案的哲学》一书中說过：“1821年，英格兰在校人数占全人口的十七分之一，但所处罰的罪犯的比例数却大于威尔士，該地受教育的人数只占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普魯士，在某些省里，罪犯的数字仿佛是和学生的数字成正比的。在1816年有人統計，在各省的每一万居民中：

省　　分	每一万居民中的学生人数	在下列人数中就有一人犯罪（1817年統計）
薩克森	1,492	506
威斯特法伦	1,394	639
普魯士	1,030	1,405
波森	327	2,197

这些数字是值得注意的。虽然有人多多少少地轻視統計，但

当数字与邏輯完全符合时，就应該对数字加以重視。使人民对他自己的处境不满，在他的心灵中喚起嫉妒，启发他的野心而他在不能得到满足时就变成狂暴，并且給他的思想开辟一个途径，他循径前进时却又不能不誤入歧途，这就是一切不成熟的教育或遵循現行社会制度所依据的原則而进行的教育所自然而然产生的結果。

所以再談到我們所提倡的这个制度，首先就可以发現这个制度有一种优点，那就是它不但不摧毁竞賽心，而且还使大家都有这种竞賽心并使这种竞賽心純洁化。既然社会工場的成員通过社团的成就都可以平等地得到利益，那么在这些成員之間就不会缺乏刺激。个人的利益就这样成为人类活动的动力而和公共利益不可分割，所以个人利益将失去它今天所有的一切可恶的和反社会的成分，而并不丧失它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这个制度中，对任何工人的文化上的和道德上的发展都不会再有什么阻碍了，因为一切科学发明，在社会工場中如果不使利潤增加，就使休息时間增多，并且也使工人得到閑暇以便受到文化方面的培养。不用說，在一个保证了并一天一天在改善着工人(一家之主)生計的制度下，不会再发生把一些需要空气、活动和自由的七、八岁的可怜孩子活埋在一个工厂里的現象。那时，工厂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使学校关門！

这就引导我們去研究另一个反对意見，这个反对意見是：

“你一方面要想縮短工人的劳动时間，另一方面又要想扩大他們享受的范围。这两个結果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减少人民的劳动，一般的利潤就不会增加。”

这是一种錯誤。即便让工人每天只劳动七小时，应分配的利

潤总額仍然会有显著的增加：

第一，因为当工人为了自己劳动时，他就会热情地、专心一致地和快速地去完成他今天緩慢地和厌恶地所做的事情；

第二，因为社会中不会再有这一群依賴着今天普遍的混乱而生活的寄生虫；

第三，因为生产运动不再会盲目地和混乱地进行，而盲目的和混乱的生产則带来了市場的商品积压，并使博学的经济学者們认为，在現代的国家中，貧困就是从生产过剩产生出来的；

第四，因为竞爭旣已消失，我們就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悲叹不可計算的資本損失，这种損失在今天来說造成了工厂倒閉、相継发生的破产、商品滞銷和工人失业，以及过度的和不断的劳动在劳动阶級中所产生的疾病，总之，一切直接从竞爭所产生的灾害。

“但是，在你們的制度中，国家如果不是工业企业者和投机者，至少也是一个市場的調节者。价格是否能像竞爭时那样調整得同样合适呢？”

对于这一点，我們的回答是：从眞正字义上来理解，竞爭是絕对不起任何調整作用的。竞爭使整个市場成为一个陷穽。由于它的变化无常的影响，有时生产者被迫亏本抛出产品，有时消費者受人无情地勒索。有人曾经主张，竞爭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在生产要求和消費需要之間建立起一种正确的关系。沒有比这个主張更加虛假的了。我們假定有几个运輸公司相互竞爭地经营着我們的交通路线，这种竞爭就給車票决定某一价格。但是，如果在三个运輸公司中有两个由于竞爭的結果宣告失敗，那么旅客立刻就要付出三倍的票价。換句話說，需要仍然是原来的需要；而对需要的要

求却改变了。

还能想像有比这个更横暴、更荒謬的事情嗎？

其次，如果要判断竞爭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間的关系中所产生的規律性，那么只要观察一下下面的事实就够了：在竞爭的影响下，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走上了伪造的途径，甚至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的产品也是这样。因此，商业竟成为一种可怕的說謊科学……簡单地說，竟成为一連串沒有止境的不受法律制裁的偷窃行为了。所以，归納起来要知道的是，在确定事物的价值时，"調查研究"是否要比"意存僥幸"好，"規律"是否要比"武断"好，"法律"是否要比"无政府状态"好。

"你們的制度在社会成員之間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一致，是否会产生取消財产继承而威胁家庭的結果呢？"

家庭的存在如果和继承原則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話，我們就可以接受这一反对意見，因为在促使社会仰仗集体資本来維持生存时，我們就造成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取消继承权即使不是必需的也至少是可能的。

但是，大家是否了解，直到現在为止，人們为什么把继承权的問題和家庭的問題看作是絕对相关的呢？在目前社会制度下，继承权和家庭是分不开来的，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恰恰存在于我們所攻击的社会制度的缺点中。因为一个年輕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如果他旣沒有財产又沒有人推荐，而只凭自己的能力，那么有多少危险在等待着他，他每走一步都会碰到障碍，他的生活要消磨在一种无止境的、可怕的斗争中。在这一斗争中，他可能胜利，但也冒着极大的失敗危险。这一点，凡是有

父爱的人都应該充分注意到。在我們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一家之主不設法为自己的孩子們积累資金，那他显然就是拿他們的前途进行賭博。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家庭把遺产看成是必要的条件。但是，让我們来改变一下我們所处的生活环境，让我們使每个为了为社会服务而进入到社会中来的人能在社会上确实找到自由发揮他的才能的机会，并找到分享集体資本的办法。如果創造了这种条件，那么父亲的筹划将被社会的筹划所代替。事情应該这样。嬰孩由家庭来保护，成年人则由社会来保护。

有人对圣西門主义者說过："沒有继承权就沒有家庭。"他們回答："好吧！让我們把家庭和继承权都摧毁吧。"从反面来看，圣西門主义者和他們的对方同样都錯了。事实上，家庭是一种"自然的事实"，任何假設都不能把它摧毁的；继承权则是一种"社会的习惯"，社会的进步可以使它消灭的。

怎么！难道說，儿子以迫不及待的心情計算着生父的余年，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嗎？这就是合乎自然法則的嗎？"某人富起来了，因为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产生这种联系說法的条件是家庭本质所固有的嗎？不，不是的！你們譴責自然，要它对你們社会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弊端負責，这是你們誣蔑自然。使家庭的存在絕对从属于一个起腐蝕作用的并且已经腐化了的文明法則，这是你們侮辱家庭的神圣性。

今天，沒有一点东西留給他自己孩子的穷人，有家庭嗎？請回答吧。在我們所处的恶浊环境中，如果他有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可以沒有继承权而存在嗎？如果他沒有家庭，那就請你們证实你們的制度是公正的，并請赶快来证实这点……

家庭不应該是一种特权啊!

如果我們单从給与那些尙不能自給自足的人的教育的观点来看,那么,在家庭生活中一切都是可以贊叹的和动人的。并且,在这种关系上,家庭是社会的必要基础。但是,如果你越过这点,把家庭和继承权联系起来,你就立刻会在社会利益和家庭利益之間划上一条鴻沟。

继承原则給予某甲的一件东西,不就是从某乙手中夺走的东西嗎?这不就是让这一个人有权去发展惰性嗎?这不就是事先把那一个人的智慧和他的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夺走嗎?当富人向貴族叫喊說:"你們做了些什么?你們只不过是在使自己生下来的时候作了一番努力!"这时,貴族不是也可以向那些因得到遺产而成为富人的人反問:"那么你們呢?"

关于这一点,让我們来总結一下吧。家庭和继承权只是相对地和在某种社会制度下才是分不开来的。家庭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继承权则是由人造成的。家庭像上帝那样,是神圣的和永恒的,继承权则注定要走社会的变革和人的死亡的同一道路的。

但是,在目前的社会被改变以前,对于家庭中继承原则的热烈支持不会被认为是太过分的。继承权如果在全部社会制度改革之前取消的話,那就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并且会造成很大的不幸。那些原因我們已经解释过,我們不再多說。

誰敢起来攻击他那个时代的偏見,誰就要受到庸俗的指責。我們現在还需要駁斥的,就是这种庸俗的指責。人們少不了会对我們說:"你們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啊!这是眞的嗎?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事实的科学,这是无可爭議的。但是,

眞正的幻想家、眞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那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注意到那些現存的但却显然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事实的人呢？还是那主要地关心着那些还沒有存在但一定要出現而且馬上就要出現的事实的人呢？整个問題就在这里。这里有一幢房子，墙壁上到处都裂了縫，你却冒着压死的危险坚持要住在里面，試問你自信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嗎？

这里的問題是，构成近代史的是哪些事实呢？

在精神方面，是各种思想的斗爭或者怀疑主义；

在社会方面，是各种利害关系的斗爭或者无限制的竞爭；

在政治方面，是各种权力的斗爭或者无政府状态。

一个可以这样描述的社会能够持久嗎？这不就是那所百孔千疮的房子嗎？

此外，在我們所攻击的那个党派内部，沒有一个明智人不开始了解有必要来一次社会大改革的。我还能說什么呢？来一次以这本书中所闡述的原則为基础的社会改革。从那篇发表在《两种世界評論》上的出自德·卡尔內[①]先生的手笔的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話：[②]

"那个以不断的努力来主张劳动組织的学派所依据的看法，是值得我們十分认眞地加以注意的，因为那些善良的思想家定必感到他們几年来在发揮他們的思想时无疑地遇到的障碍。……而在实践中，的确，发生了什么事呢？沒有一个人不知道，而且每个人都在对那些逐年加深而找不到补救方法的創伤呻吟悲叹……如

① 路易·德·卡尔內（1804—1876），法国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譯者注

② 見1841年9月1日的《两种世界評論》。

果在这么多的痛苦面前，一些勇敢的思想家企图整飭他們认为是混乱的局面，那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在厂主和工人之間，国家出面干預；为了社会的最高利益，对于劳动自由像对于政治自由本身那样进行限制；政府关怀生产是否适应需要和有无銷路，以便通过明智的干預来防止受騙和灾难；最后，由国际法像已经限制軍事力量的竞爭那样来規定并限制工业力量的竞爭，所有这些思想其本身并沒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但是，看到共和派的政論家却把这些思想当作他們的原則的最終結果而在欧洲进行宣传，这就未免有些突兀了。”

我們可以答复德·卡尔內先生，他所认为突兀的只不过是很簡单的事情；眞正的民主学派从来就不宣传自由主义的那些狹隘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学說；放任主义只不过是今天掌握政权的人所利用的工具，并且这些人用了十五年的时間去宣传那种破坏性的学說才得到了政权。但是这和我們所說的无关。我們引用德·卡尔內先生的文章，只是为了对付那些有意把我們叫做“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让我們継续下去：

“激进党中略有声价的人写出的文章，沒有一篇沒有这类思想，沒有一篇不让你看出其中有一种明显的努力，以求通过工业因素来改变政治因素。今天在民主党的行列中，向竞爭宣战和1789年革命运动时向特权宣战的口号一样，已成为一种使人信服的口号了；廉价出售这一想法一向是同那个学派格格不入的，而那个学派，由于十年前沒有料到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作为一个致命的打击已经肯定使它得到什么結果，现在却不得不利用廉价出售来恢复它的威信。”

十年前，民主学派还刚刚形成，德·卡尔內先生所說的民主学派的十年前的学說实际上只是自由学派的学說，而今天自由学派正在盛行，并且可以肯定，人們还不能說它从种种失望和新的事实中有所領悟；因为这一学派到現在还停留在它那些由来已久的謬誤中，它以一些不可置信的貧乏理論来宣揚它可以統治世界的主张。我們应当十分注意的是：德·卡尔內先生也承认我們的思想有力量来給那些支持这些思想的人获得很大的威望！德·卡尔內先生在引证了我們曾经給廉价出售所下的定义(参閱本书第61頁)之后，又补充說：

“这一段相当完整地总結了这一经济学說，这种经济理論的发展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所不能不以好奇的心情加以注意的。薩伊的学生們无疑地会非难路易·勃朗先生，說不能这样过早地批判竞爭和貿易自由的制度，而且也不可能在尙不充分实施和大多数欧洲政府还在抗拒它的时候就对它进行彻底的譴責。”

薩伊的学生們如果用德·卡尔內先生鼓动他們去說的那些話来非难我們，那么我們就会提醒他們，正是由于竞爭得到泛濫，它的禍害才加重和增加；这是一种不可爭辯的事实；因而大家就不应該强調人們对竞爭原則尙未完全付諸实施而得出有利于竞爭的結論。此外，我們也請他們注意，他們把竞爭和自由貿易很不恰当地混为一談，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竞爭的理論根据和自由貿易的理論根据是絲毫沒有联系的；而且相反地，在竞爭存在时，就不可能有貿易自由。但是由于我們在笔战上花了很多时間，因而忘記了为什么要引证《两种世界評論》的那篇論文。卡尔內先生在論文里扼要地叙述了我們的学說，以及我們的学說在阿道夫·布瓦埃先

生的杰出著作① 中所得到的发展，和在步雷先生的重要著作《論法国和英国劳动阶級的貧困》中所得到的闡明。接着，他回忆了法国的民主宣传是在多种方式下进行的这一事实，并把他刚才所引证的那三本书归入那一种宣传的范疇，然后他說：

“一个有远見而精明的政府会防止人們滥用那些能在群众中发生力量的思想，以免誤入歧途。它会采取一些只有它本身可以謹愼地、毫无危险地执行的措施。去年，当几千工人带着威胁的神气安靜地走过首都的街道时，当他們在和平和商业繁荣的日子里停止他們的劳动，在党派的激烈煽动下討論最复杂的問題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用力量来消弥这种越是无知就越加危险的暴动。可是，在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它应該去继续完成另一个任务。政府也必須提出由那些党派所提出的問題。政府应該自問，对于那些沒有規則也沒有监督的、完全受事变和命运摆布的事情，以国家活动的唯一方式，它可以干預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可以在厂主和工人之間进行一种关于劳动条件的有益的調停呢？政府是否有权根据需要和銷路的眞正尺度来限制竞争呢？是否应該防止政府通过监督我們产品的輸出，来保护法国在国外市場上的荣誉和信用呢？最后，当新社会的結构建立在集中統一和行政作用上时，这一双重原則是否能对人数最多的和最易騷动的人們的利益漠然无視而存在呢？严肃认眞的人对各民主学說的研究所应得出的主要結論，肯定就是以坚定的意志对这些問題加以研究，以便采用与那一经济学派所用的完全消极的原則迥然不同的原則来处理这

① 《論工人的状况和通过劳动組织改善这种状况》。

些問題，这一经济学派的前途是会受到严厉的教訓的。”

这种語言够清楚嗎？我們对于一些庸碌之輩报复得够了嗎？这些人以他們的見解来衡量眞理，对于他們所不了解的一切都宣告是行不通的，并且把由于他們的过于无知而不能討論的問題，看成是不值得攻击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家伙总有他們的一大套詞汇，他們采用这些詞汇并傲慢地把它們当作是一些概念。他們是一些污蔑新思想的、毫无用处的思想家。

先生，你不是对你們一派以外的思想都加以愚蠢的嘲笑嗎？你怎能这样极端不公平，用“乱党”的字眼去侮辱那些做研究工作的人，而据你自己承认，这些人所做的正是政府应做的事呢？这么說来，我們是一些乱党，然而，你却建議政府应当把握我們的思想以便加以实施！我們是一些乱党，然而你也承认，不仅我們所揭发出来的禍害是眞实的、不可胜数的，而且我們还指出了它們的眞正原因，并且，至少到今天为止，我們还提出了可靠的补救办法！你天眞地劝告政府来把握我們的思想！这是一种值得贊許的劝告。但是，我們敢說現政权决不会采用我們的思想；首先，因为目前的政治家是过于庸碌无能了，他們不敢去尝試作一些伟大的和豪迈的事情；其次，因为他們所效劳的有关方面过于盲目，以致他們不会对压迫的愚蠢性进行了解。

眞的，他們并不是沒有得到警告。我开始写这本书时，头几行就是在騎兵队几乎猛冲到我的門口时写出的。这是在馬孔港正在流血和格雷蒙① 正在冒烟的內战废墟中恢复了秩序的消息传来时

① 馬孔是巴黎东南約三百公里的一座城市，位于索恩河西岸；格雷蒙是巴黎以北約五十公里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继续写下去的。难道我們注定要看着这些悲惨的場面不断重演嗎？难道这些訴諸仇恨的强烈呼吁永远是唯一可以使人听到的呼吁嗎？为了預防，就出动警察；为了鎮压，就采用枪炮。啊！这太过分了！这太过分了！但这还不够，还用机枪把反抗者活活射死，死了以后还要加以侮辱……請你相信我的話，这还不够，只要科学不反对叛乱的思想，騷乱就会像一个必須用鮮血来装滿的达那伊得的无底桶①。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彼此接近，使它們了解它們的利益是連带关系，使它們团結在一种高尙的、和諧的和博爱的感情中，这就是一切眞誠地热爱他的国家的人的責任。但是，在以絕对的手段去破坏上述那些劝告的效果的制度中，这些劝告又有什么价値呢？所以我們应当在这个制度的罪恶上着眼。还有哪种研究的主題比这个主題更丰富更高尙的呢？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們如果面临着这么多的痛苦而有动于衷，如果希望結束这些痛苦、研究它們的根源和影响、揭露它們的本质、寻找补救的方法，就会被那些"实践家"說成是一个幻想家、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一个危险人物。遺憾得很，这些"实践家"的智慧并不那么高超，因而他們就不能不时时受到残酷的否定。这些否定来自誰呢？就是內战。

关于这一主題，让我們再来談几句。在路易十五統治下的最后几天，有一个人說出了下面这些話，人們会怎样来談論这个人呢？这个人說：

---

① 达那伊得是达那斯的五十个女儿的名称。她們奉父亲的命令，在她們新婚之夜，各把自己的丈夫杀死。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伯內斯特尔，沒有杀死她的丈夫，他名叫林塞，以后他杀了达那斯和他的女儿。达那伊得被判在地獄里用水装滿一个无底桶（見神話）。——譯者注

“你們看看教会的权力吧！一个人刚出生在世界上，就在搖籃旁边有了教会。在他的童年时代，教会就按照它的意願来培养他；等到成年，教会容許他成亲并允許他做父亲；当他临死时，教会接受他最后的一口气；死了以后，教会把他埋葬起来；当他被放入墳墓后，教会仍在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中追踪着他，并且用他的灵魂来給活着的人当作一个希望和恐怖的教材。教会像統治着乞丐的良心那样統治着国王的良心。教会的权威也被那些沒有屈服于它的訓誡的人所承认；一切尘封的壁龕里都有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一切臥室都有祈禱的跪凳。建筑、雕刻、繪画、天才的著作、优秀的艺术，这一切都用来标志教会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它的最高权力。这种影响扎在人們心灵的深处，它是由許多世紀屈服在同一信仰之下所造成的，怎能摧毁这种影响呢？所以教会的精神上的权力的确是很大的，但并不比它的政治权力更大。路易十三时代，法国被黎塞留神父①統治着；路易十四幼年时代，由馬扎蓝神父②統治着；路易十四老年时代，由勒特利埃③神父統治着；摄政王时代，由紅衣主教杜布瓦④統治着；今天，路易十五时代，法国被又一个教士紅衣主教弗勒里⑤統治着。至于教会的財富，它們是庞大无比

---

① 阿尔曼—让·杜·普勒斯·黎塞留(1585—1642)，公爵，紅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宰相，1624年起，成为法国的实际执政者。——譯者注

② 季里奥·馬扎蓝(1602—1661)，紅衣主教，1643—1661年路易十四在位初期的执政者。——譯者注

③ 米歇尔·勒特利埃(1603—1685)，路易十四的宰相。——譯者注

④ 季优姆·杜布瓦(1656—1723)，奥尔良公爵摄政时代的宰相，性格恶劣而奸詐。——譯者注

⑤ 昂德萊·埃尔居尔·德·弗勒里(1653—1743)，主教，路易十五的老师，1726年任宰相。——譯者注

的，神职界在岡布利西[1]的一千七百把犁耙中占有一千四百把；在弗朗什·貢戴[2]大部分财产是属于享有固定收入的修士的；九千个别墅，二十五万九千处出租地或农場，十六万三千法国公亩葡萄园。以上这些就是教会在法国的物质力量的基础，每年的收入相当于十二亿两千万法郎。[3]

"好吧！再过几年，这个庞大的力量就要消失了。信仰自由的原则将代替教会在精神上的权力，沒有人再会相信教会的話；它的传統将受到公开的藐視，教会的广大財产将成为国家的財产，而它的成員将得到工資作为交換条件。

"你們看看国王的权力有多么大！国王的那些疯狂行为足以证明他的势力可以达到什么地步。路易十四使法国浴血，却竟能逍遙法外；攝政王把法国劫掠一空，而沒有受到处罰；还有路易十五使法国失去了荣誉，而沒有受到处罰。国王的宮廷費用高达二千五百万法郎[4]；国王賭博所輸的錢可以养活几千穷人；国王个人的投机事业[5]可以产生使人民陷于絕望的人为飢饉；国王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庞大的壟断；国王为了使他的侍臣和情妇发財，能随意使谷子的价格漲落[6]；国王拥有各种各样的产业可以賞給蓬帕杜

① 法国的古地名，在現在的諾尔省。——譯者注

② 見1731年5月17日法国国王敕令的引言。

③ 見弗勒里主教給路易十五的参政会的信。

④ 見1774年向路易十六的报告书《报告汇編》第114頁。

⑤ 見苏拉維：《君主政体的衰微》，第3卷，第313頁。

⑥ 拉克勒泰尔：《十八世紀》，第4卷，第298頁。

尔夫人①，例如克萊錫②的田产，奥尔奈③、貝尔維④、摩納尔的行宫，圣勒米⑤的庄园，埃夫勒⑥大廈，埃丽舍-波旁⑦宮和埃尔米达日⑧别墅；国王有的是金錢，可以把二百五十万法郎⑨賞給从一个警卫劍客那里霸占的宮女杜巴里夫人⑩，作为对她寵爱的表示；国王嘲笑我們妻子的貞操，又使我們那些女儿的童貞作出骯髒的貢献；人們对这些非法的勒索、这些恥辱和这些丑事只敢低声咒罵；这一切不都表現出国王由于人民的无知、廷臣的卑躬屈膝、王权的威风、刺刀的暴力和传統的影响，在法国所能作出的凶狠而横暴的事情嗎？

"好吧！再过几年，你們就会看到王室被屈辱、被辱罵、受到限制和受到审訊的局面。資产阶級的議会将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司法人員将傲不为礼地坐在那里接待他；人們将把他的司礼官当作仆役；他的那些大臣将成为人民的公仆。一天（可怕的一天）到

① 蓬帕杜尔夫人（1721—1764），侯爵夫人，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頗得路易十五之宠。——譯者注

② 克萊錫，法国的一个小市鎭名，以此命名者有三：一在塞納馬恩省，一在松姆省，一在安納省。此处所說的克萊錫是指其中一个。——譯者注

③ 奥尔奈，法国的一个小市鎭名，在下夏朗德省。——譯者注

④ 貝尔維，法国的一个市鎭名，在塞納瓦茲省，距凡尔賽七公里。此处有专为蓬帕杜尔夫人所建之行宫，壮丽絕伦，建于1748年，今已无存。——譯者注

⑤ 圣勒米，法国的一个市鎭名，在罗訥河口。——譯者注

⑥ 埃夫勒，法国厄尔省的首府。此外还有过一个名叫埃夫勒的公爵。估計上述地名，卽由埃夫勒公爵之名而起。——譯者注

⑦ 埃丽舍，在巴黎。建于1718年，原为埃夫勒公爵而建，以后蓬帕杜尔夫人和波旁女公爵都曾居于此宮。卽現今法国总統所居之地。——譯者注

⑧ 埃尔米达日，蒙毛兰西山谷（在塞納瓦茲省）的一所别墅。——譯者注

⑨ 見苏拉維：《君主政体的衰亡》，第3卷，第155頁。

⑩ 杜巴里（1743—1793），法王路易十五的宫女，頗得路易十五之宠。——譯者注。

来时，人們将把他送上断头台，就連罪大恶极的犯人在行刑前被允許作的事也不准他作……，因为国王的話本来是最有权威的，但他一旦落在劊子手的手里，他的話就被刑場的鼓声所掩沒了。

“請你們再看一看貴族的权力有多么大吧！它一方面依靠着国王，另一方面又依靠着教士。公共职位是专門保留給貴族的；他們拥有宮廷的各种官职，享受一切恩俸，充任軍队里的軍官；王宮中的最大官員也是从他們的內部选拔出来的，这些大官享有出卖下属官职并把卖得的錢中飽的特权。为了发財致富，可以享有关卡金、地租、徭役、永远管业权以及各种各样的人身奴役权。他們可以打猎；可是农民也去打猎的話，就会被判处徒刑①。他們拥有上、中、下三等法院的审判权，他們备有刑具、枷架和铁鎖。死罪的判决由最高法院复审，这还不过是最近的事。在农村中，他們有这样大的权力，以致他們能使人像耕地的牲畜一样去拉車；为了不叫青蛙扰醒貴族夫人的清梦，就叫一群不幸的人通宵拍打着池塘②。还有什么可說的呢？长期以来，就允許一个貴族可以用五个苏的代价来杀死一个貧民。

“好吧！再有几年全部貴族都将被消灭掉。一夜的时間就足以使封建制度全部崩潰。是的，在这一夜，农奴这个名称将从語言的詞汇中取消，永远管业权将被摧毁，貴族法庭将被废除，賠收特权将被消灭，卖官鬻爵将被禁止，什一稅可以贖买，公民都可以充任一切职位。而最令人痛快的事，就是这些反对貴族的改革是由貴族自身来达成的：貴族对自己宣告了判决，并将不可挽回地铸成自己

① 参閱1789年8月4日的通令。

② 見勒干·德·盖朗日尔1789年8月4日晚的演說。

的崩潰。①

“这还沒有完。今天的工业是隶属在行会头子和工場主的制度之下的。

“好吧！通过所有革命中最突然的和最深刻的革命，人們将宣告无限制竞爭的原則。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今天社会的一切都将絲毫不留，絕对絲毫不留。”

我再問一次，如果在1789年前几年，一个人說出这样奇怪的話，大家会怎样看待他呢？人們是否会把他叫作空談的理論家、慷慨的幻想者、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疯子等等呢？可是，他說的是眞理，那些把他說成是疯子的人却因此证明他們自己是沒有远見的和盲目的。

新社会制度的拥护者，今天恰好就处于这个人的地位。并且，可以肯定地說，在目前制度和实施我們的理想之間的距离，要比1789年前夕的社会和后来存在的社会之間所存在的距离小得多。

① 1789年8月4日晚。

第二篇　論著作权

I　禍害的本质是什么？

著作家很多，只有一部分是富裕的，很多則死于飢餓。自由已经破产，出版业已经亏本，讀者的趣味降低了。在这么多华美、丰富的书籍中間，知识領域从来沒有現在这样貧乏……。这就是禍害，这个禍害是庞大无边的。人們提出了哪些补救的办法呢？就是这一条把作者的著作权从他死后二十年延长到三十年的法令嗎！噢！吉斯特費尔德[1]勛爵在送他的儿子去訪問欧洲的那些重要的宮廷时，对他的儿子說："去吧，我的孩子，你去看看世界是被多么貧乏的智慧統治着的！"他这样說是有道理的。

等一会我就要說到規定著作权是多么的不合理。这种人要想尊崇的所謂著作权，它的行使期間的延长对于社会来說是多么不幸！但在还沒有談到問題所引起的无数困难之前，我要問：在这里立法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們的目的显然是要尊崇作家的职业，把它看成是行业，一种掙錢的方法。但是使文学成为一种工业生产方法，这是否合理和符合公共利益呢？社会上有很多人为了发財或甚至为了生活而写作，这是好現象嗎？我认为这不是好現象。

---

[1] 菲利浦·吉斯特費尔德(1694—1773)，英国政治家、作家。——譯者注

理由很簡单。一个作家要正确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必須不为人們的偏見所左右，应該有勇气不怕得罪别人而做出于他們有益的事，总而言之，应該从精神上来影响他們。这个使命是倫理学家的使命，也是作曲家的使命；是哲学家的使命，也是詩人的使命；是使我們流泪的那种人的使命，也是使我們发笑的那种人的使命。一个作家的精神产品所具的形式并不重要。在博馬舍和尼科尔①的作品中，在莫里哀②和帕斯卡耳③的作品中，这种无上的权力都同样是眞实的。

是的，文学对于社会有指揮权。但是，如果著作家堕落到把文学当做一种行业来做，如果他只是为了"积累資金"而写作的話，那么这一指揮权会变成怎样呢？迎合公众的趣味，順从公众的偏見，培养公众的无知，附和公众的錯誤，支持公众的恶劣情欲，最后写出的作品对公众是有害的然而却是他們所欣賞的……这是任何生財有道的人的必要条件。怎么！你得到了我給你的金子，却来羞辱我的愚昧，責备我的自私，在我享受掠夺得来的果实时打攪我；你使我对于未来感到恐惧！先生：你的智慧的价錢太貴了，去你的吧。这样，著作家的思想就失去它的教育性质和它在精神上的权威了。如果作家仰仗公众的恩賜，他就会丧失指导社会的能力，甚至会丧失指导社会的欲望，这就像一个国王放弃王位似的。

毫无疑問，所有的精神产品不見得都会有同样的重要性。然而，一切著作，甚至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最沒有价值的著作，对于

① 比埃尔·尼科尔（1625—1695），法国的伦理学家和神学家，著有聞名的《試論道德》一书。——譯者注

② 让—巴底斯特·卜格兰·莫里哀（1622—1673），法国名剧作家。——譯者注

③ 勃莱士·帕斯卡耳，（1623—1662），法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譯者注

社会都会起着或好或坏的作用。著作沒有权利只去做群众的消遣品，因为要使人們获得安慰，它就必須能够打动他們的智慧和心灵。順便說来，这就证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論是一种糊塗的想法。

不管文学作品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它总起着一种影响，而使这种影响达到最高的程度是非常重要的事，如果它掌握在那些見錢眼开的人的手中，那是极端危险的。我同意人們訂立一条废除著作家以著作为行业的法律；但是，如果制訂一条法律使这一行业收入更多并鼓励著作家成为文学的制造商，在我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

不仅宣布一个作家是他的作品的所有者这种做法是荒謬的事情，而且，作为奖賞而給予他物质上的报酬，这同样是荒謬的事情。卢梭为了生活而抄写乐譜，为了教育人們而从事写作。一个配称为文学家的人就应該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文学家如果他有錢，就应該聚精会神去从事思考，这是他做得到的。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就应該懂得，怎样使他所从事的謀取生活之需的职业和他的写作工作配合起来。

在現代的作家中，有一位耐心地和通宵不眠地从事研究的作家，他为了人民終于把那条到处断裂的传統鎖鏈重新連接起来。可以肯定說，沒有一个人会比蒙泰先生为了一部历史著作而工作得更热情更有耐心的了；沒有一个人像蒙泰先生那样把一生的大部时間都用在写作上的。倘若蒙泰先生在献身于自己的著作的三四十年中，只等着从他所写的著作中得到維持他生計的手段，那么結果会怎样呢？結果会怎么样呢？我不敢說，你可以猜得到。但是，感謝上帝！蒙泰先生具有一个勇敢的和高尚的灵魂。为了对付极

端的貧困，他就求助于一种可尊敬的办法：他出卖了他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所使用的材料，出卖了他去各处考察旅行时在这里或那里收集得来的珍貴手稿。这跟卢梭抄乐譜是同一作风。由于这种勇敢的行为，蒙泰先生过着貧困的生活，却避免了世态炎凉的摆布。他仍然是他自己的主人，也是他自己作品的主人。

假使他不是为使眞理得胜，只为了“賺錢”而著书立說，假使他不依靠出卖罕見的手稿来維持生活的办法，而在他的著作上进行投机；那么他就会急于求成，写得更快、写得不那么好。他也就不会去写那关于农业、商业、手工业的內容丰富的和有用的历史了……他也就宁可去写那种供人消遣的关于战争和宮廷中的明爭暗斗的历史了。这样，社会就会失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一部优秀的作品。

在我們这个时代的最著名的詩人中，人們敢于把多少詩人放在貝朗瑞[①]之上呢？貝朗瑞的所作所为和蒙泰、卢梭一样。当他为他的那些不朽的詩篇而工作时，他就为了生活上的需要而找到了一个低微的职位。

1789年革命以前，严格地說来，写作职业是不存在的。在文学史中，我們看到，在路易十三时代，拉·賽勒[②]为自己作品的暢銷而自豪，拉·卡尔普勒內德[③]尽管很高尚，却用了书店老板庫尔貝的錢来买大衣。然而，靠作品收入为生的人却是不多的。在作

---

① 比埃尔·让·德·貝朗瑞(1780—1857)，法国卓越的詩人、歌曲家。他对拿破侖制度的諷刺詩«伊維托国王»获得了文学上的盛誉。——譯者注

② 让·德·拉·賽勒(1600—1665)，法国悲剧作家。——譯者注

③ 高梯埃·德·拉·卡尔普勒內德(1614—1663)，法国的小說家。——譯者注

家中有一些人，如布蓝托姆①、比西-腊比坦②这两位高傲的紳士，他們只在不用宝劍时才拿起笔来写作；另外一些人，像代馬萊③那样，是一个公务員；还有一些人則是处于国王庇护之下的，如莫里哀和拉辛④。大部分的文学家則像梅雷⑤那样，被一个大貴族所雇用。梅雷曾写信給德·蒙莫朗西⑥公爵道："旣然我像現在这样荣幸地受您的垂爱，而我的献身于您并沒有使我失去行动自由，我不知道，除您之外，在法国还有誰可以使我更恰当地把我所研究的最初成果献給他的。"人們看到这种地位所意味着的卑躬屈节；然而这种地位只能同造成它的那种制度一起消灭。卢梭为了不甘心处在这种地位，在他的独立生活中，受到那些有嫉妬心的同行的无情誣蔑；他沒有狄德罗⑦那样幸运，因为狄德罗是喀德林二世⑧的寵臣；他也沒有像伏尔泰⑨那么幸运，因为伏尔泰是腓特烈大王⑩的朋友；他又沒有像格林⑪那么幸运，因为格林是十八世紀所

---

① 比埃尔·布蓝托姆(1540—1614)，法国作家。著有«回忆录» «法国名人和大将領传»、«蕩妇传»。——譯者注

② 比西-腊比坦(1618—1693)，法国作家。——譯者注

③ 让·代馬萊(1596—1676)，法国詩人。——譯者注

④ 让·拉辛(1639—1699)，法国有名的詩人。——譯者注

⑤ 让·梅雷(1604—1686)，法国詩人。——譯者注

⑥ 蒙莫朗西，法国的一个有名貴族，其家族出了好几个名人，此处大約是指蒙莫朗西·亨利二世(1595—1632)說的。——譯者注

⑦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譯者注

⑧ 喀德林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譯者注

⑨ 法朗苏瓦-瑪利·伏尔泰(1694—1778)，法国著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启蒙学者。——譯者注

⑩ 腓特烈大王(1712—1786)，普魯士国王，1740年即王位。文学的爱好者。——譯者注

⑪ 格林(1723—1807)，德国文学家和評論家。——譯者注

有爱好哲学的国王的中間人。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至少必須有一次革命，而在这次革命的前夕，《年轻的阿納卡西游記》[1] 的作者不是生活在舒瓦瑟耳[2] 公爵寵爱的庇护之下，愉快地隐居在尙特路[3] 嗎？

1789年——这永垂不朽的年份——来到了！这时作家不再属于某一个人了；他們不得不对于他們的著作进行投机，他們是属于所有的人了。我不知道他們在这方面是否得到了利益，但可以肯定地說，社会是受到了损失。作家过去所过的依附权貴的生活的义务实际上縮小多少呢？我不知道愚人的虚荣究竟向智慧索取了什么样的无聊的諂媚的貢献。这是一种不幸；但是作家的尊严所受到的损失比社会利益所受到的损失要大得多。高乃依[4] 贊美馬扎蓝的德行的那种奴顏婢膝的序言，并沒有阻止《西娜》[5] 的伟大作者通过埃米里的嘴喊出："为了要做一个超过国王的人，你居然自命不凡！"

今天，当一个作家自己发揮他的思想时，他的主人不再是供养他的权貴，而是讀者了。作家不再是出卖自己尊严的人，而成为放弃自己职务的人。

---

① 阿納卡西（紀元前六世紀），西得亚民族的哲学家，紀元前589年左右在雅典出現，成为梭伦之友。这里所指的是修道院院长让·雅克·巴尔戴萊米所著的那本游記說的。——譯者注

② 舒瓦瑟耳(1719—1785)，公爵，曾任法国路易十五世的外交大臣。——譯者注

③ 尙特路，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的一个村子。于尔辛女亲王曾在此建造了豪华的別墅；其后舒瓦瑟耳隐居于此。——譯者注

④ 比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杰出的悲剧作家。——譯者注

⑤ «西娜»，是皮尔·高乃依所著的一部悲剧(1640年上演，1643年出版)，女主角名埃米里。——譯者注

革命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把上帝掺杂在一起的嘉禾和莠草全部拔走。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这次革命在废除行会头子和工場主的同时，也給了垄断和社团以致命的打击；它在推翻一切旧政权的同时，同样也毫无区别地消灭了政权所践踏的和保护的东西。像在工业方面那样，个人主义的理論在著作方面也占了优势。革命方面竭力反对那个原則的代表人物，而那个原則在这反对声中却遭到了毁灭。为了更好地粉碎形式，人們就对思想进攻。在一切社团和保护制度的深刻动蕩中，作家們仅仅依靠他們自己，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們自己的思想去作买卖，拜金主义就侵入到写作中去了。另一种不幸是：写作已經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因为那些看到其他职业已經人浮于事的人就成群結队地去参加創作。当个人主义以自由为名而把普遍竞爭推向頂点时，在人类活动的各方面怎么会沒有拥挤的現象呢？另一方面，一些富有魅力的話吸引了人們；人們把"平等"一詞写在我們的法典中了。尽管如此，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仍受轻視，孩子們被灌輸的仍然是那种认为有些行业和艺术是"自由"职业而其他則不是如此的思想。因此，人們在心灵中对于一举地成名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因此，在所有那些青年人的思想中播下了从事写作或从事艺术的野心的种子。教育更加普及，但并未得到很好的領导，这样，就造成大量的青年人侵入到社会中来，这些青年对他們自己的欲望或幻想抱有信心，都同样地希望一举成名，同样地趋向現成的道路。

結果怎样呢？表現在工业方面的現象在写作方面同样也表現出来了。到处都有挤满的人群，到处都有糾紛和沒有休止的斗爭；有各种各样的混乱和灾难。著作界中的竞爭也产生了和工业竞爭

中所产生的类似的結果。工厂主为了廉价出售以打垮对方而假造产品，同样地，也会有那种伪造自己的思想、削足适履地改变自己的风格的作家，用硬凑的情节、夸大的情感、不倫不类的語調以及不道德的经验談等等不光彩的誘惑力来爭取群众。一个工业家以巨額的資本压倒他的竞爭者，同样，一个富有的作家在声誉方面可以很快就胜过一个穷作家，他以后就利用已经得到的响亮的名声来把无人知晓的眞正有才能的作家埋沒起来。在不断增加着的书籍的泛滥中，群众失去了方向；他們旣不可能也沒有时間去选择，就不再购买那些认眞作家的作品，而把自己的灵魂交給了江湖派。因此产生了滥用广告的可怕現象、互相吹捧的来往、卖淫式的批評、同行的傾軋、一切可恥的行为、一切謊言、一切丑行。

倘若大多数的作家以損害文学的尊严、动搖公共的道德、腐化智慧的源泉为代价而能发財致富，那还算不錯。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做法旣是丑恶的又是招致毁灭的；他們以声名狼籍始，以貧困終。

接着，在这些废墟上滋生了一些投机者，他們自告奋勇地向作家提供帮助。在这些思想混乱中，他們所加入的資本并不是錢，而是某种剝削的新花样，一种手段；作家不得不接受他們的帮助。这种帮助很快就变成控制手段，买卖人去接近有才干的人，只是为了要吞噬他。人們看到一些作家、甚至一些最优秀的作家把自己出卖給文章的掮客，他們不是零星地出售，而是整个地出售，就像梅雷給蒙莫朗西公爵的信上所写的："我献給您的就是我自己。"在这一幅不幸地描繪得过于忠实的图画上，还能再加上些什么呢？一些勉强能拿起笔来的手，今天竟能号令着文学，这是不是眞实的

呢？一些貧困的作家每天在某一个全能的投机者門口，像要求施舍那样，寒伧地要求发表他們的文章，这难道不是眞实的嗎？如果这是眞实的，那么我們已经墮落到什么样的黑暗程度了呢！

昂利·德·拉土舍先生① 有力地描写了写作方面的这种墮落情況，他写道："写作的风气轉向金錢，这是我們时代的定型思想，这是带着传染病的瘋狗咬了这个庸俗的时代。你們是否相信已经組成了反对思想传播的集团呢？我們的作家們像萊茵河彼岸的小諸侯那样結成联盟，他們不是为了有利于传播思想，而是为了有利于利潤的集中而联合起来的。他們保证了他們自己領土的完整、边疆的不可侵犯，因为这些边疆都是靠得很近的。如果有人抄襲了他們的半篇文章，他們就认为被剝削了，这是著作界的神圣联盟……人們会觉得奇怪：这些先生怎么会让一些人无偿地在我們的林蔭道上散步，而不向看他們一眼的过路人去征收稅款呢。"

① 昂利·德·拉土舍(1785—1851)，法国的小說作家和詩人。——譯者注

Ⅱ　人們所提出的荒謬无效的补救办法

請問，在我們刚才所描述的禍害的本质与人們所提出的那种补救办法的本质之間，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禍害在于存在着太多的、无用的、恶劣的或危险的作品；而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却是以立法手续来許可这个灾禍。

禍害在于书籍的作者利用这些书籍牟利，而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却是延长这种牟利的期間，并且使它成为一种身后的权利！

禍害在于下列的事实，即写作成为一种行业，人們把它变成思想的商店，讀者成了顾客。为了保持来往，就应該試探这些顾客的爱好，迎合他們的朝三暮四，卑躬屈节地逢迎他們的偏見，附和他們的謬見；可是，人們提出的补救办法却把这种可惋惜的事实作为神圣的原則来对待，并用法律来加以肯定！

这样严重的盲目无知难以令人理解。

此外，既然人們談到了著作权，那么我們就来看看这个詞彙意味着什么吧。

思想所有权！这等于說，我手中拿着的皮球里所含有的空气的所有权。皮球开了一个口，空气就从里面跑出来，四处散逸，混在一切东西里面，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呼吸它。如果你保证我享有思想的所有权，那你就必須把大气的所有权給我。你能这样做嗎？

首先，我們要問"著作权"的拥护者們，連同波尔塔利斯先

生[①]在内，对于所謂属于某一个人的一种思想，你們怎样理解的呢？你們說思想这件东西是属于你們的。但是，也許用十本书，就可以包括現存的一切书籍；而这十本书是全世界的人共同写成的。

伟大的人物只是仗着他們借自社会的力量来統治社会的。他們只有把社会本身分散出来的一切光芒集中在熾热的中心才能照亮社会。他們是从社会攫取权力而加以領导的。

这是非常眞实的，当基督出現时，罗馬的世界在期待着，并且对于福音有着預感。至于路德[②]，他除了表达教皇的暴政在人們心灵中所喚起的反抗願望之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种反抗的願望早已在各处以各种不同的、但有力的和特有的形式爆发出来了。

人們可以看到，这种說法将导致我們放弃所有权的实质，而只去承认它的形式。据說德·巴尔扎克[③]先生曾就著作权問題向議会递呈过一份請願书，如果是眞的話，他会同意上述的意見的。但是，請看这个冠冕堂皇的理論，它的結果是什么。夏尔勒·傅立叶[④]认为应該用一种奇怪的和难以理解的詞句来表达組成他的学說的基础的思想。来了一个文章抄襲家，他把傅立叶的学說据为己有，并且用清晰的文体，也可以說用优美的文体来說明这个学說，并把它全部卖出去。你們会看到在快要餓死的傅立叶身旁，这位

① 让·埃提昂納·瑪利·波尔塔利斯(1745—1807)，法国法学家，法国民法法典起草人之一。——譯者注

② 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的宗教改革家，新教的創始鼻祖，也是圣经的德文翻譯者。——譯者注

③ 奥諾莱·德·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有名的作家，«人間喜剧»的作者。——譯者注

④ 夏尔勒·傅立叶(1772—1837)，法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傅立叶主义者的領袖。——譯者注

抄襲家将发財致富。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話，那么所有权該是什么呢？这是剽窃。

此外，不管在每个人的思想中别人所占的成分有多大，人們至少不能否认，思想是从发表中得出它全部的价值的。与世隔絕的思想有什么价值呢？在脫离任何社会情况之下，实物的消費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消費是个人的，同样也可以是单独的。合群的观念对野蛮人在树林中所采集的果实以及对他所猎获的动物的价值是毫无增益的。至于思想，那就完全不同了。思想的重要性是按照使它受智慧的尊敬的比例而增长的。消費損耗实物，并使它們消失。思想的传播是智力的消耗，它不但不消耗掉那些无形的事物，反而使它們增多，使它們变得更加珍貴，并增加它們的內容和生命力。所以，并不需要知道精神产品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只需知道它們的"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可以懂得这些产品不能是任何人的財产。倘若正是社会賦与精神产品以"价值"的話，那么，所有权就应該只属于社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承认著作的所有权，这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簡直是对于社会的盜窃。

"注意！"特·巴尔扎克在他的小册子里写道，"你如果容忍人們否认著作权，那么土地所有权就要处于危险的境地；攻击著作权的邏輯不久就会推翻土地所有权。攻击一方，对另一方也会发生影响。"作为战术来說，沒有比这种对比更巧妙的了；作为論据来說，就沒有再比这种对比更貧乏无力的了。如果所有权在事实上得到承认，在原則上得到保护的話，这只是因为社会可以从这种协約中以及这种协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中得到利益的緣故。人們假設社会曾对地主說过："你将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你可把它留給你

的孩子，因为那些为了尽可能使它变得肥沃的农业劳动要求安全、耐心和时間。你可以大声疾呼說：‘这是我的。’誰反对你誰就要受处罰，因为我們要你去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你个人去栽种树木，我們要你去挖掘那些将由你的孩子們去完成的运河，要你去开采矿藏，这些矿藏很深，用一个人毕生的时間是开采不完、消耗不尽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們才宣告你是所有人。”

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人們就从不論是否确凿无疑的社会利益出发，絲毫不提及显然有必要要尊重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这样地古老，这样普遍地被接受，这样不可动搖，并且甚至这样难于加以改变。在这里，却毫无相似之点。試把一个作家的利益放在天平的一只盘子里，把社会的利益放在另一只盘子里来衡量。人們要求我們承认的，簡直就是一个人比整个人类还要重。

所以著作权本身已被它自己的原則判定是不合理的，但是它的后果使它更加有力地被判定是不合理的。

如果著作权得到承认的話，那么首先就必須使它成为可以继承的和永久的；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它和社会利益相抵触，或是它和社会利益相适合，如果是前者，那么为什么要尊崇它的原則呢？如果是后者，那么为什么限制它的实施呢？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无可原諒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自相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实在說来，如果这一討論的要点只在于要知道作家的著作权是否在他們死后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后还存在，那就再沒有比这种討論更可怜的了。显然問題并不在这里。

但是，使作者权利的永恒性成为神圣不可侵犯时，社会将处在

什么样的危险中呢？《民族日报》在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中說："如果使作者的所有权神圣化，那么一般的利益将变成怎样呢？是不是由作家本人来保证这一般利益呢？你知道作家可能会经过一些动蕩不定的阶段嗎？你不知道最有名的作家自传嗎？拉辛在老年专心从事翻譯《圣咏》时，他不是要想毁掉《菲特》和《昂德罗馬格》①嗎？拉·封丹②受到他的懺悔神甫的攻击以后，不是要求烧毁他的那些短篇寓言嗎？假如在1814年，对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存在着旁系亲属的继承权，政权是一定会引誘那些继承人的。继承人在行使他們的权利时会为了一笔巨款出卖这些作品的著作权，而这些作品也就消失了。"这些理由非常有力，还有多少其他理由来支持这些理由呀！但是，一般地說，我觉得在这种討論中，那些反对著作权的人过于强調这种权利在继承上是不宜轉移和永久存在的。应該攻击的是作家本身行使这个权利。不应当說："你們不妨用'待遇'这个詞来代替'所有权'这个詞，并且在把继承人的权利限制在十年之內时維持事物的現状。"而应該像那些自信为眞理而战斗的人那样，勇敢果断地說："頒布一条法令，并不是为了使著作权神圣化，而是为了宣告著作权是反社会和反宗教的。頒布一条法令，以便取消作家的那种'职业'地位，以便不用个人的待遇制度而用社会报酬的制度来代替著作权制度。"事实是，无論是著作权的拥护者或反对者，誰都不敢表現出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在这里，我毫不犹豫地重复說：不只作家的继承人靠一本书来

① «菲特»和«昂德罗馬格»是拉辛的两部悲剧。——譯者注

② 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的大詩人。——譯者注

牟利是有害的，就是作者本人靠那本书来牟利也是有害的。

事实上，人們通过这种說法已经肯定，在社会中，思想这样东西完全像一包棉花或一个糖面包那样，应当是可以交换的物品，而思想家的利潤应当是根据利用他的思想的人数来計算的。

一方面，这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这又是不公正的。

因为，誰能知道思想是以哪种方式传播到每个人的头脑中去的呢？从一本书里得到的思想可以由画家的調色板反映出来；素描画家的鉛笔可以抓住这个思想；雕刻家的刻刀可以把这个思想刻在大理石上；讲演詞中也可以表現出这个思想，那么，难道你能找遍无限的表現形式和无法計量的空間来追踪这个思想嗎？世界可以成为这个思想的領域，难道全世界都要向你付錢嗎？在这里，你接触到了不可能的事；再进一步你就会接触到非正义的事了。每人都会从交换中得到利益，但版稅却只从几个人身上征收。我在一本书中获得你的思想，我就需要对你的思想付出代价。如果我从演說家的嘴中听到这个思想或者在名胜古迹的大門的雕刻上看到它，那我岂非不必付給你任何代价了嗎？人們既然談到版稅，那么有比这样的一种捐稅分配方法更加不近人情的嗎？

談到物质的东西时，人們如果根据消費量的大小来衡量生产的利潤，这是可以理解的。消費的限度是可以估計的，因为消費的結果达到一种耗損。但是，对所謂通过传播来实現的那种文化上的消費，你能划出一个界限嗎？思想被接受后并不会突然消失，反而会壮大起来，加强起来，无論在时間和空間上都会传播开来。即使你叫全世界都来接受这个思想，它也会像自然那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并且也会像上帝那样永垂不朽。

因此，使思想受交換学說的支配，就是以有限的数量来計算无限的数量。这种学說的荒謬无稽是很明显的。

就这个学說的結果来說，它們是令人厌恶的。著作权的拥护者，也就是那些认为作家可以利用著作以自肥的人，高傲地扮演着天才保护人和智慧的庇护者的角色；他們沒有看到，如果他們的学說被大力地应用，如果这一学說的缺点不被相反的学說、即社会报酬的学說所减轻，那么他們的学說就会把天才引入絕境，把智慧的最珍貴的产品埋沒在黑暗之中。这是容易证明的。誰談著作权，誰就是談通过交易取得报酬；誰談通过交易取得报酬，誰就是談商业；誰談商业，誰就是談竞爭。所以你看，坏书就来和好书竞爭了；某些腐蚀心灵、玷污思想的小說就来和那些有益而又严肃的书籍竞爭；誘惑性强的罪恶意识和最高尚、最道德的观念竞爭。你可以放心，买《于斯丁訥》的人一定要比买帕斯卡耳的《思想录》的人較多；而还有这种情况，即使有人願意欣賞帕斯卡耳的天才，但是因为德·薩德先生[1]对他征收了錢，他就不能去欣賞了。因此，由于这一为天才設想的漂亮的奖励制度，禍害的力量将增加百倍，群众的趣味在受到无可救药的腐蚀之后，将拒絕一切丰富的精神食粮。我們同时将受到下列一切灾害：由于危险书籍的泛滥，人們的心灵和思想都会变坏；伟大作家陷于貧困；某些小有才智而寡廉鮮恥的人或某些下流的作家却得到不体面的成功。

我不願意使这一严肃的討論变成一种关于一些人名的无意识

---

① 德·薩德(1740—1814)，侯爵，法国作家，《于斯丁訥》等长篇小說的作者，他所著的小說都是誨淫誨盜的，因此毫无文学价値。——譯者注

的論战；但是，如果举例是必要的話，那我可以举出不知道多少的例子来。多少平淡无奇的作品由于时髦而得到褒奖！多少有价值的书被埋沒掉！我用不着在这里举出一位作家的姓名，他由于写了一本《結領带的艺术》的小册子而得到很多錢，因为我不能不联想到某些伟大作家的貧困而感到面紅耳赤。

今天，一本书成功了，为什么呢？是由于它的价值嗎？完全不是；而是由于他的发行人。天才要靠投机得到他的保障。

但是也有一些誠实的发行人，他們眞正为著作服务。——是的，感謝上帝！在我这方面，我还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最有才能的作家在他們那里得到了一种眞正的帮助。但是这种值得贊揚的人为数不多，而有些願意仿效他們的，大都被卷入到竞争的浪潮中去了，他們为了避免营业損失，不得不发行伤风敗俗或臭名远揚的书籍。

补充一句，眞正的作家对于这門买卖的学問一般地是很外行的。著作制造商就不同了。这种人很巧妙地利用他的作品牟利；这是他的职业。通过交換而給与报酬的制度，实际上只是給与投机精神一种奖励。

所以，我們不論就著作所有权的原則来研究著作权，或是就它的必然的結果来加以研究，同样都不得不譴責这种权利。

可是，德·拉馬尔丁先生的报告却是以这样的权利作为出发点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德·拉馬尔丁的报告是以这样的詞句开始的：

“社会在規定一切所有权时，針对着三个目标：酬报劳动，延续家庭，增加公共財富。正义、远見和利益，是在每一占有物上都存

在着的三种观念。”

如果通过規定所有权这一事实来使劳动得到报酬，那么，所有从事劳动的人都应該成为所有者，而一切所有者又都应該劳动。但是所发生的事恰恰与此相反。目前規定的所有权在本质上允許享受所有权的人得到休息的一切甜蜜的乐趣，并把整个的劳动重担放在那些享受不到所有权的利益的人的身上。一方面，有一小部分人靠他們的年息过着优裕的生活；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靠他們流汗得来的果实勉强維持生活。让德·拉馬尔丁先生在这一点上稍稍考虑一下吧。

至于使家庭永久延续下去这一点，如果家庭要靠所有权才能永久延续下去，那么不是财产所有人的家庭就不能延续下去了。所以德·拉馬尔丁先生的話应該这样修改一下：“社会在規定所有权时，目的是使一些人的家庭永久延续下去，而禁止另一些人的家庭永久延续下去。”

关于增加公共財富这一点，必須加以明确。如果財富增加了，但只集中在几个人手中，那么这并不是一种“公共”財富。在目前所規定的所有权的統治下，是富人比穷人多呢，还是穷人比富人多呢？

假如德·拉馬尔丁先生說，“所有权之所以規定，就是因为社会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如果沒有这种所有权，該用什么方式来安排生活”，那就好了！論点也就說得过去了。但是德·拉馬尔丁先生談到正义、預見和利益时，把社会利益和世界上那些幸运儿的利益混为一談，把垄断誤认为預見，把公正倒过来了。

让我們继续看下去：

“有些人从事体力劳动，有些人从事脑力劳动。劳动的結果不同，劳动者的名义却是一样；一些人和土地、季节进行斗爭，他們收获了用他們的劳动得来的那些可以看得見的和可以交換的果实；另一些人则和思想、偏見、无知进行斗爭，他們用智慧的劳动、甚至用他們的眼泪、有时还用他們的鮮血洒在他們的篇幅上，随着时間的轉移，他們得到的是貧困或群众的敬爱、殉道者或光荣。”

这种說明显然是不完整的。如果有些作家为了反对偏見而斗爭，那么就有另一些人为这些偏見辯护。有些著作有时攻击无知，有时却也支持这种无知。卢梭把光荣归于上帝，但霍尔巴赫[1]則否认上帝。費訥龙[2]提倡社会道德，而德·薩德侯爵則在腐蝕社会。科学上有伽利略[3]之流，也有伽克里奥斯特洛[4]之流，也許科学所造成的殉道者少于它所褒奖的騙子。

我坚持这个被德·拉馬尔丁先生所遺忘的区别，因为，当涉及到奖励脑力劳动时，首先应当解决的問題是寻求奖励脑力劳动的方法，而不是在同一奖励中把能使社会活跃并使社会得到光明的作家与欺騙社会并使社会道德敗坏的作家混淆起来；因为这既不符合正义，又不符合远見，也不符合利益。

“把作者的著作权交給作家和他們的家庭，这是不是公平、有益和可能的呢？我們提出的这三个問題在法律原则本身的开头几

① 保罗·亨利·霍尔巴赫(1723—1789)，生于普魯士，无神論的哲学家，十八世紀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資产阶級革命的思想家。——譯者注

② 法朗苏瓦·德·費訥龙(1651—1715)，侯爵，法国作家，十八世紀启蒙学派早期的先驅者之一。——譯者注

③ 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的天文学者，物理学者，天体望远鏡的发明者。——譯者注

④ 伽克里奥斯特洛(1743—1795)，意大利医生和神秘术术士。——譯者注

条中已有規定。这些問題不是事先就已解决了嗎？假如正义不在原因和結果之間、在劳动和报酬之間达成相称的比例，正义又是什么呢？”

让我們接受这个关于正义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很明显，沒有比把脑力劳动的奖励放在著作权中更不正义的了。

假如拉普拉斯①从自己的作品中沒有得到别的物质奖励，而只得到可以随便处理和出卖它們的权利，那么《天体的机械作用》一书既只能供极少数的讀者閱讀，拉普拉斯的劳动和待遇之間将要得到什么样的比例呢？可是你看，有一个小說家，他急急忙忙地乱塗了几頁，这几頁不但恶劣而且誨淫誨盗，是专供所有那些无事可做的人的消遣而写的。那位天才的人物冒着死于貧困的巨大危险，而这位小說家却不必費很大力气，就有了車子和仆人。怎样来理解分配的正义呢？但是，你会說，国家会来保护有天才的人，給他荣誉，提拔他担任最高的职务的。你瞧，你已经越出你的学說了，这种使你越出你的学說的必然性，能够更好地证明我所能說的一切，即这个学說包含着多少可憎的不平等和多少对于非正义的尊崇呀！

“这是有益的嗎？我們只要回答說这是公正的就够了，因为对一个社会来說，首要的利益就是正义。但是，那些詢問在将来奖励脑力劳动是否有益的人，从来就沒有在思想上考虑这种劳动的本质和結果嗎？他們也許看到，这是一种沒有資本而可以进行的劳

① 比尔—西蒙·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譯者注

动，这种劳动可以不消耗資本而創造資本，并且，除了天才和意志的帮助之外，不用其他的帮助就可以从事生产。他們是否探索到这种劳动的結果呢？他們也許会看到这是一种对人类命运最有影响的劳动，因为就是这种劳动影响着思想，支配着思想。人們浏覽一下世界历代的思想史，就可以发現，当一个民族誕生之初，人們在立法者手中到处都可以找到一本圣书，如圣经、印度的吠陀经、孔子的著作、福音等等。全部文明都是一部书的产物。一部創造、破坏和改造世界的著作，对于世界来說，它会是一部无所謂的著作嗎？”

我們談到哪儿去了呢？我們的討論是要证明，把作家作品的著作权交給作家和他們家庭是否是一件有益的事。德·拉馬尔丁先生却不是证明这点，他給我們证明的是我們任何人从来沒有怀疑过的事实，即思想是有用的。这眞是一种惊人的无稽之談。是的，思想肯定是有益的，我們不但不否认这个眞理，相反地，我們却根据这个眞理来要求人們不要妨碍它的进程，永远也不要去阻止它的传布。正因为整个文明是书籍的产物，所以我們不允許，哪怕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在人們宣告他是其中一本书的所有者以后，去撕毁这本书并让撕下来的篇幅随风飘走。因此，为了上帝的緣故，我們不承认你們称之为圣书的那些书籍的作者享有著作权，免得你們把它交給一个白痴、也許一个恶汉或一个傻子去继承。这是你們以一本书能給人类带来巨大貢献的名义，給予一个既未写这本书又往往不能了解这本书的个人以那种不能想像的权利来破坏这本书嗎！因为，倘若你們承认这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实，至少你們应該认为这个事实是合理的，否则你們就会用一只手来推翻你

們另一只手建立起来的建筑物，否則你們就会在确定那个所有权的同时，剝夺所有者的那些构成这个所有权的特权。人們能够設想那本福音通过继承权而属于某一位先生嗎？人們能够設想一个买得了专利的投机者出卖人类的幸福嗎？

“最后，这是可能的嗎？这种以思想通过印刷和书本而得到具体传播的偶然的和不可捉摸的財富，就其本质来說，是可以在所有权的形式下为我們所理解、确定并規定下来的嗎？对这个問題，事实已經替我們作了回答。这种所有权是存在的，并且像其他一切所有权那样，可以被买卖并可以受到保护。我們只需要研究与它有关的措施，規定它的条件，以便把它完全列入到对占有物和占有人确有保障的事物的范围中去。我們就是这样做的。”

貝尔維先生对拉馬尔丁先生报告中的这一段作了这样有力的回答，所以我們只需把貝尔維先生讲話的原文引录在下面：

“在宣告所有权是永久的或是限制五十年的时候——实际上，結果都是一样的——，你不是碰到作家本人的問題，就是碰到他們的继承人的問題。好吧！假定继承者不是旁系亲属，作为第一代来說，这还沒有什么問題；但是一旦这些继承人分散开来了，你到哪里去寻找他們呢？是否应該让著作权所有者組成一种貴族系統，并使它拥有它自己的歇符蓝和多济埃①呢？还是应該像在威尼斯②那样設置一本“金名册”③呢？这还沒有完：你所給与的这个权利不

① 比尔·德—拉·加尔德·多济埃(1592—1660)，法国家譜学者。其子勒內·多济埃(1640—1732)亦系有名的家譜学者。多济埃已成为研究家譜学的学者們的通称。——譯者注

② 意大利的一个城市。——譯者注

③ 这是一本册籍，威尼斯城的全部貴族的姓名都用金字記載在这本册籍中。它于1797年意大利战爭中被毁。——譯者注

仅給了继承人；所有权不仅可以通过继承权而被轉让他人，而且也可以通过出卖和赠与而移轉。所以，你也承认受让人可以得到这个所有权；并且，既然这些轉让契約不是公开的，那就必須猜測它們的內容，必須知道你是跟誰在打交道。你的摸索有沒有止境呢？”

貝尔維先生說的对。人們如果扩大著作权的行使，就不能不愈来愈接近混乱。德·拉馬尔丁先生把二十年期間所能做到的事情，认为在五十年期間将有可能做到而得出他的結論，因此他并沒有解决困难，而只是躲避了困难。他沒有注意到随着年代的逝去，著作权就会易主并且也会分散开来，以致最后就不可能找到它的踪迹了。

所以，德·拉馬尔丁先生的报告，对于他所要想证明的东西，一点也沒有加以证明。

但是对于这个报告所引起的辯論应該說些什么呢？

在《人民报》上，格·卡韦尼亚克先生① 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以很高明的方式研究了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才干的人，不应該比别人更甘心做貧困的奴隶；但是，倘若他不甘心情願处在这种适合于性格坚强的人的自由自在的貧穷和簡单的生活中，至少既不应該养成奢侈的思想也不应該养成启发这些思想的兴趣。当一个作家爱好錢財时，人們总会怀疑他是否有天才或者是否能够保留这个天才。如果他有天才，吝啬会使他的天才堕落，奢侈会使它趋于衰弱。如果那个作家具有天才，我认为他就只应当在他的思想本身和他的名望中去寻求他的乐趣；只有在他的理論中和他的

① 格·卡韦尼亚克（1801—1845），法国查理十世和路易菲利浦王朝时代的民主党的領袖。——譯者注

影响中去寻求他的乐趣。毫无疑問，他不需要有阿尔帕貢①或屠尔卡雷②的享受。我們的社会不再有隐居的条件，也不再有严肃的生活，这种条件和生活至少保留着朴素的和摒除私欲的风俗习惯、宁静独居的和飲食淡泊的清規、謙逊而忠实的热誠的传統。再也沒有像本篤会修士那样的人远离人間去笔耕学术世界的一个角落，再也沒有传教士把教义带到遙远的地方，深入到那些遙远的国家，再也听不到他們的姓名，再也沒有学术团体遁迹在某些学院中，去度那粗茶淡飯的生活，并为默默无聞的工作去服务了。当然这一切都混杂有过多的流弊和恶习，使我們不去惋惜他們的那个时代，但是我們所惋惜的是这些摒除私欲的、退隐的、献身于社会福利和研究事业的高尚而严肃的生活的榜样。目前，这是一个无人担任的任务，我們願意看到无愧乎作家称号的作家們来承担这項任务。"

这些就是高尚地表現出来的高尚的思想，而議会本来是应該把自己放到这种高度上来討論这一問題的。但是，幼稚而可怜的是：把思想当做一种物品，并且費尽心机去研究一个家庭对这种物品的占有能继续多久；竭尽辯論之能事来了解，例如，一个著作人的債权人是否能够扣押这个作家手中的一个伟大人物的天才作品，作为債权的抵押品；又如去了解在共有財产制下，丈夫作为財产管理人，是否有权不得妻子的同意，去发表她的作品；又如去了

① 阿尔帕貢是莫里哀喜剧《悭吝人》中的主要人物。这个名字代表了貪財如命、一毛不拔的守財奴。——譯者注

② 屠尔卡雷是法国小說家勒薩日（1668—1747）所著的一部喜剧《杜加萊》的主人公。杜加萊是一老奴仆，仗着放高利貸发了財。杜加萊这个名字泛指一般暴发戶。——譯者注

解丈夫死后所遺下来的作品的发表权是否无限制地属于妻子等等。从律师的这些爭吵中能产生些什么結果呢？让人們对下列各款加以判断吧：

1.发行一部作品的专有权在作者的生前和死后三十年的期間归作者和他的代理人所有；

2.当这个权利在作者本人手中时，它是不得被扣押的，而只有在受让人的手中时才能被扣押，并且，扣押者又必須是受让人的債权人；

3.如果沒有正式的契約，应认为作者所出让的只是第一版的发行权。

这就是根据德·拉馬尔丁先生报告中所发表的原則而提出的那个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这个結論是和引言相称的。噢！笛卡儿！① 噢！蒙台涅！② 噢！帕斯卡耳！噢！卢梭！噢，所有的作家們！你們的著作使法国登上了全世界的知识王座，如果你們能看到人們怎样濫用你們的名誉，而且人們为了使什么样的动机得到胜利而引用了你們不朽的姓名，那么，你們会說些什么呢？

至少，如果人們剝夺了这种职务的尊严性，那么就应該使那些光荣地执行这种职务的人增加福利！但是，因为人們把继承人的享受延长了二十年到三十年，是否就可以认为作家的命运将眞正地得到改善呢？一个勇敢的作家把一生的四分之三时間用来写一

① 勒奈·笛卡儿(1596—1650)，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的沉思»(1641年)、«哲学原理»(1644年)。——譯者注

② 米歇尔·德·蒙台涅(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进步哲学家。——譯者注

本只有少数讀者願意看的书籍，他的待遇会更好些嗎？一个沒有亲戚、沒有財产和沒有声名的青年人，会因此而更容易找到一个发行人嗎？一切有利于欣賞那些逢迎时代的反常行为和罪恶的作家，而不利于那些从事糾正、攻击和駁斥这些反常行为和罪恶的作者的风尚是否会有所改变呢？这些就是要求迅速予以补救的創伤。我們的立法者沒有想去医治这些創伤，而他們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很慚愧地說这就是：——关心一个天才的人的孙子会餓死，这是一种什么現象呢！——的确，这种現象是痛心的。但是一个天才的人的孙子怎么会遭到餓死的危险呢？如果这是因为他一点也不願为社会服务的緣故，那么我是不会可怜他的。假如这是因为社会对于他的貢献沒有給与适当的报酬，那就是你們社会組织方面的錯誤，那么就請你們改变这种社会組织吧！

Ⅲ　按照我們的看法，什么是补救禍害的方法

在一切有关著作和作家的法令中，应当得到以下几点結果：

第一：尽可能减弱发行家之間所进行的激烈竞爭以免給著作带来灾害性的影响；

第二：向一切穷困的和无名的优秀作家們提供出版他們的著作和使人知道他們的才能的方法；

第三：在通过交換而取得报酬的制度以外，同时再建立一种奖励方式，这一方式要使奖賞和服务相称、使报酬和价值相称，并且鼓励作家写出严肃的作品，同时把作家从依附于讀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些讀者喜欢可供消遣的作品，并且只是为了使自己腐化和受騙才肯花錢；

第四：要做到使最好的书成为价錢最便宜的书；

第五：建立一种机构，这种机构在本质上可以限制作品掮客的利潤，并且对那些把自己变成投机者或投机事业的供应人的作家的那种可恥的傾向进行斗爭。

为了至少部分地达到上述那些不同的結果起見，我們提出下列建議：

根据本书《劳动組织》一章中所指出的那些基础和方法創办一个社会书店。

这个社会书店从属于国家，但不受国家控制。书店自己管理。

自己，并且像上述那一章所說的那样，由它自己把共同劳动所得的利潤在它的成員之間进行分配。但是，它的組织最初是由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所制訂出来的規章来加以規定的，并且，上述規章的严格执行須由国家来加以监督。①

根据这些規章，社会书店无需支付任何版稅。书店出售的书的价格事先应由国家决定，并且尽可能定得很低。

一切印刷費用都由社会书店担負。由书店挑选和給与报酬的一些能干的人組成委員会选收作品。

由社会书店出版其作品的作家們，用他們所放弃的著作权作为交換条件，享有参加获得专为他們而設的国家奖金的竞賽权。

国家預算中专設一笔基金，以国家奖金的形式来奖励上述那些作家，这些作家在思想的各个領域都应該是对祖国最有貢献的作家。

每一个作家的第一部作品被认定值得給与一笔国家奖金时，就要給社会书店一笔奖金；这笔奖金的目的就是鼓励书店去支持那些青年天才和补偿书店所受的損失，这是因为书店的这种保护行为有时可能使书店受到損失的緣故。

人民代表每年任命一个公民負責管理每一种脑力劳动，这个公民由社会书店給以报酬，他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范围內来审查那些社会出版社刊印出来的著作。他可以用全年的工夫去深入了

① 在这个問題上，我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除了路易·雷博先生之外，所有願意注意这本題为《劳动組织》的小书的批評家，都責备我們給国家增加了巨大的、因此是不可能的工作負担。倘若他們更注意地閱讀了我們的书，他們就会看到我們并不使国家成为社会工場的場长，而使它成为社会工場的立法者，这是大有区别的。

解对于这些作品所提出的全部批評，研究社会由这些著作所得的印象，最后征求公众的意見，这些意見是由水平相当高的組织反映出来的，而不是由买书的盲目群众反映出来的。到了年底，他要作出一份精确而詳細的附有說明理由的报告，把他研究的結果提交給人民代表。在这份相当严肃地提出的报告发表之后一个月，人民代表就在大家认为对祖国有貢献的那些作家之間分配国家奖金。在分配时，当然应該注意到工作的性质和完成这些工作所用的时間。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一制度很幼稚，另一些人則认为很奇特，并且已经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反对意見。我們不妨再来看看。

誰都知道，今天要进入写作职业队伍的大門，存在着許多障碍。你年輕嗎？你穷困嗎？你生辰不好，因而只賦有伟大的智慧和高尙的心灵嗎？……那么，你就倒楣了！尤其是你，如果认眞地对待你的职业，因而你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并在上帝面前只想着为未来而工作的話，那么你就更倒楣了！在你的脚下困难重重，你的智慧可能要长久缺少用武之地。如果你去投奔那些享有盛名的出版家，如果他們了解你的話，他們就会告訴你說，你还是一个无名之輩，而且你的作品也过于严肃；成功只属于已经成名的作家和能够哄人的作品；在这一世紀的事务中，到处都是混乱，以致一个謹愼的出版家不敢冒着危险去刊印一本无名作家的书，即或他們不使你遭到拒絕的难堪，也会使你負担一些最苛刻的条件，并且拿出版作品作为一种施舍，来向你进行掠夺。

我們的制度指出了补救这一巨大不幸的办法。这个制度以一种公开交易的社团代替暗中进行交易的孤立的个人，因此就杜絕

了曖昧的私人关系所引起的和保护的舞弊和专横。这个制度使好书的出版不再决定于往往只有商业知识的投机者，而取决于有才干的人，他們关怀一切有益的和值得贊揚的著作的成功。总之，这个制度会給无人知曉的天才打开一条出路，并使所有那些隐藏在社会內部的一切萌芽成长起来。

今天，拜金主义的势力日益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很明显，写作就会走上卑鄙、腐朽、堕落和卖身的道路。作家既然除了金錢沒有别的目的，除了做买卖之外沒有别的掙錢的办法，因此他們的思想作品只不过是掮客手中的商品。并且，既然在这种交易中质量并不重要，所以人們就在数量上进行投机，坏书充斥了市場，而珍貴的书本却永远埋沒在垃圾堆里。再也見不到耐心写成的优秀作品了！貪得无饜能容許等待嗎？再也見不到从事研究的天才了！为了生活的享受还能等到老年嗎？况且，又有什么好处呢？国家名存而实亡，社会則只是一个烏合之众的混乱集团，所以毕生嘔尽心血所写成的著作到哪里去找到买主呢？在这里，荣誉也安慰不了有勇气的穷人。因为，如果用金錢来奖賞作家，那就会不管后世人的評价如何而以买书人的多少来衡量；而时髦就成为荣誉了。

在我們所建議的制度中，很多流弊就将消失。当作家对于研究工作有受到奖賞的希望，这一奖賞能够证明他的貢献，补偿他的不斤斤于私利的精神，并且庄严地宣布他是国家的債权人的时候，他就会提高到他的使命的高度了。

但是，如果作家是个穷人，在他沒有得到奖賞以前，他将怎样和生活的需要作斗争呢？他就必須模仿卢梭，在他的写作的工作以外，他必須从事一种有收入的职业。作家的尊严、他的独立地位

和他的酬报只有在这种代价之下才能得到。感謝上天！人由上帝那里得来各种不同的禀賦。人的本质既然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他的职务就只会是一种呢？智慧不能永久停滞不前，它像土地那样，总要加以经营，人們播下各种不同的种子就可以加倍增高它的生产力。

有人也許会問，在我們的制度之下，那些不重視荣誉而只重視金錢、只承认他們书籍的买主是裁判人的作家，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作家有办法可以自己出版作品，或者完全像今天所做的这样，可以交給别人出版。的确，这种情况将不是很有利的，因为社会书店会和这些私人的出版者进行激烈的竞爭。但是，我們在这里談的是哪些作家呢？我們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們凭借他們书籍的浅薄、腐化、誨淫誨盗的誘惑力，可以說用强暴来劫夺很多讀者的錢袋，从而获得巨額的利潤。但是，当减少沒有价値的或危险的书籍的利潤而有利于优秀作品时，坏处在哪里呢？一些人由于欺騙社会而无限地发財致富，另一些人由于为社会服务而处于貧困的境地，难道社会可以容忍这种情形嗎？这是公允的嗎？在国内发生这种可恥的現象，难道这个国家不是走向深淵了嗎？是的，我們所建議制度的必然結果，就是会减少把思想作品作为一种行业和貨物的那些人的人数和他們的利潤。但是这个結果不但不能用来攻击这个制度，反而是一种有利于这个制度的論据。

我們預料到另外一种反对意見。有人会反对我們，說我們这种学說有使国家成为思想产物的最高判断者的危险。但是只要对这个問題稍加思索，人們就可以完全放心了。我再說一遍，国家将是社会书店的立法者而不是经理。規章一经訂立，国家就将像它

监督禁止攀登房屋或禁止杀害行人的法令的施行那样，来监督这个規章的执行。国家的干預就以此为限。这种干預有什么包办和横暴可言呢？至于国家奖金，并不是由执政者而是由优秀分子作为代表的社会本身来頒发的，社会把这些人选了出来，就是为了使他們成为社会的化身，并且作为社会的縮影。是不是你們要說，誰能担保那些候选人的指定者是大公无私和正直的呢？为了回答你們这个問題，我可以向你們說出这句話：那就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害关系。我姑且假設，在科学著作的鉴定中，会議可能选出一个无知的人来加以領导，但这个假設未免太过分了。难道这个无知的人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嗎？他会高兴让大家来譏笑他嗎？假若你用一个墮落的人来代替一个无知的人，那么，他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和无耻来向从未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最沉重的道德責任挑战呢？但願人們注意到这一点：这里談的并不是一个由一些人所組成的禁止旁听的科学院的討論会議，在这些人中間，責任是不分明的而且是暫时的。在这里，責任是由个人担負的，是指定誰担負的；必須全部拒絕或全部接受这个責任。还有，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切都是众目昭彰的。

人們要在自己国家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在所有的舞台中最崇高的舞台上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評判人有整年的工夫来作出他的判断。当他表示这一判断时，也許批評家早已談过了，所有明智人士的意見都已经被人知道的了。这些是多大的保证啊！更不必說通过会議討論而选出人选这一保证了。因为不管人們对这些从事討論的会議有怎样的不信任，人們至少在一点上会和我們的意見一致，这就是在有些問題面前朋党思想是无能为力的。

其次，說这个制度会发生錯誤，这种反对意見是完全沒有价值的。不是对任何机构都能这样說嗎？一个社会是否因为立法者难免有些錯誤就不要法令呢？难道因为法院关于一个公民的財产、自由和生命作出了一次錯誤的判决，你們就要推翻你們的那些法庭嗎？只要有一些人受智力的錯誤的支配和內心的各种情欲的蒙蔽，那么一切制度就都会是不完善的。有些人认为，实現他們的理想是一种效果迅速的万灵药，这些人就是一些必須加以提防的江湖派，不然就是一些必須加以怜憫的幻想者。如果一种制度是善意的产物，就应当善意地审查它，也就是說，不要去研究这一制度是否完美无缺，而是要研究它带来的优点的总和是否超过它所带来的缺点的总和。

我們的制度并不包括戏劇文学，因为戏劇是政府直接掌握的手段，所以对于戏劇文学应該規定一些特殊的規章。这是以后研究工作的主題。

我們絲毫沒有隐瞞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爽直如果得罪了一些人，那也是沒有办法的事，但是作为公民，我們有責任去反对那些导致著作变质和使作家墮落的学說。

德·拉馬尔丁先生在他的报告里說道："我們对那些人士的文化遺产，长期以来任人浪費，应該对他們感到多么歉仄呢？整个民族在历史上也只有五六个永垂不朽的名字。在我們的記忆里，詩人、哲学家、演說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仍然是几个世紀和整个民族的光輝縮影。

"蒙台涅以怀疑的态度来处理那些思想，并且用現代的文体使这些思想重新流行起来。帕斯卡耳探索了思想，不仅探索到怀疑

为止，而且一直探索到上帝。博胥埃①吐露出人类磅礴的言語，自从上帝在西奈伊②頒布十誡以来，人类尚未听过这样的言語。拉辛、莫里哀、高乃依、伏尔泰，他們找到了并且記录了人类心灵的所有呼声。孟德斯鳩③仔細研究了帝国的組织，首創对社会分析批判，并闡述了政治体制；卢梭热爱政治，費訥龙使政治神圣化，米腊博④使政治具体化并在讲坛上加以宣揚。从那天起，发現了合理的政权，公众的理智有了它自己的合法机构，而自由則沿着思想的步伐在討論的指示下向前迈进。法国的风俗、文明、財富、势力和政治都应当归功于这些人；而我們的孩子們也許应該把一切都归功于这些人的后继者。法国永恒的和取之不尽的財产就是它的智慧；旣然法国把它的智慧慷慨地給了人类，給自己保留了智慧的光荣，这就使它在所有民族中具有光荣的特征，現在岂不是时刻已经到来，应該把这个有用的部分、即造成著作的尊严、作家的独立地位、家庭的財产和国家的报酬这一部分变为私人財产嗎？"

啊！先生呀，当你用你的笔写出这些字句来的时候，你的心灵中是否有一种声音在低声地警告你，說你已经誤入迷途了呢？当你估計天才的重要性时，你却使他們成为半神化的人；当你規定他們的命运时，你却使他們成为新奇杂貨的販卖者了！你的贊揚把他

① 雅克·伯尼涅·博胥埃(1627—1704)，法国教会演讲家。——譯者注

② 西奈伊，亚洲西部的半島，位于紅海两海湾之間。地势大部分是高原。据圣经記載，上帝曾在雷轰电閃和密云中在西奈伊山頒发十誡(見《旧約》《出埃及記》第十九章)。——譯者注

③ 孟德斯鳩(1689—1755)，法国資产阶級哲学家及法律学者，著有《論法的精神》。——譯者注

④ 翁諾尔·加布里耶·里克蒂·米腊博(1749—1791)，十八世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有名的活动家。大資产阶級和自由貴族的領导人物之一。——譯者注

們高捧上天，但你的学說却把他們拋入深淵。你的才能辜負了你，先生，你不用自我辯解，你的雄辯本身就譴責了你的結論，除了用你的宏論之外，我不必用别的证明来反駁你。是的，当一个詩人借这么多的光荣和伟大的人物来支持这样可怜的利益时，他对他自己不可能是完全眞誠的。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先生，我相信我已经猜到了：如果你是富有而沒有孩子的人，那你就不免会认为你是替那些作家和他們的继承人要求发財致富的权利，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提出要求。如果你是貧穷的，那么你决不会要求以小錢来作为作家的报酬。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也許以为你的继承人只要继承你的名望就已经够了。你自己欺騙了自己；你在对其命运作出安排的这个問題上，你已经扮演了一个第三者的欺騙角色。

被拉馬尔丁这样伟大的詩人、这样思想高超的人所提倡的对于工业主义的信仰，决不是今天正在腐蝕着社会的那个禍害的較轻的可悲症状之一，工业主义就是这样逐漸地在貶低人們的地位和心灵，它无孔不入，它使人成为奴隶；它像那个試探耶穌的魔鬼那样敢于对詩人本人說，“你是否向我跪拜”，而这位詩人就跪下了！好吧！只要我們还活着有一口气，即使我們的声音会在一切騷动的貪欲所发出的嘈杂声中消失，我們还是要攻击这些墮落的傾向。我們要求大公无私的精神仍被保留在重要品德之中；我們要求名誉、光荣和尽責的那种满足感始終成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和奖賞；我們要求不要使人們貧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他們除了爱好金錢之外不再有别的动机。而对于那些不知道作家应有高尚灵魂的人，我們要重提一下卢梭所說的高尚言論①：

① 見《懺悔录》，第一卷，第134頁—135頁。

“不，不，我可以既眞实而又驕傲地这样說；在我一生的任何时刻里，使我高兴或使我伤心的既不是名利也不是貧穷。在这一不規則的和由于生活波动而值得回忆的生活过程中，我經常沒有住处也沒有面包，但我总是以同样的心情来对待富裕和貧困。在需要时，我可以像別人一样去行乞或盜窃，但是，即使我落到那种地步，我也不会感到煩惱。我从未因为貧穷或惧怕陷于貧穷而唉声叹气或者流泪。在命运的考验中，我的灵魂倘不通过命运的磨折是不会懂得眞正的善和眞正的恶的；而只有在我毫不缺乏生活所需的时候，我才覚得我是人类中最不幸的人。”

附录　从現在起就可以試办的事項

在大家刚才讀的篇幅里，我們已经說明了作为一个人民之友和从人民的选票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所应当遵循的步驟，以逐漸实現一种公平和健全的劳动組织。因而，提出的計划是以完成一次政治革命作为达到社会革命的方法为前提的。

但是我們所期待的时刻的到来可能还很遙远，到了那个时候，国家就只不过是人民的生动的化身了。并且，在等待期間，在那已经成为一个眞正的决斗場的劳动領域內，該有多少紛扰、多少痛苦、多少貧困啊！

此外，我們不是也曾听到这样的呼声：在可以进行一次政治革命以前，难道为了工人就沒有任何可以試办的事情了嗎？

这决不是我們的意見！毫无疑义，不应当信任局部的奋斗所产生的力量；但是我們并不劝告人民在不幸和痛苦之中坐以待斃。

可是要当心那些魯莽的或者錯誤的尝試！要当心那些尝試，因为它們在本质上或者在所要达到的最后目的上是欺人的，或者是足以危害社团原則并使社团原則失掉威信的！

最近，在可尊敬的感情启发之下，有些民主党的著名人士集会討論这个重要的和振奋人心的劳动組织問題。研究我們通过什么样的实际方法能在目前情况下实現我們大家都能同意的社团原則。

获得选票最多的一个政党同意組成一个信貸社团，由这个社团来主持各种工人社团的产生，供給它們劳动工具，給它們指定一个方向，但在这些社团之間仍旧保留着竞爭，并且并不要求它們建立一种集体資本作为它們生存的基础，这个資本可能会无限制地增加，但毕竟是不許可轉让的。

对于我們来說，这种計划我們是不能附和的：

1)因为，如果工人社团不自行規定要通过一种集体的和不可轉让的資本而无限地扩张的法規，它的利益就会和无产阶級群众的利益有所不同，而无产阶級只有把自己看成一家人才能得到解放；

2)因为，帮助某些工人在他們之間組成一个个别的和有限制的社团，这就是在工人之間形成一些特权者，并在一切都应当趋于統一的地方造成一些区别；

3)因为，只要还存在竞爭——仇恨、嫉妒、舞弊和灾难的泉源——，工人的伟大而普遍的解放就永远不能实現；

4)因为，在竞爭的情况下，給某些人增加力量就是給另一些人增加虛弱。因此，倘若竞爭有計划地坚持下去，那么，給予一个个别社团的一切支持，对于被排斥在該社团之外的那些人就会造成不幸。

总起来說，問題在哪里呢？在实际上逐步达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信条的实現嗎？那么就必須把矛头指向竞爭。因为：

有竞爭就沒有自由，因为竞爭阻止弱者发展他們的能力，并使他們成为强者的战利品。

有竞爭就沒有平等，因为竞爭不过就是不平等本身的行动表

現。

有竞爭就沒有博爱，因为竞爭是一場战斗。

肯定地說，这个杀人的原則是不能一下子立刻就被摧毁的。但是，为了彻底地和合情合理地摧毁这一原則，就必須尝試以解放劳动者为目的的整套制度。

以下就是我們所要建議的。

在社会民主党內組成一个委員会。

为了无产阶級的解放，这一委員会要举行一种像在最近几年內所举行的募捐，这些募捐或者是为了抗議国家尊严的受損，或者是为了对某一个有德行的公民举行隆重的紀念，或者是为了援助一个和我們保持友好关系的被压迫民族。

以这种方法收集的基金交由一个工人社团来支配，自然，这个社团只能算是普遍建立的劳工社团的第一个核心。这个社团应包括几种不同的工业，并且应該建立在某些基础之上，下列各条就是这些基础中的主要項目。

规　　約[①]

第一条　应把入社的工人分成两个家庭，每个家庭由人数相等的成員組成。

工人人数增加时，家庭的数目亦将按比例增加。

应該尽可能选择居住在同一市区的成員来組成一个家庭。

第二条　工人全体大会任命一个可以罢免的中央行政委員会，它的特殊任务是寻找工作、和第三者接洽、在我們以后要談到的家庭委員会之間分配应当做的工作和应当給与的工价，要做到使每个家庭按照严格的比例，可以得到数字相等的劳动时間和同样的报酬。

第三条　在每个家庭中組成一个委員会，定名为家庭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成員由家庭选出并在必要时可以罢免。

該委員会的任务是在家庭的各个成員之間分派属于該家庭方面的工作和工資。另外，該委員会的成員还有检查工作和监督每个人完成其工作的使命。

第四条　每个家庭从自己的成員中选出一人，专門負責清查

---

① 也許有人将提出反对的意見說，我們在这里規定其基础的方案不能完全符合商业公司的組织法。

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那些法律是为了"資本的社团"而制訂的；而不是为了"人力与感情的社团"而制定的。

然而，經过对法典的仔細研究，并根据几位著名法学家的意見，我們可以确定上述的規約是可以和"合資公司"的形式相适应的。

帳目和审查中央行政委員会或专門委員会所进行的业务。

第五条 每个工人从总的劳动工价中按照每劳动八小时五个法郎的标准領取工資。

超过这个数字的利潤，作为公共基金，其用途指定于后。

第六条 年終时，应編制一份社团状況的正确說明书。为此，要編制一份存欠总清单。如果尚有余額，則应分为两份，其中一份按照人数平均分配給社員，另一份成为集体的資本，这个資本不許出让，并且指定用于因人們相继加入而日益扩大的社团。关于加入社团的事項将在后面叙述。

第七条 任何残废或患病的社团成員，经证明属实者，有权得到和他健康时相同的工資和同样的利益。

第八条 如果工人自願退社或因行为不检而勒令出社，对于退出社团的工人只付給尚未支付的劳动工資。

第九条 締約人承认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承认任何带有排外性质的社团都是破坏博爱学說的，因此他們以最郑重的态度約定，在社团的状况并非絕对不允許接受工人入社时，凡有志入社而願意服从社章的工人，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都可以被接受为社員，但該工人必須属于一种行业，并提出证明文件。

第十条 为了对此作出决定，应由全体締約人选出委員七人，組成評判委員会。

第十一条 締約人承认宁願减少收入，不让工人弟兄生活发生困难。所以工人評判委員会在决定接受工人入社时应根据的原則是：垄断劳动是违反人道的罪行。

第十二条 締約人从現在起就像以上所說的那样被分成两个

家庭，这两个家庭的人数可以随着新社員的不断增添而增加到各为一百人为止，在这个时候，就可宣告滿額。有新社員加入时，他們将被平均分配到已經成立的两个家庭中去，直到各滿一百名为止。此后，他們就可以組成一个新的家庭，依此类推。

第十三条　工人評判委員会由締約人选出，作为仲裁法庭，并以此身份判断締約人之間可能发生的爭执。委員会有权决定退休原因是否合法或疾病是否确实；有权根据检查員的报告，宣布将那些公认为懶惰的工人开除出社。最后，它有权在經过公开辯論之后，宣布罢免那些确应罢免的委員会成員，而这种罢免則应按照仲裁法庭在审判时所遵循的形式宣布。

第十四条　不論是委員会的成員或評判委員会的委員，每年均須重新选举或决定連任。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的来信和章程草案

当我們忙于校訂目前的版本的时候，我們收到了一位工人作家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①]先生的来信和草案，他是以《論同业公会》的著作而知名的。下面就是来信和草案。

我們迫不及待地把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先生提出的草案印出来，让我們的讀者尽快看到。我們和他一样，确信在这里所討論的問題是一切善良的公民都应当留意的問題：

“路易·勃朗先生，

“我得悉你正在准备为你的《劳动組织》这一著作刊印新版。这个問題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应該对此关心，因此我試图起草一个社团方案，并将这个草案寄給你；如果你认为能够使你的讀者們感到高兴，我請求你把它在你的讀者面前公布。

“謹致敬意！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

1847年3月18日于巴黎。

---

① 阿格里科耳·佩迪吉埃（1805—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譯者注

章程的草案

第一条　如果工人們自相联合，醵集基金，終于集成一笔社会資金，以便经营任何一种工业，那么应由全体社員委任他們的经理和社团的全部領导人員。

第二条　如果一些富人——我們阶級的朋友——具有远見，願意协助我們組成一个工人社团，他們可以选择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道德保证和最有成功希望的社团；他們可以慷慨大方地以最低的利息来垫付大量的資金，这样，社团就可宣告成立。

第三条　具有善良願望的人为了試行某种新的工业制度，可以在勤劳的、智慧的、有道德的并爱好博爱的工人中去选择自己的合伙人。社团将成立一个有委員若干人的委員会，通过規章，并且可以規定社团的期限为三十年。

第四条　社团既然需要进行工作，运用它本身的能力，并依靠经验和实践来每日进行自我教育，它首先将只举办一种工业：如果认为妥当的話，可以先創办一个家具工場或木器工場。

第五条　在这第一个工人組合之外，委員会和它的经理在认为已有可能时，就应該成立不同职业的新的組合。

第六条　在木器工业小組之外，人們可以成立金属器具制作工业小組、車琢工小組、木匠小組、泥瓦工小組、制鞋工小組等等。

第七条　每个小組設工作組长一人，经該小組同意后，由委員会指派。

第八条　经理及工作小組长的工資按月或按日計算；待遇应按合理的条例来加以确定；所有其他的工人，則应視当时的情况或

工业性质的需要而按件計工或按日計工。不論是按件或按日計算，工价既不得高于私人工厂中的工价，也不得低于这个工价。

第九条　每个小組均应选出代表一人参加管理委員会，該代表系由小組自由选出，并能由小組加以罢免。这些代表的任务是了解和监督社团的业务；代表由本組工作領导人或其他由小組推选的委員充当。

第十条　所有的小組都是有联系的；它們一起組成一个統一的社团，管理委員会是該社团的主脑，而各个小組則构成它的躯体与四肢。

第十一条　各小組的委員会从管理委員会那里領取经費，并和管理委員会保持紧密的关系。

第十二条　管理委員会由委員六人組成：经理、副经理、秘书、助理秘书和小組检查員。

第十三条　各小組委員会同样亦由六个委員組成：小組代表、工作領导人及其他四位委員。小組代表和工作領导人有时可能是同一个人，但应作出安排，使每一委員会均由六名委員組成。

第十四条　应备有記載正确的簿册，在管理委員会的帳目中和各小組的业务中均应保持秩序及明确性。

第十五条　每年年終收支应达到平衡，把贏余总額分为四份：第一份几乎总是不能和其他各份相等的，这一份用来支付社团貸款的利息及社团所发行的股票的利息；第二份充作社員的救济金；第三份作为社团基金和償还資金的基金，其目的在于使社团能随着时間的进展而成为它的資本的絕对所有者；第四份平均分配給全体社員。

第十六条　如果某一小組遭受損失，在年終有所亏損，社团应予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妨碍該小組分享贏余总額。

第十七条　如果同一小組并无特殊原因而連续几年成为社团的負担，同时該小組成員所得的平均工資又至少不低于其他小組的社員的平均工資，管理委員会在小組代表的共同协助下，应考虑該小組的問題，或者更換它的領导，或者取消它应得的利潤，或者采取其他一切方法。

第十八条　所有各小組的成員是由利害关系和友爱精神联系着的。家具制作工人要穿制鞋工人所制的鞋子，而制鞋工人要用家具制作工人所制造的家具。每个小組均成为其他小組的顾客，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其他小組得到工作；因为所有的人都使每个人得到利益，而每一个人都能在全体的利益中得到好处。

第十九条　社团成員的住宅应尽可能靠近公共工場。

第二十条　管理委員会除购买工作本身所需的材料以外，对于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食物及飲料，諸如菜蔬、水果、酒等等，可以成批购买，并按成本价格向每个社員供給他所必需的消費品。此类物品的价款应从社員每星期的工資中扣除。

第二十一条　如果劳动和节約产生了盈余，如果每个成員都能积蓄一定数额的款項，他可以把这笔款項存入社团，社团可为此而发給股票。存款的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第二十二条　任何成員有退社的自由。如果他持有股票，則应向他收回，至于他的股款則应全部偿付；从此以后他就不再能享受救济和由全体会員的劳动所得来的社团基金的一切权利。

第二十三条　社团可以时常接納新社員，或者为了补充退社

的成員的缺額，或者为了扩大社員的行列。新入社的成員，由于他为全体的利益只工作了几个月，在他第一次分享利潤时，仅能得到他按理应得的部分。

第二十四条　如果社团和某一个小組的工作发生清淡情况，如果人手空閑下来，那么新社員或在別处容易找到工作的社員可以暫时退出公共工場。他們将不能再向社团領取工資，但他們仍能享受友爱的救济和領取利潤的权利，因为他們在社团通知他們回去的时候，应当随时回到社团中去工作。

第二十五条　如果不仅是一个小組，而且是該小組所从事的行业发生工作清淡的情况，并且空閑的成員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那么，小組就应縮短全体成員的工作时間，以便使这种清淡情况因为由全体成員以友爱的精神分担起来而得到减轻；这样，在这种例外的情况下，任何成員都不必离开公共工場。在經过正式的討論之后，对于生活最感困难的社員甚至可以动用救济基金給与帮助。

第二十六条　每个社員都有退社的自由。根据同样理由，并且为了使权利具有相互的性质，管理委員会在取得小組代表以及工作領导人的一致同意之后，可以把不履行社团的道德原則和友爱原則的社員开除出社。

第二十七条　社員按件或按照劳动日領取工資，每个人是按照他的体力和才能而得到工資的；只有在每年的贏余总額中每个人才能分得相等的一份。然而，如果一定数目的社員根据与上述原則有所不同的原則而不願有一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得到較多的收入，那么，就可以把他們的工資总額交給他們，由他們按照自己

的意願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委員会和小組长們按照那些願意这样做的社員的希望去进行这种分配，以便使他們每人都得到相等的一份。

第二十八条　当社团有了办法的时候，对于那些在为社团的劳动中出过力的或是損伤了自已体力的老年人和残废者，应該通过表决給与养老金。另外，当管理委員会和小組代表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曾经为社团服务的已故社員的妻子或孩子、父亲或母亲，都可以得到一笔撫恤金。在对这个問題作出决議时，人們不仅应当注意到死者所尽的力量，而且同时也要注意到死者的亲属的情況和是否眞正需要。

第二十九条　应当开办基本的和专业的課程。其細則另由专条加以規定(我們也要談一談如何能在各省設立办事处，以便社員迁移或旅行到别的城市而不和他的社团断絕关系，并且可以不断为社团工作。然而，如果这样做会发生困难，或者似乎会給与社团一种过分包办性的特征，我們就不必談它，因为，我們仅仅願意尝試做一些可能作到的和我們认为是好的事情)。

第三十条　各委員会每七天应召集成員开会一次，管理委員会和小組代表每月应开会一次。各委員会的成員每隔三月要到管理委員会去开会一次。每年年終举行一次全体会議，并在会議期間，在分配利潤之后，为了求得全体社員在精神、情緒和道德上趋于一致，要举行一次家庭庆祝会。

第三十一条　社团的存在期限定为三十年，但在一些不可預料的情況下得提前解散。然而，如果环境有利，而将来的法律又許可的話，那么社团也可以超过原定期限而延长它的存在。

第三十二条　在社团解散时，最先有权得到补偿的是股东和出資人。社会基金的余額則将在一切社員中按照他們为社团的利益而劳动的年限进行分配，所以有的人可以获得多些，有的人获得少些。

第三十三条　本規章的各条款决非絲毫不能修改。管理委員会和代表有权修改它的条款，有关出資人的条款則不在此例。对这类条款，若不取得出資人的同意，不得更改。

第三十四条　每一項条款必須經管理委員会的委員和小組代表四分之三的多数的同意才能增加、删改或变更。

人名对照表

四　画

丹敦（Danton）
瓦尔都（Wardour）
韦尔斯利（Wellesley）
孔西代朗，維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牛頓（Newton）
比西—腊比坦（Bussy—Rabutin）

五　画

卢梭，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圣—茹斯特（Saint—Just）
圣保罗（Saint Paul）
圣西門（Saint—Simon）
布蓝托姆（Brantôme）
布勒曼（Poulmann）
加斯帕蓝（Gasparin）
弗勒里（Fleury）
布克利（Boucly）
布隆，葛丽娜—安奈特(Bronn, Cœlina—Annette)
布瓦埃，阿道夫（Boyer,Adolphe）
布尔維（Bulwer）
皮洛士（Pyrrhus）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史谷脱，瓦尔特（Scott Walter）
弗萊吉埃（Fregier）
弗兰西亚（Francia）
尼罗（Néron）
尼科尔（Nicale）
加雷尔（Galère）
卡韦尼亚克（Cavaignac）
卡尔內（Carné）
古尔貝（Courbé）
代馬萊（Desmarets）

六　画

西斯蒙第（Sismondi）
米內尔符（Minerve）
米腊博（Mirabeau）
吉斯特費尔德（Chesterfield）
伏尔泰（Voltaire）
貝朗瑞（Béranger）

七　画

克敏斯（Cumins）
杜班，查理（Dupin, Charles）
杜布瓦（Dubois）
庇特，威廉（Pitt, William）
李嘉图（Ricardo）
麦逊（Méthuen）
貝德福德（Bedfort）
貝尔維（Berville）
狄德罗（Diderot）
伽克里奧斯特洛（Cagliostro）
伽里略（Galilée）
杜梅里，埃德賴斯当（Dumérie, Edelestand）
阿貝尔（Hébert）

八　画

拉斯奈尔（Lacenaire）
拉梅耐（Lamennais）

拉克勒琴尔 (Lacretelle)
拉辛 (Racine)
拉·卡尔普勒內德 (La Calprenéde)
拉·賽勒 (La Serre)
拉普拉斯 (Laplace)
罗伯斯比尔 (Robespierre)
罗特希尔德 (Rothschild)
林德赫斯特 (Lyndhurst)
阿尔比克尔克 (Albuguerque)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帕默斯通 (Palmoston)
佩迪吉埃·阿格里科耳 (Perdiguier, Agricol)
波尔塔利斯 (Portalis)
肖博勒 (Chambolle)
苏拉維 (Soulavie)
帕斯卡耳 (Pascal)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 Michel)

九 画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查理第七 (Charles VII)
律比雄 (Rubichon)
洛蓝 (Lorain)
韦尼奥 (Vergniaud)

十 画

馬薩尼埃洛 (Masaniello)
馬尔薩斯 (Malthus)
格拉古斯，蒂伯里尤斯(Gracchus, Tiberius)
格林 (Grimm)
拿破侖 (Napoléon)

十一画

勒德律—洛兰 (Ledru—Rollin)
勒特利埃 (Letellier)
盖潘 (Guepin)
雪弗魯依 (Chevreuil)
莫里哀 (Molière)
梯也尔 (Thiers)
荷馬 (Homère)
基佐 (Guizot)
笛卡儿 (Descartes)
毕萊 (Buret)
梅雷 (Mairet)
費訥龙 (Fénelon)

十二画

斯密 (Smith)
惠灵頓 (Wellington)
傅立叶 (Fourier)
菲德列 (Frédéric)
博胥埃 (Bossuet)
舒瓦瑟耳 (Choiseul)
喀德林 (Catherine)

十三画

路易十一(Louis XI)
路德，馬丁 (Luther, Matin)
蒂培尔(Tibère)
薩伊 (Say)
新西納图斯 (Cincinatus)
雷納耳 (Raynal)
杰克逊 (Jackson)
蓬帕杜尔 (Pompadour)
福歇，里昂 (Faucher, Lèon)

十四画

維納斯 (Vénus)
維累梅 (Villermé)
維斯特敏斯特 (Westminster)
蒙泰 (monteil)
蒙台涅 (Montaigne)

十五画

德·奥賽（D' Haussez）
德·拉馬尔丁（De Lamartine）
德·盖朗日尔，勒干（De Kérangel, Leguen）
德·伽馬，瓦斯哥(De Gama, Vasco)
德·巴尔扎克（De Balzac）
德·拉土舍，亨利(De Latouche, Henri)
德·蒙莫朗西（De Montmorency）
德·薩德（De Sade）
黎塞留（Richelieu）

十六画

霍尔巴赫（Holbach）

十七画

穆罕默德—阿里（Méhémet-Ali）